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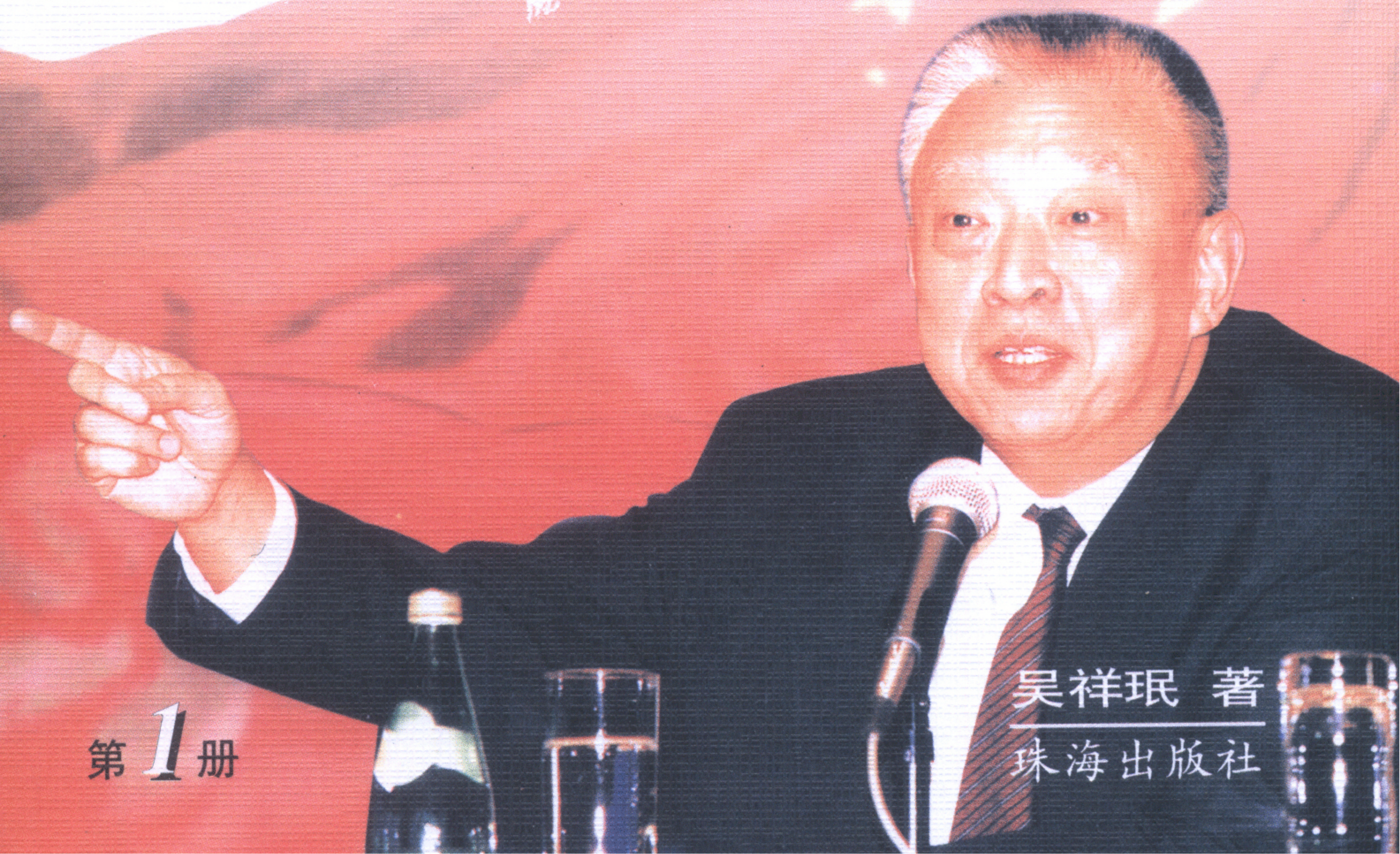


面對面採訪 真實的故事

金庸題 



第 1 册

吴祥珉 著
珠海出版社

序 言

《面对面采访，真实的故事——名人访谈录》系列丛书收集了吴祥珉女士近两三年内对香港及内地众多知名人士的独家采访文章。作者以其独特、轻松、风趣之笔触，向读者逐一介绍包括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 员各位委员在内的名人之真实生活和工作情况，展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执著的事业追求，特别是在筹委会工作期间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突出贡献。这些人当中，既有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也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既有德高望重的政坛宿将，又有众所周知的社会名流。他们大多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为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前无古人、举世瞩目的壮举，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忘我工作，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尤其是 逾百万香港同胞的厚望和重托。可以说，香港能够顺利回归以及回归后继续保持稳定繁荣，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委员们功不可没。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

本书的作者吴祥珉女士有着长达三十年的新闻实践经验。作者为撰写、出版《面对面采访，真实的故事——名人

访谈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逐一登门采访了书中的每一位名人，被采访者不仅提供第一手资料，而且都亲自审阅了相关的稿件，使文章内容更加真实可信。今作者将其结集出版，并称之为“面对面采访，真实的故事”，乃实至名归，可喜可贺。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能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一九九〇年 九月 圆日

注：序言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目 录

鲁 平 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为回归，白了头，鲁平细说从头..... 圆

罗康瑞 香港瑞安集团主席

●海鸥约纳堂..... 圆

陈佐洱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无缘政治却政治..... 猿

方黄吉雯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安达信公司国际行政局委员、中国及香港地区董事
副总经理

●白领丽人 勤于己 勤于人..... 源

刘汉铨 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港进联主席、香港刘汉铨律师行律师

●情从缘生..... 缘

霍英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霍英东集团董事长

●吃得苦中苦，方为.....

远

邬维庸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行医者真性情 乐天知命邬医生.....

愿

李伟庭 全国人大代表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兼社工部部长

●新华分社里的香港人.....

怨

王敏刚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刚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

源

王凤超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叫我老王好了！.....

远

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梁振英测量师行董事总经理

●很自信，但信奉自食其力.....

员

李家祥 香港首届立法会议员
香港李汤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会计师

●不群不党行中间..... 猿

成绶三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学而后知不足，行而后知更不足..... 猿

王英伟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求变 求新 走出新天地..... 猿

李泽添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

●与生俱来之缘..... 猿

李鹏飞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电子专家

●忧乐天下事..... 猿

董建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董建华..... 猿

后 记 猿

鲁 平：

回过头看我这辈子，我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指高官），绝对不适合！因为这工作太复杂了，我这个人有点性格，有的人很怕我，但我是很有感情的人，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为回归，白了头， 鲁平细说从头

鲁平小传

鲁平1937年12月生于上海，四川省阆中人。

从小在上海读书，中学在英国人创办的雷氏德工业专科学校就读。

鲁平1957年毕业于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毕业后先于上海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现中国福利会）工作；后于1957年至1962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任编辑，后升任副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十二年。

鲁平1978年参加筹组国务院港澳办工作，一直工作至1987年7月，历任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

鲁平1985年任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团成员；198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

鲁平1987年7月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9年元月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1987年 苑月退休。

他是最敬重的中国高层官员之一。

我敬重他的才学、品格、风度和为人。

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港澳办、认识原主任鲁平，还得从头细说。

七八年前，记得是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正好在广州，很偶然于无意中看了全过程。

印象极深是两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他手不拿讲稿，面前也没摆笔记本，直接面对百多号中外记者，侃侃而谈香港情况。对香港过去、现状、将来情况之熟悉与预测，直让我觉得是刻在他脑子里。

对记者毫不客气的提问对答如流。

本来口才了得，不拿讲稿发言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那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中国。记忆所及，在这种大型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领导人拿讲稿讲话在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

从此，我知道了我国政府有负责港澳事务的部门——国务院港澳办；

从此，我知道了鲁平其人。

我曾是他的部下

我惊讶世界上众多事情中的许多巧合，直如讲故事般令人折服。

哪曾想到若干年后的一天，我会在他率领下工作。我庆幸、我开心，有机会目睹他的风采、有机会学习他的工作作风。

我似乎是糊里糊涂进了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秘书处，直至1987年 苑月 14日预委会在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方知鲁平任

预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除预委会工作外，还主管秘书处工作。我在香港通讯处工作，间接成了他的部下。

我极珍惜在预委会、筹委会秘书处的一段不算太短的工作时间。

站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鲁平，比电视上见更显风采；至于对他工作、作风、性格的感受，在近三年里，感觉是直接的，虽然他一些方式方法我并不赞同，但对身居要职的鲁平所做的一切，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他性格中的耿直、真诚与不屈不挠，而这恰恰正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的可贵之处。

缘年对香港人、对港澳办，乃至对国家都是特具意义、绝不寻常的一年。

缘月即将过去，远月眼看到来，采访国务院港澳办其时在位的主任鲁平之计划眼看要泡汤了。无奈中我也直埋怨自己：香港回归在即，仍死抱着非采访鲁平主任不可的愿望，简直就是奢求；回归脚步声近，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家主要官员，他的时间似乎怎么都挤不出来了。

可我又不甘心，采访他是我在香港开始写人物专访之初就有的愿望。我在香港，他在北京，只能靠信函、电话来往的争取，偶尔有机会赴京，抓紧时机当面直陈采访要求，他口头答应了两次以上，且凭直觉告诉我，他是位恪守信用的人，答应了的事不会轻易说“不”。

认定了的事于我，也不会轻言放弃。经大半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不懈争取，已届缘月尾时，我也动摇了，几乎想放弃了，然确实不甘心，心想：再争取最后一次吧！

又是言辞恳切、句句真情剖白、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能被打动之信，以最快速度传真往北京。

缘月猿日，接主任秘书刘振东先生传真：“采访鲁平主任的时间已定为远月缘日下午三时，届时请来……”

我简直不相信是真的，半晌说不出话来，长长地舒了口气，真正地高兴透了。马上准备，告知北京下榻酒店、联络方法，匆匆赴京。

万分庆幸有这最后一次的争取，采访鲁平为我数十年记者生涯增添了最重要的一笔。当时我想：在预委会、筹委会阶段，若不能采访他，留下一段历史记录，我将遗憾非常。

留给历史的采访

待我真正入坐主任办公室，面对鲁平时，直截了当告诉他：“回归在即，你忙得不可开交，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请谈谈你多年来从事港澳工作的体会，包括回顾与展望；及回归后港澳办之角色。我不想为你定什么题目和框框，总之你想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好吗？”

他沉思半晌说：“我不知从何讲起。”是啊！七十年的人生路，甜酸苦辣、千头万绪，岂能一时半会儿说得清？本来，离回归仅二十多天，中国主管港澳工作的最高官员，此时，正一门心思集中于回归大业；此刻，一切工作均围绕香港回归；此际，回归的具体事务已摆上议事日程。却让我这执著于回归前采访他的记者闯了进来，他的思绪、他的回忆会让我从眼前忙得团团转的日子拉回到他现时极有可能不愿回顾、不愿触及之往事中。

双方原定好采访时间为四十五分钟至一个小时，对此，我已谢天谢地。原想：他只要给半个小时已是万幸了。好！抓紧时间。

绝对没想到采访了三个多小时，也许他的故事太动听，也许我的采访太投入，以致不知时间已匆匆流逝，看错了手表上的时间，以为时间才过了一个多小时。

猛地听他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我们再谈一刻钟好缘

吗？”我再看表，怎么搞的，竟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是呀！点算录音带，正在转动的已是第二盒带子。待证实后，回过神来，几乎乱了方寸，内疚非常。我意识到自己不仅占用了他的宝贵时间，还妨碍了港澳办众多干部的工作。

听了鲁平的话，我已不敢再有任何要求，只是又谈了半个多小时。

事后港澳办副主任陈滋英向我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鲁平是四川人。我笑称若早知道（我是事后向他要简历的）一定与他认老乡，难怪在他身上看到我们四川人的真、四川人的犟，还有四川人的直肠直肚。

一年多过去了，我回顾对鲁平的采访，仍觉珍贵。筹委会期间，他只接受了我一个人的专访，而筹委会的历史将载入史册。我从来不敢为自己在筹委会期间的工作作任何评价，但为如鲁平等筹委会委员写下的专访，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他们在这历史时期之工作、经历、心态，对将来回顾这段历史，起码留下了文字记载。

我异常珍惜此次访问，也非常感谢鲁平先生的真情剖白。筹委会的历史将永留人间。

原来是同行前辈

鲁平在1957年，“国母”宋庆龄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从该杂志创刊起，鲁平就在那里任编辑，直至1971年升任副总编辑，前后十四年。

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干更长时间；也可能他不是今天的鲁平。

没想到是同行，又是前辈。

据悉，《中国建设》由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亲自管，他很远

关心这本刊物，而具体工作则由廖承志管，隶属国家外文出版社。宋庆龄与美国关系非常好，在美国有很高知名度，以她的名义，该杂志可进美国，公开在报摊发售；杂志的基调由中央定，力求多样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服务对象为欧美国家中间读者，因此更要做到有针对性，不讲空话，用事实说话。鲁平说：“在国外所有的对外宣传刊物中，我们这本杂志销路最好，比较受欢迎，除英文版外，后来又发展了法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葡萄牙文版。”

1981年，杂志社便迁往首都北京。

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我此时所指的是那段人妖颠倒的历史。读者可曾想到：广为港人熟悉的共和国港澳办原主任，竟然曾是“反革命分子”，且长达十二年之久。

往事确实不堪回首，鲁平陷入深深的痛苦回忆中，平时见惯他的坚毅神色与自信语气已被凝重的表情与悲愤的话语所替代，他说：“我始终感觉到非常内疚。”他的内疚是因为高堂与稚子在文革中跟着他受的苦。

对鲁平的性格、为人，过去我是表面的观察，完全不知道他的过往。此次长谈，他对过去聊了许多，可惜这段历史他始终不愿意发表，本已成文，但为尊重其本人，我只能简单带过。而听了他的叙述，我终于明白了鲁平何以有他的性格、他的为人。我对他说：“你因为有很不简单的经历，所以才有如此坚定的人格。尽管我不可能完全看清你面对谁人会怎样，但我知道，不论你面对谁，哪怕你的上司，我绝对相信：你还是你。”

为人子、为人父的鲁平经历了文革——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忘的日子，他陷入痛苦的回忆中，我也受到感染，心想：幸亏他熬过来了。直到1989年“四人帮”倒台，他才于1990年获“解放”。

总感到鲁平的故事很悲愤、极震撼。我告诉他：“我做记者苑

二三十年，以我之年龄、资历，现在任何事已难以引起我激动、兴奋。”

然我心里明白，此次采访，鲁平动了真感情，他之叙述使我受到极大震撼、感染。当天采访后，回到酒店，那一个个动人故事、那字字血泪、那痛苦经历、那艰辛回忆，像电影故事般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重现，深夜至凌晨两三点钟仍无法入睡，我知道自己真正被感动了。

平时我所见之鲁平，仅为身居高位在官场中的一面，听罢他对往事的回忆，虽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却让我逐渐看清他高官背后的另一面。这一面显示了一个人、一个很感性的人之真；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之诚。

身居高位多年，他却给我讲了个意想不到的故事。

文人做官，难！

“回过头看我这辈子，我这个人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指任高官），绝对不适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起码当时是这样的反应。

1995年，鲁平从农村回城了，他不愿再回到原单位，那里太令他伤心了。

廖承志提出让他参加筹组港澳办。最开始在北京华侨大厦租了两个房间，四位老大姐加上他，开始了国家专责港澳事务的工作，他说：“这也是缘，那时我最年轻，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我说：“我不相信干了十九年港澳工作，并官至国家专责港澳工作的最高级官员，居然说自己‘绝对不适合’。”他忙说：“真的，真的！”接着，他以异常迟缓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得去讨好什么人，我与任何上级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只有工作关系。”我听得很清楚，高兴地说：“你看，我

愿

没有看错人。”

“钱其琛副总理的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听他继续说：“我根本没去过，要去就到他办公室谈公事，不谈私事。姬老（港澳办前主任姬鹏飞，鲁平前任）的家，我每年过春节去向他拜年，因为他是老前辈。历来都这样，我从未到领导人谈私事，我总觉得没这个必要。如果党要用你，自然会安排你，如果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说明你这人不应在这个位置上。我一向以来都这样，一辈子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我就是凭党性工作。”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己又是知识分子，是否知识分子的清高？以这种性格评价一个人是高尚的，然在“官场”上打滚，他说的不无道理：“但回过头看，我的确不适合做这工作。”听他再三强调，我不解：“我不理解这‘不适合’，就算你与领导没私人关系，但上级既已安排你，为什么说‘不适合’？”他认真地说：“我不适合，这工作太复杂了，我这个人有点性格，有的人很怕我，但是我这个人是很有感情的。”

此话我相信，吃过这么多苦的人，内心世界充满感情。又听他说：“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我有同感，特别是文人从政、做官，难！但我觉得：“你不是干得满好的吗？”他自顾自说：“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一定要很冷静，不能动感情，所以我说我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唔！似满有道理！

若能回头重新走

“若能回过头来重新走。”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还是愿意搞我的‘工’，因为我原来是学工的。”

从中学起，鲁平即入工业专科学校，上大学读的也是工科。

据悉当年有位英国犹太人雷氏德在上海发了大财，又没结

婚，去世后留下大笔遗产没人继承，后人使用这笔钱建立基金办了雷氏德工业专科学校，有大学、中学。鲁平介绍：“这间学校非常好，师资很强，全是英国老师。学生从初中一开始，所有科目都接受以英文教学。学校规模不大，收的学生很少，因此很难考，我是自己考进去的。”

哈哈，我觉得好笑，我是不信命的，但世事当中的许多巧合却又出人意表。当初谁又会想到这位接受英国人教育的孩子，日后专与英国人打交道，处理中港、中英问题呢？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还时时与港、英“对着干”呢？可能这就叫命，有时真是不得不相信这似乎是命中的安排。他说：“英国人不像美国人，当时美国教会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几个大城市都有教会学校，但英国人就办了这间学校。”哈！这所学校就让你进去了？他答：“正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了租界，把学校的所有英国教师都关进了集中营。学校由日本人接手，成天向学生灌输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等思想，书念不下去了。鲁平从初一即入此校，原想在本校念完高中，再升大学，这都不用考试。

然念至高二就非得转学了。他介绍：“雷氏德学校的学生进学校后先打好英文基础，越往高年级念越专。读至初中三年级先淘汰一半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上了高中的学生，已没法转往别的学校念书，因为连化学元素、三角几何的名称，学生只会用英文表达。当时只有圣约翰大学是惟一的英文大学，因此我们雷氏德学校的学生只能考圣约翰。”

鲁平考的是农科，这样，他对工科的爱好的，甚至若能回头也要从“工”的愿望，则要回到他选择初中就读学校的很远年代。

了解外界之工具

听他这段经历颇有趣，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学校有不少地下党员；还办有学习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学习班，收听苏联电台及每天到苏联俱乐部取回的苏联塔斯社新闻；以及有苏联小说、电影看。这样，鲁平早于中学时代已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外围教育。他开始学俄文，并于入大学后的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看苏联的东西多了，影响也深，苏联的重工业、集体农庄见得最多，不禁感叹：“集体农庄真好！”那时他觉得中国要强大首先需解决农村问题，从而抱着一定要在中国建集体农庄的理想。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鲁平在大学的课本里或图书馆的资料中一点都找不到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的介绍，全是美国的一套，如电气化养鸡等，一则自己学农的理想没法实现；二则自己之所学与当时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因为农村连电尚没有，何来电气化，因此他为自己学的一套完全用不上而苦恼。

“我现在仍喜欢工科。”已过几十年，又届退休年龄仍未改初衷，鲁平介绍，学校让学生自己动手修自行车、汽车，他们把汽车拆散后，又把零件一件件组装，还学开机床、刨床。他说：“由于有这段经历，所以后来我在干校当电工时，这些技术都派上用场。”

到干校后期，各方管制较松，晚上闲来没事，他便自己动手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装好一部送一部给人。那时的环境，谁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不得了：听新闻是它，听样板戏也是它。根本是当时惟一自娱和了解干校以外世界的工具。

“我们‘牛鬼神蛇’和‘反革命’，什么消息都不让知道，连《人民日报》也不让我们看，包括林彪叛逃事件也不让我们知

道。”他为自己安装了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所以他说：“实际上我早已从短波电台中收听到了。”有一天参加劳动，让他们把干校门口的两条大标语涂掉，那是林彪书写的“大海航行靠航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他当然知道原因，但故意问：“为什么要把副统帅的标语涂掉呀！”人家的答复是：“让你涂你就涂，问那么多干啥！”哈！讲到颠倒是非年代叫人啼笑皆非的往事，鲁平才逐渐轻松起来。

坚持讲实话不易

人们都知文革时很多冤假错案，在当时的环境下，讲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那时的人要么不说话，有时要说真话并不那么容易，而鲁平说：“那时我对冤假错案坚决顶住，一再的‘逼供讯’我坚持讲实话，就算再受委屈，被屈指为罪魁祸首仍讲实话。幸好当时他们对我还算是较客气的，没把我抓进去。有时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能够钻研问题，比如当年安装收音机，如碰上收音机没装好或是坏了修不好，我可以一夜不睡，通宵达旦地无论如何找出原因，直至完全修好为止，修好了我也很高兴。反正干什么我都有一定要钻研到底的精神，不管多难，也要找各种各样的资料，自己去看、去研究，搞出个结果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学工科，搞工业方面工作，可能会干出些名堂。”

这些大概印证了我所说的，他具有四川人的犟，四川人的直肠直肚。

而事实上他从政，在港澳办也干出了名堂，但他仍很坚持：“我还是不宜干这工作。我是真心诚意想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使香港繁荣稳定；我的的确确想为香港人做点事；把香港搞好了，也为国家好，两者不矛盾。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认为不对立，就因为这，便有人感到我为什么老替香港人说话，而

我想，我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是否身居官场二十年，晋身高官多年，鲁平也感到累了、倦了、厌了？我不得而知，也没打算问他。

但我确有同感：文人从政，难；文人当官，同样难！

七·一才是开始

让我们回顾一年多以前香港那段历史。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先生的伟大构想，而真正实施却是前无古人，对中国、对香港无疑是个新课题，也是极大的考验。

与鲁平长谈时，没几天香港就要正式实施“一国两制”了。回归脚步声近时，主管香港工作的鲁平讲：“我在港澳办反复讲，作为港澳办就是要使‘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成功实现。而真正贯彻‘一国两制’是在1997年7月1日以后，这才是开始。什么叫作‘成功地’实现呢？就是一定要使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定要做到这点，如果香港将来变成了烂摊子的话，能说‘一国两制’成功吗？”

鲁平的话今天言犹在耳，回归后一年多的香港，今天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亚洲、以至全球性金融风暴及下，香港也不能幸免。股票指数从一万六千多点降至眼下的七千多点，港人的信心亦受到极大考验。“一国两制”现在是真正的贯彻执行，已成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所以鲁平当时说真正检验“一国两制”在1997年7月1日后是有根据的。

“一定要香港回归祖国后才检验得出来。”他再一次强调，说到熟悉的话题，鲁平已从深沉的回忆中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当时他眼前的紧迫工作中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他再重复一遍：“到时才能真正实践，现在我们说相信‘一国两制’一定能在香港成功、一定能实现，虽然我们只能这样说，但我有信心，

因我的确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得出这个结论。但这毕竟只是个信心，要通过实践证明。对我们港澳办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一定要做到这点。”

“有人说我们老是替香港人说话，不明白我怎么替港人说话了。”我听后也觉好笑，只听他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对国家有多么大的好处，也是国家最大的胜利；试想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了，香港变成了烂摊子，真不知将是什么后果。我们要捍卫、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和政策，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实现。”

鲁平的愿望在香港实践了一年多，世界各国及香港绝大多数人士对中央在港贯彻“一国两制”政策持肯定态度，并给予高度评价。

他已经成竹在胸

国务院港澳办创建至今二十年，鲁平心里很明白，目的只有一个：一切工作为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瞻前顾后，经历了几多不知不觉的风风雨雨，度过了多少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回归前夕，当我在北京港澳办再见到他时，他比平时更精神、更充满活力，深感他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已成竹在胸、信心十足。当时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相信香港人自己能把香港管理好，要相信他们，从现在的一系列事实发展看，香港人的确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而且一定能比英国人管理得更好。如果没这信心，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将成为空谈。”

他的话，充满辩证法；他的话，是十九年参与香港回归工作、见证香港历史后发自内心的真言；他的话，带有预见性，在回归一年多后正逐步得以证实！

那时的鲁平，深切感受到自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后，中央一直真正放手让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这感受是直接的，来自中央高层、来自香港人。他说：“不要去施加任何意见，我们一定要相信香港人能作出正确的抉择。好在中央的领导站得高、看得远，从全局看问题。我做的工作虽然有时候挨骂，或被一些人打小报告、说三道四，有时也很辛苦，但在中央领导下，自己再劳累也值得。我心里明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任何人，也不是为个人，所以我不需要去巴结任何人，但我是完全同意中央领导同志的看法与安排。”我在想：官至鲁平的高位，也有难言之处，也有苦衷困扰，但他的一番话，发自肺腑、真情流露。

有话我一定要讲

满头银霜是他独特的标记，香港传媒甚至亲切称他“百头佬”（鲁，广东话鲁、佬同音）。

原以为漂亮的银发为他的风度再添风采而已，然听了他对人生之忆述，我方猛然发现，那根根银丝似乎透出阵阵寒光，变得格外沉重。我仿佛看见丝丝银发饱蘸着汗、饱含着泪，甚至在滴血。

正是：人生路，添风霜；回归路，白了头。

1997年缘月，鲁平终于病倒了，香港传说纷纷，传媒界的猜测格外多。公开，他们为鲁平寄去众多记者签名的慰问卡；私底下相告，异常担心，回归在即再找谁来主政？他们指的是香港工作，对香港的熟悉，及港人的接受。我告诉鲁平：“别看香港传媒平时如何报道你，那是他们职责所在；但香港人自有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对你怎样我很清楚，如众多人签名的慰问卡，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那感情是真的，私底下他们对你是好的，尤

其是近三年采访中港新闻的记者，我太清楚了，人总是有感情的。”

默默点头，若有所思，他认同我的看法，他说：“我的病不是小病，动手术后，本来我真是不想干了！病中正好碰上香港的许多重大事情要处理、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出来不行，我把自己的意见老老实实告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想，反正还有那么多天，不管怎么样，拼老命也要干。无论如何要把中央领导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使香港真正能平稳过渡。”

“说老实话，我的病也是这样来的（积劳成疾）。”听得我很悲凉，已届古来稀之人，工作压力大之外，还得承受许多。我也感到很心酸，干嘛一心工作、为国的人总有那么多不被理解，但愿这些都成为过去。他继续说：“当时我想，我犯得着吗？各方面受气，自己内部是内部的事，香港人有些也不理解，天天在报纸上骂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我是正确的，我也有错误，有些看法我也不明白，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但我的出发点的的确确为国家好，为香港好。”

“一句话，反正我凭党性在这里工作。原则，我一定要坚持；有话，我一定要讲。如果我认为话讲得对，我一定会坚持，中央能接受我的意见最好；如果我的话不对，中央可以随时把我撤了，我对个人没有任何想法。”

句句铿锵，掷地有声。鲁平碰到许多事，似在矛盾的漩涡中；许多话，像憋在他心里很久，不吐不快。

我问鲁平，回归在即，最想讲的话是什么，他说：“我坚持相信‘一国两制’一定能在香港实现；坚决相信港人一定可以把香港管理好，我对香港的前景一点都不担心。当然期间会有这样那样的大大小小问题，我相信香港人一定有办法解决，香港人一定可以完全克服。”

一番话，以宏观来看较多，但一一被他言中，是他对香港多
员

年研究之积累。

很不错的年轻人

谈及港澳办今后的角色，鲁平说：“今后我们保证全力支持香港的工作。香港回归后，港澳办会坚决贯彻‘一国两制’，使其在香港真正实施。我刚才已经说过，‘一国两制’在回归后才真正在香港实践，所以港澳办的任务还很重，不要认为回归任务就完成了，只是刚开始，将来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发生。”

从1997年7月1日到目前仍在延续的金融风暴就是许多人没法预测到会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将来我们要使各部门、各省市了解‘一国两制’，了解为什么要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千万不要插手香港的事情，一定要放手让香港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任务很难。”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诞生特区政府，很难；但特区政府要很好地运作下去，更难。”这句话我在回归前讲，现在看亦应验。

“对我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干一件对人类或对国家有意义的事，这辈子就没遗憾了。”要求太高了，我笑他干的这件事可是惊天动地的。他谦称：“要干好也不容易。”

为回归工作，港澳办回归前几年来了不少年轻人，多是我国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许多还是研究生毕业。过去几年，因为预委会、筹委会秘书处的共事，我与他们时有接触，他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据鲁平介绍，回归前的港澳办共有一百多号人，当中有一群很不错的年轻人。

“我们对他们很严格。”鲁平介绍：“但我的确也很爱护他们，年轻人很可爱。他们都是凭着信念在港澳办工作。因为港澳办是

‘清水衙门’，大家埋头苦干，非常勤快，经常加班加点，连加班费也没有。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同事要是到外面去干，可能会找很多钱，但他们都能在我们这里安心工作。我个人希望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这班年轻人能继续在港澳办干下去，他们都大有可为。”

对这班年轻人，我有体会，他们工资低微，工作艰苦，生活清贫。与他们聊起知道他们都是为着一个信念：为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工作、奉献。他们工作的勤快与劲头令我钦佩。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留在港澳办工作，有的又已投身于 1997 年澳门回归祖国的工作中，对他们可说是驾轻就熟了。

坊间有传，在港澳办谁被鲁平训得最多、谁被他要求最严的人，则是他最器重的人、认为是最有前途的人。人们说的最多的是现任政务司司长的徐泽先生与经济司司长的张良栋先生，想来有点道理，我曾亲眼目睹他当众训徐先生，而平时所见，他们关系也好。他则解释：“我们的年轻人大有前途，我是对他们很严格，年轻人一定要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成才，该批评的仍要批评，该指出的也要指出，相信他们将来一定会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

语重心长、殷殷期望，这班高质素的年轻人，不会辜负鲁平的重托。

鲁平主任以下述一番话作为采访的结束语：“我对香港的确也很有感情，真心实意希望把香港的事情搞好。香港好，国家也好；国家好，香港也好。”

香港已回归祖国，经匆匆过去的十九年努力，鲁平、以及鲁平率领的国务院港澳办的工作，尤其是他多次提及的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现已在回到祖国的香港实践和检验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归后才是真正的开始，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相信鲁平早已意识到，从年龄考虑，他已把希望寄托在港澳
151

办的一群年轻人身上。

然而，一切的一切，我们留待以后评说。

采访后话

采访完毕，步出鲁平主任办公室时，我似乎尚未抽离。

幸好碰上港澳办的一帮年轻人，我确实难掩能成功采访鲁平主任的兴奋心情。过去在秘书处的同事也恭喜我，并透露我是鲁主任退休前最后接受采访的记者。

我原以为自己是回归前采访鲁平主任的最后一名记者，果然回归后不久他即退休，更是深居简出，转入低调。据悉，回归前夕有一百多家中外大传媒机构向港澳办申请采访香港回归祖国的关键人物鲁平先生，据说工作人员挑选了三十几家让他挑选，他抽出了我。

知道后我是受宠若惊的，在荣幸万分之余我心里非常明白，单凭我，当时是香港一份不算大的报纸的记者，绝不可能争取成功。我终生难忘过去秘书处的一班同仁之帮助，甚至劳动到当时港澳办社会文化司赵司长、卫副司长、陈处长、主任秘书及一帮“哥儿们”，没有他们的奔波、中间的汇报、电话联系，极难达成愿望，他们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鼎力相助，是给足了面子。

鲁平主任位至部长级高官，然极尊重作者。稿写好后，为尊重他，我传真与他过目，除了有两部分他认为与当时庆回归的欢乐气氛有悖、况且自己过于悲凉的身世不想冲淡回归前后的喜庆外，几乎没作什么修改，从题目、小标题到内文。我是好一阵感动，是对作者的信任，而且没有任何的指示或交代，完完全全表现出他特有的大度。

有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他赢得了我原来对他尊重以外的尊重。

可能是文人出身、又经历不凡，三个多小时的倾谈对他来说太少了，对我来说又远远不够。他有一肚子的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当时我就对他说：“九七后你没那么忙了，抽个时间，我一定要再来北京，与你长谈，我要为你写传。”

但愿我的愿望早日实现，相信也有很多读者盼着看《鲁平传》（暂定名）。

鲁平的一生，更多的、更有意义的是见证历史，他见证了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以及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跟随共产党的历程；解放后，他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感受颇深、磨难良多，亲身经历感人泪下；特殊环境的工作，对香港、香港回归的全过程的了解、掌握，本身就是历史。

历史的见证，见证历史。鲁平本身就是一本书！

1997年 远月 回归前初稿

1998年 怨月 源日写毕于香港

罗康瑞：

1995年，我太太，不，当时还不是我太太的她对我说：“你做事的态度和干劲，很像一本书中描写的那只海鸥。”当时这本书很出名。为了追求飞行的更高能力，海鸥一直忍受磨炼的痛苦，总去尝试飞得更快、更高、更远，给了我很大启发。

海鸥约纳堂

罗康瑞小传

罗康瑞先生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普宁县。

曾于香港圣约瑟书院就读，十五岁赴澳洲读书；于新南威尔斯大学深造，1972年学成回港。

1975年创立香港瑞安建筑公司，至今发展为瑞安集团。

曾任香港总商会主席，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香港筹委会预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等。

现任香港工商专业联合会主席、会长。

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特邀顾问、港美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董、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等。

最近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以表彰其在香港社会事务及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中的贡献。

1997年 7月 1日，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写的人物专访中许多人，与这个日子有关联。

因为这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成立。那是因后过渡期，港英政府、末代港督彭定康单方面抛出政改方案，破坏了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平稳过渡的协议。

中国政府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成立了一个工作机构——预委会，以求应变，也就是外间有人称之为中方的“另起炉灶”。历史性的决定往往要待事后才能予以评说，而到了 1997年元月成立筹委会时，我已醒悟到：幸亏有了预委会。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果真一表人才

然正是在预委会刚成立当天，我听到一个与“历史意义”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扯不上关系的话题。

有行家告诉我，绝不止一位，而是多位：“委员中有两名靓仔——梁振英与罗康瑞。由于特别上镜，记者都爱采访他们，他俩总成为记者追逐采访的热门人物。更有行家悄悄告诉我，有女记者，特别是“妹妹仔”记者采访罗康瑞时，都会精心打扮前往。

哈！有这等事？我倒真想见识见识这两名“靓仔”。细看之下，果然都是“靓人”一族：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但以我之见，“靓”中有别：前者更英（英伟），后者更俊（俊俏）；而罗康瑞更添几分腼腆，几分羞涩。

那神情直让我可以把他当邻家小弟弟，当他听我说完此话，也忍俊而笑，旋即满脸通红，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第一次到瑞安中心，他在顶楼，一踏进他宽敞的写字楼，迎面一片开扬，是全海景写字楼。

我忘了礼仪，直奔大落地玻璃窗前，第一眼所见，是象征香江的海港，他的大楼正对着出海处。

“建大楼时，我曾研究过当时的城市规划，就算将来，大厦前面都不会有遮挡。”他的话从背后传来。眼见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我问他盖大楼时有否请“风水先生”看过，他的答复则是从城建考虑，看得更远。

俯身下望，似高高在上，地面一片郁绿，小公园就在大厦旁，美丽、别致的图案悉数全收，我情不自禁：“好靓啊！”美景如画，真想多欣赏一会儿。

此时好像听他在说：“再靓我都有得睇（再漂亮我也没份儿看）。”美景就在眼前，抬起头或往窗户走几步即可，为何不多看几眼？“唉！边有时间（哪来的时间）！”

哦！也有难处：忙！

天地一沙鸥

一只海鸥，在红日中展翅翱翔，从1989年起，它成了瑞安集团的标记。

选择海鸥，满有诗意，但定有其特殊含义，对吧？“一个很凑巧、很偶然的时机。”罗康瑞介绍了一段美丽的故事：“1988年，我太太，不，当时还不是我太太的她对我说：‘你做事的态度和干劲，很像一书中描写的那只海鸥。’她介绍我看这本书。”

写于七十年代初的短篇翻译小说《天地一沙鸥》，用拟人手法描述了一只非凡的海鸥：约纳堂。“当时这本书很出名。”罗先生继续说：“我看过中、英文本，内容主要介绍约纳堂向往飞向高空，它不断向自己的飞行能力挑战，为了追求飞行的更高能力，海鸥一直忍受着磨炼的痛苦，总去尝试飞得更快、更高、更

远。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发。”

海鸥挑战自然予罗康瑞以启迪，使他觉得人生的目标应定得更高、更远，于是他以一只在红日中展翅飞翔的海鸥为图案，作了集团的标志，象征着集团上下要不断学习进步、精益求精、奋发向上的海鸥精神。

也许当时是女朋友的太太说话特别听得入耳，也可能与“约纳堂”的共鸣强烈震撼着他的心灵，总之在整个访问中，罗康瑞无论讲述他的成长过程、他的事业发展，还是他的为人处世，都离不开翱翔的海鸥——约纳堂。

严父调教真情

仪表堂堂的罗康瑞现在掌管着总值数十亿港元的资产，一间颇具规模的集团公司，而当你与他聊天时，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轻松，因为他：真。

罗氏家族在香港颇有名气，对罗氏几兄弟社会上有“罗家几（按他们排行冠以）公子”之称。罗康瑞就是出身于这个富裕、殷实的家庭，罗家九兄弟姐妹儿时都好怕不苟言笑的父亲。罗康瑞回忆：“我们小时候都好怕爸爸，只要一见他在房门口出现，双脚便发抖。”他边说边比划当时的模样，还说：“每餐晚饭便是他教训我们的时候。”我问：“你们的饭岂不是吃得很辛苦？”他点头：“是呀！每次吃饭，有父亲在场我们个个都好静。”

父亲罗鹰石从小对自己的调教他仍记得很清楚。约七八岁时，一次与父亲外出，一乞丐上前乞讨，父亲给他钱时，不慎把一枚硬币丢在地上。康瑞看见父亲立即弯腰在地上拾起重新放在乞丐手中，小康瑞深感意外，父亲没多作解释，只对他讲了一句话：“乞丐也是人，对人要尊重。”

父亲没受高深教育，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也不懂英文。但为

了子女，他教人先教己，自己先学，再教儿女；每逢寒暑假或别的假期，父亲经常要他们众兄弟姐妹每天写一篇文章或日记，老父则于晚上挑灯逐一修改。

康瑞留学澳洲六年，其间只获老父准许回港一次，他明白父亲绝不是从经济情况考虑，父亲之良苦用心在于让儿子在外国独自去面对，接受锻炼。就连这仅有的一次，老父也要亲自、主动带着儿子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电车或巴士去上班，有时会带着儿子，父子俩徒步走一程，目的是让儿子接触社会，亲身体会打工的真实生活。

一切的一切，看似桩桩小事，然从小给康瑞留下深深的印象，对老父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深情地说：“到自己为人父时，方觉父亲的伟大。”平时常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罗家的人都那么会做生意？”看了罗康瑞的故事，相信自然有了答案，那就是罗鹰石先生自幼培养子女们自立、奋斗和向上的精神。

现今罗氏九兄弟姐妹均事业有成，或继承父业、或自立门户，生意都很成功，老父自然开怀。

除了家庭教育外，康瑞始终觉得尽量要保持自己的真，无论对己对人，最紧要一点希望保持自己的“真我”，就算对任何人讲话，也希望表达自己真诚的意见。

拳理怡情养性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发生在康瑞十三岁时。当时哥哥的同学拉哥哥去学艘春拳，康瑞觉得有趣、好奇，也尾随哥哥去学，结果很沉迷。我问：“父亲知道吗？他这么严格会视你大逆不道。”他笑着说：“开始爸爸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很爱运动，待父亲知道后，居然宽厚，只当我做运动，也接受了。”

我觉得好笑，也不相信：“你一表斯文，那么怕羞，也会去

学拳？”他说：“开始完全没有清晰的目标，但一开始学就很投入。我始则领略拳术的拳理，继而欣赏个中的哲理。”拳术竟让他说得那么深奥，然见他一脸认真，不像儿戏。

开始学时，师傅总是安排其他师兄弟过手，眼看别人打得很灿烂，心里不是滋味，独自坐在一旁暗嘀咕：“为何师傅不让自己打？”师傅似看透他心思，只是对他说：“你先打好根基。”他听从了，待他上场出击时，初时占下风，可不一会儿，便超过所有师兄弟。

此时师傅才说：“因为你根基好。”学拳术给他极大启发，他明白：成功不是侥幸的，凡事要学习、磨炼、打好基础。

二十三岁，年纪轻轻的罗康瑞自立门户，踌躇满志成立自己的公司，他把拳理用在自己公司的管理上，说起来头头是道、有板有眼：“自己识得（懂得）保护自己，才可以去攻击别人。螳螂春拳最重要是掌握自己的中线和正确的位置，其实管理和拳理一样，要有正确的位置。螳螂春拳的拳术以中、直线为主，很直接，我受其影响，处事不会拐弯抹角，比较直线、直接，像打拳一样。”

没承想斯斯文文的他，打拳心得多箩箩，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大条道理，还直接给予他在生意管理、待人处事上的影响。

我琢磨：他的真，他的直兴许均受拳理影响，他还认真地加以说明：“待我儿子再大些时，会鼓励他学正宗螳螂春拳，真的，对年轻人很有帮助。”

我仍不罢休，再次感到奇怪，缘何这般怕羞之人可以学拳？他承认：“自己天生怕羞。”还讲了个儿时的故事给我听。

小时候上学，先生（老师）一开口：“罗康瑞，你回答。”他说自己话没出口已满脸通红，他忙拉着自己的耳朵说：“这感觉现在都能感受到，简直像发烧一样。”那神情，仿佛小学生罗康瑞就在眼前。

可幸经过多年尝试、学习，今天的罗康瑞面对社会、面对镜头已自然多了，完全懂得表达自己。说至此我又笑起来：“你不知道自己‘好得意’（很有趣），简直像邻家大男孩，我看你时，总有种弟弟的感觉。”他连声笑着说：“多谢！”

在他腼腆的笑谈里，你会油然感到真，因为你面对他可以不设防，可以无顾忌。

此种交谈不可能经常遇上，然倾谈过后，细细咀嚼，叫你返寻味。

从政纯属偶然

出生于商贾之家，兄弟姐妹中缘何就他一人从政？他的解释是：“很偶然。可能上一代经历过政治斗争和战乱，对政治有戒心。从小到大，父母从不鼓励我们兄弟姐妹参政，不主张我们花太多时间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家族都以做生意为主。”

妈妈出于对儿子的爱护，尤其反对康瑞从政，老太太实在太了解儿子的性格了，认为康瑞不适合从政，责怪他参与太多事。

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推选罗康瑞参加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其后，“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八十九工商专业咨委召集人。”他说自己也没料到会这么投入做这么多工作。

参加基本法咨询工作后，他觉得香港的前途很大程度维系在香港人自己身上，作为香港市民和中国人理应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应该积极参与做好这件事。他对妈妈说：“妈妈可以放心，我自有分寸，我只是贡献力量为香港前途做事，自己从来没有打算投身政界。”

回归前几年，罗康瑞刻意低调，因为过去数年他经常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未来行政长官扯在一起，当时他说：“好荣幸被人看

得起，但很了解自己的性格与做事方针，自己没有去做（指从政）的性格与经验，所以不适合做此工作。”他相信每个人应做自己可以发挥和可以作出贡献的事，不可以勉强。后来他觉得大家明白了，好少人再提起此事，少了猜测。因此“自己觉得轻松了，更开心了”。

记得曾问他，是否考虑九七特区政府成立后从政圈退出，完全不从政？他说：“我完全没有计划或安排九七后从政。但每个人，人生在世几十年，许多事不是自己去计划就会发生的，如果需要的时候，有重要的工作我会去做，现在许多事情不能过早讲定。或许十年后，我的脾气、性格发展到可以配合环境需要去做需要的事呢！将来的事很难讲。”

香港内地两忙

香港回归一年多，我看见罗康瑞的生活跟从前没太大区别，仍然天天埋首公共事务及瑞安集团的工作。每天下班，总见他很习惯地把一大堆沉甸甸的文件往公事包里塞，以便回家在晚饭后争取时间审阅资料。

九七前，与他长谈过，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性格和经验不适合从政，要刻意低调，以免别人把他的名字与政治扯上关系，现在又如何？

他说：“答案还是没有变，我从来没有从政的打算。然而人生的目标是会跟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改变，没有人可以说将来一定会有什么发展和转变。不过，目前而言，我只希望可以做些务实的工作，为社会出一分力，特别是促进香港及内地经济计划的发展。”

罗康瑞与他的伙伴们最近开发长江流域的计划在香港传得沸沸扬扬，搞得相当红火，前几天与香港工商专业联合会会长王英伟

先生谈起，我才联想到罗先生多年来一直担任该联主席与会长职务。九七前，该会主力为促进平稳过渡及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等问题作策略性研究，并向政府提出建议；现已平稳过渡，联会重新定位，主要为促进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很相信，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罗康瑞的话表白了自己目前正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以期共同开拓新的互利互惠机会。

1997年初，瑞安集团旗下的建筑与建筑材料系统的业务，以瑞安建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身为主席的罗康瑞带领全体员工为争取最理想成绩而努力。

“否则我便愧对小股东了。”他一方面这么说，另一方面把集团地产系统的业务向内地拓展。除了在上海淮海中路地铁站上盖兴建甲级办公大楼外，还参与投资把上海一些“窝棚户”改建成现代化住宅小区……总之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经常穿梭于香港、上海。

幸好罗康瑞身边有一群当年与他齐齐“打江山”、齐齐成长的“老”臣子，他们配合罗先生打理日常运作及业务，以便让他拨出时间参与社会事务。

最近见到罗康瑞，越发的精神焕发，他说：“长江流域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是极具潜力的庞大市场。对香港而言，与上海携手在长江流域发展，将会大大加强港商到该地区投资的兴趣和增加投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在沪港工商界的协助下到长江流域投资。”

早一段时间，罗康瑞以“沪港经济合作”会议联合主席的身份，与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就沪港两地合作开发长江流域一事进行了多次研讨，并于1995年9月成立了“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负责调查研究长江沿岸的投资环境及机会，并制订、统筹和推行有关的推广策略和工作，罗康瑞再次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分析：

“香港、上海、长江流域各有自己的优势，三大力量加起来可以互补长短，创造更好的条件。‘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的合作计划若能成功，将会对长江流域好、对上海好、对香港好、对国家好。”

1985年 远月，促进会的港方人士组成了专家小组，邀请香港三大学院的经济专家、学者，对长江流域地区投资环境进行深入研究。罗先生亲自率队前往武汉、南京考察，以便 怨月份举行大规模咨询工作时，广纳工商、学界及有关人士对两地合作前景的意见。

人们看见罗康瑞的外表：英俊、腼腆、羞涩；然稍作了解，你马上会看清他外柔内刚的一面。

他二十三岁离开父荫，自闯天下，立志以海鸥约纳堂为学习、奋斗目标之初，或许是充满浪漫、满怀激情，然经历二十七年之天地间的博击后，今天的他，已是自觉地与约纳堂连在一起，不断高飞！

1985年 怨月 苑日于广州

陈佐洱：

我们家与政治无缘，我曾经有志愿，想当作家、记者，其实粉碎“四人帮”后都实现了。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尽可能提高待遇，实际上我一直持这个观点。

无缘政治却政治

陈佐洱小传

祖籍上海，~~1936~~年 ~~10~~月 ~~15~~日生于上海。

~~1954~~年随父母迁居福建厦门，小学、中学均在此度过。

~~1956~~年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

~~1960~~年毕业于后任福州一中教师，达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学、习作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1978~~年任《福州青年》杂志编委、副总编辑。

~~1980~~年 ~~12~~月调往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一年后任社长；~~1985~~年春上北京，兼任总社港澳台部主任。

~~1987~~年底调往国务院港澳办，历任副司长、司长。

~~1990~~年 ~~1~~月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1991~~年 ~~1~~月被聘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

~~1992~~年 ~~1~~月调回国务院港澳办任副主任至今；同年 ~~12~~月，被聘为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

他，曾是一位驻港中方官员。

香港人似乎对他很熟悉，但几乎全是从电视、报刊等传媒中了解。

他是位怎样的人呢？相信只有真正认识他后，与他有朋友式的交谈，才可能了解他。

三者——巧妙结合

其实，要真正了解他也不太难，因为：

我以为我直，他比我更直；我以为我真，他比我更真。

只要略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传媒匆匆而过的镜头，各取所需的片言只语，只是真实陈佐洱一个极小、极小的侧面；甚至是……说不上真实、谈不上侧面。

因为陈佐洱其人，就算我认识他几年，有机会真正坐下来畅谈时，我感到也只能了解他多些侧面，或是稍大一点的侧面。

他极有内涵，不是一两次长谈可以真正了解。

虽然我们同是出身于记者，经历、背景也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他清晰的理念、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政治目的，以及他巧妙地把三者结合为一体的思维、口才，更让我望尘莫及，也令他赢得许多人赞赏。

在他的叙述中，我了解了他的出身、他的成长、他的经历；他与家人在文革中的磨难；以及他本人遭遇的种种。

我在心里说了个“服”字，但同时我又想：凭他的性格，在官场中打滚，是否有点……

“马桶”——童年笑话

八九岁时，家人爱管他“马桶”、“马桶”地叫。我笑得不能出声，直呼：“好奇怪的名字！”

原来上海话的“模童”与“马桶”近音，“模童”即“模范儿童”之简称，荣获“模范儿童”称号嘛！家人高兴，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他告诉我，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是因为积极参加宣传，又好像是抗美援朝捐零用钱买飞机大炮。总之，年仅八岁的佐洱于1950年被评为“上海市模范儿童”。

他记得，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的第一任市长陈毅，与宋庆龄女士出席了“六·一”儿童节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营火晚会，并接见了全体模范儿童，自然小佐洱也在其中。

“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父亲如释重负，不断打电话给朋友们互道庆贺：‘解放了，解放了！’”他忆述一早醒来听说解放军夜里已经进城，连忙随父亲走到淮海路，亲眼看见解放军真的睡在马路上，秋毫无犯。与外间传闻一样。

尽管长大后的他，从没想过参政，然在他小小年纪时无意间已涉足政治，是否从小就注定了他将“弃文从政”？

请看：年纪小小的佐洱耳濡目染的事情使他对新中国有个很好的期望。朦胧中他似懂非懂地第一次接触政治、第一次走上街头宣传政治、第一次认识政治。许多的第一次，似早已为他的政途作出铺垫。

一本名为《芳草遍地》的散文集，我看了，全书收集了陈佐洱不同时期的创作，首篇《一桶鱼虾》竟是他十三岁时发表于《园地》（现《福建文学》杂志）的处女作。

真是：小荷已露尖尖角。十三岁的少年郎已经文笔流畅、描

述细腻、取材真实，显露出超乎年龄的文学功底。我问：“有被称为‘小神童’吗？”

他有意回避，给我讲了个童年“马桶”的故事。

文革——伤痕累累

“我崇拜小平，没有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解放，没有粉碎‘四人帮’，我们一家恐怕早就完了。”文革，一场大灾难，许多中国人亲历不同程度苦难，在“四人帮”倒台后，内地涌现许多反映人们在文革中遭难的作品，大家统称其为“伤痕文学”。陈佐洱说：“文革于我，是一场很痛苦的经历，‘伤痕文学’我也有一段，可称家破人未亡。”话音沉重，神情悲痛。

故事发生在文革。父亲原来的助教，在颠倒的岁月迅即窜上造反派头头位置，我们姑且称他“某头子”。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某头子一定要把父亲打成反革命，无所不用其极。他使尽一切手段：批斗，拳打脚踢；游街，脸上被涂墨；抄家，古董文物全抄光。

某头子的一番话陈佐洱至今记得：“你有个‘狗儿’（佐洱），便宜了他，如果是早几年，念什么大学？他没资格读书，该去劳动，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恶狠狠的话语侮辱人格，然世事无绝对，当时陈佐洱惟一能做的还真是只有读书，他一头扎进福建省图书馆的中外故纸堆中。

是得，是失，日后即见分晓。但经此浩劫他感受颇深，切肤之痛得来的教训，认为：“再也不能重温文革灾难了。所以我对那段时间‘含着眼泪从内地走过罗湖桥’的香港人非常理解，也非常痛恨极左和极左路线，简直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伯乐——我的恩师

1958年春，他又碰到一个偶然的机

会。一名少年儿童声情并茂的朗诵，使得听者中的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众多教师都洒下热泪。那是1958年春，福建召开模范教师代表大会，陈佐洱执笔写少先队员献辞。他以自己和家庭多年的经历，倾注了心血、倾听了心声，加上少先队员非常投入的朗诵，引起了共鸣，听众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当时内地正刮起“伯乐风”，几天后，省委办公会议寻找作者，陈佐洱一下子被五六个“伯乐”单位“相中”，而他自己则选择去创刊一本新杂志——《福建青年》。不到两年，杂志办得小有名气，被评为全国一流青年刊物，杂志社也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单位。

“我的恩师之一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林一心。”陈佐洱记得很清楚，是这位“伯乐”解决了当时他需要解决的包括工作出路、入党等一切问题。

1959年，陈佐洱的事业又有一次突破。

“欢迎、欢迎，等你们三十八年了！”这句陈佐洱说于1959年12月15日，当时他作为中国新闻社代表，奉命接待台湾《自立晚报》编辑李永德、记者徐璐。这是两岸记者在中国内地第一次握手，被喻为解放三十八年来两岸交往的第一次突破。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与争议。

由于飞机延误，陈佐洱在首都机场苦候了几个小时才等到他们，一见到台湾同行，他迎上前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这句非常得体的话。一时间，这句话成了传媒报道的热点，并被传为佳话。

据悉，当时中央一位有关领导拍板叫好，说：“好！”陈佐洱

讲到此，很开心，笑着说：“从此我也就好起来了。”

政治——原本无缘

其实一见面，陈佐洱即告诉我：“我们家与政治无缘。”

细数起来，不无道理，请看“家谱”：

父母均为大学教师；

两个弟弟都是博士，小弟弟陈佐湟是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博士指挥家、两年多前新组建的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

伯父陈伯吹，现年九十三岁，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家；

堂兄陈佳洱，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

上述为陈氏家族最亲近之全体成员，所有成员均为知识分子。

陈佐洱出身书香门第，我问他：“你们家祖辈没有人从政吗？”他说：“据我所知没有，我曾经有志愿，想当作家、记者，其实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愿望都实现了。”陈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是全国记协理事、全国散文学会理事等，却从没料到会从政。

他的一生中似颇多偶然，一次偶然的会，“伯乐”林一心发掘了他，他从教师转行当记者；再一次不太偶然的机遇，他接待了台湾来的同行，~~1985~~1985年他被调往国务院港澳办。陈佐洱觉得能参与洗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代人的光荣。

眼下，他又参与洗雪我国近代史上第二个国耻的工作，当上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效力。

我问他这些转变习惯否？他再次说起这问题：“幸亏港澳办的两位领导手把手教我，从熟悉香港政策的方方面面开始，进入情况；自己也愿意学，对小平同志的思想心悦诚服，所以可以很

自觉地去干。”

总的计算，陈佐洱从政也只有十年，但已在中国的港澳事务官员中崭露头角。

协议——参与达成

从跟随港澳办原主任鲁平谈判新机构问题，到一夜间起草谅解备忘录中文稿，陈佐洱逐渐为其对手——英方官员，以及香港社会所熟悉。

后来，他赴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至 1990 年 1 月离任，整整四年。有人根据新闻“爆料”记录，替他列了一张“时间表”：

1985 年 12 月，谈了七年的军事用地协议达成；

1988 年，谈了六年的终审法院协议又达成；

期间与期后，中央达成一致的协议还有：排污协议、多项重要经济专营权纪要、特区护照的签发准备工作协议……

跨越九七年的财政预算案是过渡时期一大问题，从 1989 年 1 月至 1990 年 1 月，中英双方举行了十二次专家会议，终于从一开始的谈不拢，到共同编制出了一份符合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预算案，并由特区候任班子提交临时立法会通过，为成立伊始的特区政府打下一个好的财政基础。

1990 年上半年，香港政权交接的事务紧锣密鼓。陈佐洱率领的各专家小组，除完成财政预算案编制外，还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人员及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香港，以能在 7 月 1 日零点即担负特区防务责任，同英方日夜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协议。

据传媒报道，陈佐洱与英方谈成的最后一项协议，也就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香港回归前的最后一项协议——关于香港政府资产交接的协议。

时间是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三时。

以为他负责经济、财政预算案等工作，经介绍才知，陈先生的工作范围有：政治、经济、防务、文教、出入境等十几个议题。

他在翻阅了上述“时间表”后再三强调：“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我有幸参与，但仅是一名执行者。然事无大小，全靠北京的英明领导。所以成果都是外交部、港澳办和大使（指当时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赵稷华先生）指示的结果。体现了中央的决策，包含了前任的努力、集体的智慧。当然还有英方的合作。争取多一点合作比少一点好。这不仅有利于香港平稳过渡，也符合两国利益。”

香港回归，多少人付出了努力，陈佐洱讲述的工作部分，也是整个回归工作重要的一个侧面。

车毁人亡——真实含义

港人对“车毁人亡”一说不陌生，陈佐洱曾毫不忌讳与我说起曾在本港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他告诉我，当时他的原话是：“这个港督（指末代港督彭定康）来了以后，社会福利的增长像高速赛车一样，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车毁人亡。”

陈佐洱介绍，他说的这句话是中英双方磋商财政预算案时，他从量入为出编制的角度谈及的。以他之记忆，自己讲过的话绝不含糊，他说：“我讲得清清楚楚。当时香港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而社会福利却连续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是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五倍，而英方官员还声称要继续搞五年，达到第一世界水平。试问哪个政府吃得消？”

他的原话很详细，说得很清楚，结果竟被“浓缩”成：陈佐
源

洱反对搞福利，搞福利就“车毁人亡”。而对他前面那段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却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正面批驳。说及这段经历，他仍有少许激动。直至今日，事实上仍有传媒断章取义地引用他的“车毁人亡”论，真似百口莫辩。

记者出身的陈佐洱，仍保留着传媒工作者喜欢观察人和事、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因此来香港后，他喜欢到处走走。他形容：“我去过最繁华的地方、也去过‘笼屋’；既坐过‘靚’车，也挤过各种公车。车上市民多半认识我，我也会与市民谈论楼价等问题。”他颇有感触：“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尽可能快地提高待遇，实际上我一直持这个观点。”

就在那次谈判完，坐在从北京返港的飞机上，一位素未谋面、素不相识的人向他竖起大拇指说：“陈先生，你讲得好，我们支持你。”在香港坐的士，司机请他签名留念，告诉他：“你讲得很好，福利不能太快发展，不能‘车毁人亡’。”还有些市民通过报社、新华社香港分社写信给他表示支持……

内地广泛流传一句话：“理解万岁。”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令陈佐洱十分感动，人家要“浓缩”自己的原话，只能徒呼奈何；而获得市民的支持方能真正感受到理解的重要。他真诚地说：“社会福利一定要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我相信香港的老人在九七年后一定会生活得比现在（港英统治时期）好，因为基本法已经给予保障。”

为陈佐洱做访问很容易沟通，他记者出身，又是作家，非常清楚记者要问什么、喜欢问什么，而问题之答案他早已成竹在胸。记者的提问他多半满足，还出乎意料地讲一些你没想到的问题，诸如“马桶”的故事，便很有趣。同时任何观点不强加于人，用词平实，叙述中干脆利落，绝没多余的话、多余的事。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印象，包括记者的训练、外交官的训练。

自他回北京后，我没机会再与他聚首，当我打电话去北京，

表达想重写此稿时，他马上给予答复，并在一两天内便告知新资料，很专业、很配合。

他在香港的一段工作，是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

很记得访问行将结束时，他很自信，也很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

我也坚信：“公理自在人心。”

2005年 12月 15日于香港

方黄吉雯：

我真正觉得一个年轻人的勤力，是其成功的最大因素，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平白无故得来的。今日香港的所有成功人士，从开始到现在，都在继续努力做事。所以年轻人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成功，只需要把握机会，他一定会取得成功，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白领丽人 勤于己 勤于人

方黄吉雯小传

方黄吉雯生于香港，广东省新会人。

在新界读小学；于庇理罗士女子中学毕业。

1985年赴英国伦敦，在英国伦敦城市学院攻读会计。毕业回港后于安达信公司任职至今，历任会计师、经理、合伙人、国际行政局委员、中国及香港地区董事副总经理等职。

曾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经济小组组长、筹委会经济小组召集人、港事顾问、第一届特区政府推委会委员，香港立法局议员、市政局议员、区议会会议员，国际财税委员会理事、香港总商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现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等。

她清丽脱俗，长年梳一头过耳根直发，常见她喜穿剪裁得
源

当、缝制精巧的高级行政人员套装，典型的香港中区白领丽人。

说心里话，认识她这么久，首先是被她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

整洁而淡雅

约好时间，与她在写字楼门口相遇，我们一齐步向她办公室，推门而进，我赞叹一声：“啊！好清雅，一如其主人。”

她笑说：“今天没有收拾，很随便。”我告诉她：“我去过很多办公室，可能你是女性，感觉上尤为干净、整洁。”

环顾四周，墙上分别挂有三几幅字画，清清淡淡的；桌面摆放少许文件、书籍，整整齐齐的。我还是“哇”了一声：“好淡雅、好整洁的办公室。”她仍是谦让，我想她可能习惯于此，并没与其他人比较。

其中一面墙上有三幅字画，中间一幅尤引起我注视，那是我国已故著名书画家朱屺瞻老先生于九十六岁高龄时专为吉雯书写的，一看便知是一流的书法，六个字隽永、流畅、秀丽。

见我若有所思，注视良久，方黄吉雯指着字画介绍：“我最喜欢这六个字，‘忠于己、忠于人’是我的格言。”我说：“我们今天的倾谈虽没更好地了解你的忠，但却欣赏了你的勤。我感到已为我的访问定下主题，不妨借用朱老先生的话，稍加修改，以‘勤于己、勤于人’命题，如何？”

她略作思考，认同了。

一个野孩子

我赞她是典型的中区白领丽人，她却告知：“小时候我像个野孩子。”我哑然失笑：“什么？什么？你会像个野孩子？”她忙

说：“艳呀！艳呀！（是呀！是呀！）”挺认真的，不像开玩笑，但我仍摇摇头，笑着告诉她：“说真的，你怎么讲我都不相信，瞧你斯斯文文的，怎么可能像野孩子，怎么个野法？”

她不紧不慢认真解释：“我出生那年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香港仍是个很穷困的地方。我在新界长大，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记得在新界读小学，像个野孩子。”看见我的狐疑，她很肯定地说：“是呀！是野孩子，返学（上学）不穿鞋打大赤脚，放学后脱了衣服周围走，像个野孩子般没人管。其实我小时候读书的根底不是很好，在新界长大，没受过严谨的教育。不过在新界读书好轻松，算是读完了小学吧！”

看她的认真劲又想笑。

眼前的她与“野孩子”怎么都不能连在一起，她又那么认真，不到你不信。

成班“箩底橙”

很感谢她不讳言，告诉许多鲜为人知的童年往事，而且对自己普通人家出身，从“野孩子”过来也不避忌，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嘛！

在新界轻轻松松读完小学后，十一岁时，谁知有一天会随父母搬到香港（指港岛区）。“野孩子”首先碰到的是升中学考试，几乎傻了眼：“我连粤语都不会，考试成绩肯定不理想，便被派往圣保罗男女中学中文部。”然她父母明白，在香港生活、工作，一定要学好英文！父母不厌其烦再去申请，吉雯终于被派往当时港府资助的惟一女子中学——庇理罗士女子中学就读。

现在忆及上中学时的情形，方黄吉雯没法忘记：“好艰难！我记得第一年考试，我几乎考至近后尾的几名。因为全是英文书，我一点英文都唔识（不会），上课时我莫名其妙，考得很差，
源

所以读悦班，我们的年级分为粤月悦三个班，悦班是三个班中成绩最低的一个班。”

“中二（中学二年级，相当于内地的初二）读悦班最困难。”她继续说童年往事：“先生都觉得我们无可救药，根本就不教书，课堂秩序很乱。记得先生很生气，常骂我们‘箩底橙’。”

吉雯挺不服气，常常找粤月班的同学借笔记本，自修补习英文，于是在中三升上月班，中四已升上粤班。她笑着说：“我是个较贪玩的学生，待成绩好了，我整个人又懒惰下来。”

那个时代的学生，为家长者都望孩子将来做医生。读至中六，吉雯的成绩已相当不错，她满以为自己可以考入香港大学读医科，谁知公布成绩时，她的成绩不太理想，她回忆当时：“学不了医，我很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爸爸妈妈够冷静，他们建议我还不如到英国读会计，因为爸爸是会计师，回来可以帮助爸爸。”吉雯失望之余只好赴伦敦，“学后却发现会计很适合我。”

在英国她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试成绩也很好，并在英国会计公开试中得奖，又当了优异生。她总结大学的学习：“可能是有了中、小学的教训，上大学已不敢再贪玩了。”

大概就是吉雯身上那股不服气的劲儿，从新界到香港；从“野孩子”成了优异生；从一班“箩底橙”中冒出头，晋身女强人。

吉雯终成大器。

全凭勤于己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是人们早早可以预料到的。吉雯学医不成，反而在会计专业学出名堂，并成为终身职业；而待她于1976年学成归来时，父亲却已过身，帮不了他。

她愤而不做公务员，进了私人机构安达信公司，从最低层做起，至今二十五年。“我从英国回来后，心中有个概念。”她说，很认真：“一个人从生出来，就处于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景况，有的人一生出来就很聪明，有的人则不那么聪明。我心里想：若你比我聪明，但我比你勤力，我们之间的机会就扯平了；但若我比你聪明，又比你勤快的话，我一定做得比你更好。于是我发现惟一能支配自己成功的效率便是勤力。我决定了，下决心在新上任的公司要比任何一个人勤力。头两年，每天上班，我坚持在全公司中自己是最迟走的一个。我确实经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

积二十多年之切身经历，今天她颇有体会：“我真正觉得一个年轻人的勤力，是其成功的最大因素，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平白无故得来的。今日香港的所有成功人士，从开始到现在，都在继续努力做事。所以年轻人不需要羡慕别人的成功，只需要把握机会，不断努力做事，他一定会取得成功，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我比你做多十年，你不用羡慕我，你像我一样勤力，十年后，你同样可做到我的位置。”

读者信否？但这是她自身经验之谈，有其道理。

我则惊叹她的高论，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成功人士，名气颇大。观其外表，娇小玲珑，淡雅高贵，她与我说的许多都是我没想到过的：关于“野孩子”，关于“箩底橙”、有关勤于己。平时她很低调，很少听她讲什么话，说话时轻声细语，完全想象不到她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我也看过她急冲冲，说话挺急，似想发火的时候。那是她看见我们秘书处工作人员做事跟不上节奏，不领会她的意思，达不到要求之时。但这种机会极少，我直感她是个极讲效率之人，却没想到她胸怀大志，决心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且是自大学毕业后就有的。

我告诉她：“约你采访，我诚惶诚恐。”她不解：“点解（为什么）？”我说：“怕你拒绝。”她笑说：“不会拒绝你。”我说：“认识你五年多，从没见过你接受过专访。”她说：“咁又係嘅（可也是呀）！”我再说：“况且平时见你只专注于工作，极少发表自己看法与见解，真怕被你拒绝。”她笑着点头称是。

“勤”字伴终身

安达信是一间国际公司，九百多间公司遍布世界各地。

吉雯从会计师做起，升任经理至合伙人。通常从加入公司起计算，升至合伙人约需十一二年时间，她只用了八年，自己总结，靠的是一个“勤”字。”

“对我来说，更困难的问题因为我是女人，过去，公司不升女人做合伙人。”她的成功绝没有侥幸，且听她说：“公司在全世界所有的女合伙人中，我在年资最高者中排行第二。记得八韵年我怀了孩子，公司对我存有很多疑问，考虑我生孩子后会否放弃事业或分散精力，甚至降低工作能力。再三考虑到底该不该升我职，最后我得到公司信任，八一年升我为合伙人。”

“香港很成功，她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因为能融汇新移民成为一分子。”她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到见解：“香港有许多机会，我们应该给新移民同样的机会，只要他们勤力，十几二十年后也能创造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未来，成为社会的动力。我也希望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学生应对自己有信心，只要不放弃自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我读中一时，先生似乎也放弃我们，但我天天读书到天光，不放弃自己，我不肯睡觉，晚晚坐在客厅读书，困了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醒了又继续读，坚持一年，直至升上月班为止。”

我问她是否班上最突出、最有成绩的一位，她谦称不是，不

知道。但回头看，当时的全班同学中，她应是学有所成的一位。

在英国读书时，她也以同样的勤奋取得好成绩。“直至工作以后，我也一直勤力到今天。”她的“勤力经”有许多可取之处：“升任高级行政人员后，我觉得应为下属做榜样，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让下属做；自己要做最勤力的一个，晚上经常做到一两点。”我说：“你这样做工作，家庭怎么办？”她说：“家里很容易处理，只有一个女儿，先生亦是普通书香子弟，我们各有各的事业。”

不想自己是女人

在一间跨国的国际机构工作，女人要出头不容易，需比男人付出更多。吉雯认为香港有许多机会，若要成功，秘诀在于：第一不要想着自己是个女人。

又把我逗笑了：“你是个很女人的女人，是个真正的女人，因为仍然好靓，为什么不是女人？”她很认真地说：“做事要成功一定不要想着自己是女人。一想到自己是女人好像样样要吃亏、要特权，但我是不应要吃亏、要特权；第二，永远不要与别人比较，一旦与人比较就会患得患失，只能自己看自己，自己份内事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最好不要拿出来；第三，看待工作永远从老板的出发点看问题，你尚未做老板，已经以老板眼光看问题，从老板利益的角度看问题；第四当然是勤力，全心全意做事。”

“还有一点最重要，不要三心两意，要看清自己的方向。”

她一口气说了一、二、三、四，全是她在国际大机构二十多年之总结，她的成功也在乎善于总结。

二十几年间，从没想过“跳槽”吗？她说也有其他公司向自己招手，其中亦不乏条件优厚者。但从一开始，她就立志要在本公司做至最高位，这么多年来她均以此为出发点，为自己定下目标。

记得当初见工时，吉雯还是个“妹妹仔”，招聘她时，由大老板面试，她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奇。请听以下对话：

大老板：“你来我公司做事，你想做什么呢？”

吉雯：“终于当然是做你的位（置）。”

真要对这小姑娘刮目相看，大老板原意是问她应聘后想做什么工作，她的回答则是坐上最高位。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

然她似乎觉得自己的理想并没真正实现，她说得很真诚：“世界似乎对我好讽刺，~~九二年~~我应该争取到公司最高位了，然九二年我开始被聘任为港事顾问；还有 ~~九三年~~以后的预委会、筹委会，我知道我的时间难以支配了，我主动问公司提出愿意选择做副总经理，正职之位让给全职人士担任。”

追求这么久，眼看快实现了，不可惜吗？她坦言：“我觉得在我生命中，我应该为香港、为国家做事，这对我更重要。”

没想过纤纤巧巧、斯斯文文的吉雯内心蕴藏着如此深奥的做人道理。

神秘兮兮地传

预委会经济专题小组一下冒出个小巧玲珑的女人任组长，许多人愕然，坊间传说纷纷，许多话是我亲耳听来的。

有人问：“中央怎么搞的，香港经济界那么多大‘鳄’，什么时候轮到她当组长？”

又有人云：“就算会计界，排了很多人也轮不到她。”

更不乏人传：“她与中方关系很好，与某某很熟。”

还有神秘兮兮的呢：“陈方安生、李柱铭都是她亲戚。”

……

看她在我面前说了很多，我大胆地把这些问题全问了，她也
缘

挺大方，一一作答：

“经济组组长是找人出来工作，不是比谁挣钱多，或许人家不愿意做，我愿意做呢？还是那句话，我不想与人家比别的，我只是尽本份，勤勤力力地做。我是在做具体工作，主持会议，收集资料，派发文件，样样亲力亲为。”

所做工作该是受到肯定，预委会后她继续任筹委会经济小组召集人，其后更被董建华行政长官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

“老实说，我与陈方安生没有一点亲戚关系，她的‘方’姓与我夫家的‘方’没有任何联系；至于李柱铭，确是我夫家的亲戚，我先生的一位亲姐妹是他太太。”

十八万公务员之首陈方安生与方太没有亲戚关系；而与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的亲戚关系又能助她什么？我想不起来。

总之任何事情都是见仁见智，从我认识的她及她从小不服输的倔劲，我更相信她是一个依赖自己的人。亲力亲为惯了的人，不太容易依附别人，我相信。

一个女孩跟了她二十年，从大学毕业开始便跟她做秘书，两人合作得很好，既是上下属关系，又是工作中好拍档。但为了她的前途，吉雯忍痛“割爱”，把她调到大公司做秘书，以求更大发展。

始终，她是一名女人：心细，人情味十足！

寻觅归属感

香港生、香港长的人普遍会遇到归属感问题，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使港人没有了国家，但他们始终是炎黄子孙。许多人在本身的成长过程中，从不解、朦胧、思考、抉择中，渐渐觅得归属，找到自己的位置。

方黄吉雯是其中的一员，这过程往往要经历一番痛苦。

读中学时她有个问题很不解：为何中国学生每天要唱英国国歌？当然啦！她读的是港英时代的政府学校，受的是殖民教育，向学生灌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的，使学生抗拒多于接纳。

1985年，吉雯第一次去英国，下飞机见到一个英国人是撞（开）货车的司机。她即时愕然，为何英国人会从事如此“低微”的工作？回想在香港，英国人永远高高在上。她整个人看呆了，非常震惊。为什么在英国本土，什么“低微”的工作都是英国人自己干，可一到香港，不管其有无才华，不论其能力高低，都谋到高职位？不可理喻。

吉雯在英国以好成绩读完书，想当公务员为香港服务。机会来了，适逢港府往英国招募香港税务局官员，心想自己读会计专业，专攻税务，便高高兴兴去应征。但当招募者知道她是香港学生，便对她说：“你不必在英国应征，以后回香港申请即可。”并答应条件一样。

待她回港应征时，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除薪酬相同外，所有优厚福利完全没有。此时的吉雯感到：“英国对我们香港的中国人很不公平。”她愤而不再做公务员、不为港英政府做事，选择了入私人机构安达信公司服务，并一直做到今天。

“其实我是一个好有归属感的人。”她坦承：“每次看奥运会颁奖时，只见各国国旗升起，我觉得好羡慕。常想：为什么香港人像没有国家一样。我是第三代港人，尤其像我们这些在香港出世的人，受的是殖民地教育，殖民地给我们的影响很大，根本找不到归属感与自我。”

“当时中国好封闭。”她回忆寻觅归属感之不易：“我从未踏足过、没机会认识中国。我曾一度好失落、好困扰。直至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我第一次去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外国公司，当时刚好我在安达信公司中，是中国职员中职务

最高的。初时，我随着公司第一次认识中国，接着在以后的频繁交往中，经多年观察，我看到中国的发展，才开始找到自我，回到了中国才感到自己是中国人。”

“我常常想，如果国家强大，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可以抬起头来，会感到骄傲。”她终于寻觅到了：“所以，我调整了做人的真正目的，那就是想国家强大。我感到高兴的是，以我做会计师的背景，是相当中立，不偏帮。我想：以此为出发点，对与不对，均能客观地表达意见。亲眼看着国家的转变，我作为桥梁，很有满足感。”

吉雯一脸的满足感染了我，回想与她开诚布公的详谈，使我加深了对她的了解。

但她轻声细语的一席话，至今仍久久在我耳际回响：“我没有强的背景，出身于一个好普通的家庭。我清楚地知道：路靠自己走，前途靠自己去创造，成果靠努力争取回来。我的嗜好是工作，勤力是我成功的最大因素。”

1995年 12月 16日于香港

刘汉铨：

要真正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政治架构、价值观念和传统，很不容易，需真正去学，用心灵去感受。

情从缘生

刘汉铨小传

现年五十一岁，广东省鹤山人氏，第四代港人。中、小学在香港就读；在英国伦敦攻读法律，并取得法学士学位。

毕业后任律师至今。

曾任港事顾问、预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推选委员会委员、临时立法局议员，香港律师会会长、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法学教育咨询委员会成员、税务上诉委员会成员等。

现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非官守太平绅士，双语立法咨询委员会成员，新机场及有关计划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为什么要到山顶去？为什么要到后来被我称为“白宫”的那间屋子去？

带着一连串的“为什么”，我坐上了他的私家车。有司机开车，他一路与我说话，然太多“为什么”了，任由他说，他的话

缘

怎么都进不了耳朵。

尽管我频频点头称是，但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原拟好的采访问题明显地被他搅乱了。

车窗外，景色的变化提醒我，我们已从繁华闹市渐往清静的山上驶去。但我脑袋空空，仍未进入角色。

唉！真烦！

山边白洋房

私家车驶入山顶消防局后，进入一道小径，望向左前方，一座纯白色建筑物旋即呈现眼前。刘汉铨律师的寓所便在其中。

山顶为香港高尚住宅区所在，许多豪宅依山建造，隐藏在绿树丛林中。山顶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港岛全景尽收眼底，也许是上班时间，车辆、行人稀少。

阵阵山风，夹带着绿草的清香、海洋的气息，轻轻拂面，好怡人啊！还有什么值得烦？

如约上他中区律师楼，刚坐下没说几句，他说午饭时间到了，我准备了工作餐，吃完再说，然吃完了他却有会议，改天再来。

唉！第二次准时上去，又是刚坐下没说上几句，他便建议：“你非要到我寓所，方能写出你的要求。”我纳闷：“哈？我话未出口，竟知我有何要求？到底内里有何乾坤？”

礼貌上我不好拒绝，只好跟他前往。

认识他，因为他曾是预委会、筹委会委员，他以律师个人的身份加入，尽管后来成了党魁——港进联主席，我仍视他为律师，无论任何场合、无论参加任何活动，怎么看，都觉得律师最适合他。

然倾谈时，他首先说：“我的心路历程是从中国文化开始。”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与著名律师倾谈，完全抛开了律师行业，说的是与律师行当全无关系的另一版本。

接下来的整个过程，既不谈法律，也不谈干了大半辈子的律师生涯。

他把我带进了人们看见他、认识他以外的另一个天地、另一个世界。

好奇怪！从踏入他寓所的那一刻起，突然，一个个故事自自然然冒将出来。

我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要邀请我到 he 家里做访问。我明白了，他大概看多了我的文章，每每访问之初，我常说：一不谈政治，二不谈生意。皆因这些内容香港传媒写多了，我的人物专访只能跳出这框框，挖掘别人不写的素材。况且一写政治很闷；二写生意有卖广告之嫌。统统避开，写些小玩意儿，更添生活情趣，让读者多捧场嘛！

“中西合璧！”进入那座山边白洋房，刚进刘氏寓所，我冲口而出的便是这四个字。

可不！乍一看，梳化、餐台、大钢琴……统统西式；仔细瞧，室内摆设古色古香、美轮美奂。整个寓所价值不菲的古玩、字画绝大部分出自家传，有的已记不清传了多少代。

倾谈有别于以往，许多故事要走到跟前仔细告诉我，于是我拿着录音机，客厅、饭厅、房间，满屋子地走，走走停停、边走边谈。

在刘律师眼前、身边，信手拈来的每一物件、每一字画，都有娓娓一段缘由，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我的一个个“为什么”，很快便在白洋房里找到答案。

用心灵感受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有几千年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刘汉铨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政治架构、价值观念和传统，很不容易，需真正去学，用心灵去感受。”

“从小到大我没机会崇洋。”我说奇怪：“你从小受西方文化影响，也亲身感受到西方的物质生活比我们好，怎么理解你的不崇洋？”他说：“小时候，我时时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在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小转折，只需做适当调整，重拾中国文化昔日的光辉，继续加以发扬。与西方比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特点、有其灿烂的一面，我不觉得西方文化有什么优胜于中国文化的方面，只是到近二百年，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才积弱，而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如果再继续稳定，二十年后必转新天。”

平时怎么没有发现，也许没机会发现，刘律师说起中国文化竟是一套一套的，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见我满脸疑问又接着说：“我从没机会崇洋，但我接触很多西方文化，也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我比较之后觉出两者间的不同，又可以互动。在此根基下，几十年来我看见许多问题，能够吸收西方的长处，适应现代生活，但不会感觉别人比我们优越。”

刘汉铨认为西方文化采取了单元化发展的道路，而中国文化是多元化，但又不排外，一直接受外来文化，并慢慢融合其他文化，孕育和发展了汉文化。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一要了解中国历史，二要反映人的心声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在不同环境下的心声，从文学中可看到。历史就是过往的经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脱离自己的过往历史，去影响将来。

论及中国的文化历史，仿佛看见他身为律师的口才；雄辩滔滔，论点、论据有理有节；环环紧扣，绝不是信口开河。

家庭之因由

“中国的‘君子文化’在外国称为‘英雄文化’，我希望能全面、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话题一直没变，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化历史转：“如何解释‘君子文化’？我生长在香港，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影响。我很喜欢自己的家庭和太太的家庭尽量保存并传下来的文化熏陶。”

哦！谈至此，我似慢慢理解他对中国文化喜爱的原因。果然听他说：“好彩（幸好）我与中国文化结缘是来自家庭的原因，结缘后就慢慢滋生感情，并慢慢受到很深影响。但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不可能停留在以前，一直留意把西方文明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是顺着历史发展孕育出来的，除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外，人根本脱离不了自己的根，因为人从一生下来就受到家庭、社会的影响。”

从太爷那代已来香港，刘汉铨是第四代港人。自爷爷一代起，父亲、自己全能操双语——汉语和英语，他自认更是长期受西方教育，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家庭“一直没有脱离祖国的怀抱”。

从刘宅的摆设看，处处感到一种贵气，像是达官贵人之后，我猜想他或他太太的先人、长辈里，肯定有朝廷命官，甚至官及一品或更高。我笑问：“是否八旗子弟？”见他犹豫，我又补了一句：“争气的那种。”他承认自己有四分之一的旗人（满族）血统，并解释是纯正的中国人，却不是纯汉人。

但从小在家里受汉文化影响，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加深了解，年轻时许多不了解的问题现在已明了。刘律师形容自己接

受中国文化的过程是从家里老人家要求背诵中国古诗词始，他一直很奇怪长辈们也受西方文化影响，为何却如此欣赏、赞誉中国文化。

“后来，自己看到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因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取得成功。”他说：“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成功，充分证明中国的文化可以适应现代的经济社会。”

我仍然没弄清楚，何以刘氏家族从爷爷辈起已受西方文化影响，却仍能保持中国文化传统至今？他答：“每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会受历史和经验的影响，我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出世是喝米汤、稀饭，而不是喝牛奶养大的，他们的生活中肯定有中华传统思想的固有影响，从中国文化中产生能量，以保持和尊重自己的民族。”

“小时候，我不明白，带有强迫性，被家长强迫灌输；长大后，才开始作比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适应中华民族。现阶段中国文化已经开花结籽，完全体现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已日渐成为一股很大的经济力量。”

颇有意思，刘律师对中国历史文化很有心思，从小家庭的熏陶，加上他的独立思考，终形成个人看法。

帝赐红讌文

厅堂内珍藏令我目不暇接，保存完好的玉如意，彩釉瓶，康熙字钱，青花碗，台围，椅搭织锦，觐见皇帝的大串朝珠……应有尽有，让我大饱眼福。

世代相传的家珍，无一不渗透着刘氏历代至今对中国文化的珍爱；同时也让我很直接感受到刘氏家族的显赫背景。寻常百姓家，哪有觐见皇帝时专门佩带的珠链，而且是大大的珠、长长的一大串。

我还是忍不住，试探性地问了：“你家以前定是贵族、高官，先人中有为官者吗？官至几品？”他哈哈大笑不答，告知家族的过去不欲向外界透露太多，都成了过去，免遭人误会或猜测，最后说：“不要讲太多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说着从里屋拿出一本深蓝色封面、貌似线装书的物件，边翻开边说：“你看过用红字写的讣文吗？”孤陋寡闻，确实没见过，讣文因丧事而起，因而但凡讣文都以黑字书写。他指着手上的“线装书”解释：“此讣文由满清状元题艸，你看其中的‘诰授’、‘赏载’、‘钦加’等均为红字，为何用红字？相传逢皇帝赐予均用红字，连讣告也不例外采用红字。”

红讣告我是首次观赏，传至他手上所见仍完好无缺，字迹清晰、红字耀目；状元所书，皇帝御赐。祖辈过世，享受御赐，极尽哀荣。显赫家世毋需细说，已见分晓。帝赐红讣告足以证明。

“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处在于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眼见我欲深究，聪明的他立即扯开话题，转移我注意力，虽不情愿，也暗中称他醒目。只听他接着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是自己的东西，不是人家的东西，亲切感不同，那份感情与反应不同。你在中国生活与纯粹去学习不同，这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深情和爱。”

在屋里踱步，细听刘汉铨逐一数家珍，逐一拿出让我欣赏、掂量。许多家珍藏于博古柜里，内有灯光照射，水分滋润。说句真话，如此珍贵，走来走去，拿出拿进，我确是心惊惊，生怕把他价值连城的珍宝碰损、摔烂。

反观他，则毫不在意，全身心陶醉在我国古文化的欣赏中，钟爱之情溢于言表。我渐渐受到感染，他的话题似许多未能尽诉，留下让我思索。我若有所思地告诉他：“我今天的采访像是到了现在才刚开了个头。”

至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律师形象已渐模糊，而他说的：“我
迂

的心路历程始于中国文化。”则逐渐清晰。

我的思路已理顺，一篇律师以外的腹稿已渐形成。

复合小瓷瓶

刘氏宅内，真有打碎了的珍宝——一枚约六寸高的小花瓶。

只听他说：“你拿拿，好轻的。”我轻轻接过一掂量，是呀！好轻！细看，薄得不能再薄，我说了句：“哇！薄到不得了，是薄胎。”又听他说：“你看看瓶底。”反过来一看，“清仁堂制”四个字清楚地印在瓶底。

我自然不解，他介绍：“清仁堂是官窑中的官窑。你仔细看，小瓶上有裂缝。”果真，裂缝还不少。原来有段故事。

九年前，刘律师的儿子在屋里玩乒乓球，一个不小心，乒乓球飞出打个正着，薄胎小瓷瓶“嘭”的一声，应声落地，马上落地开花。现在看到的是复合件。“我们小心拾起，以胶水把碎片逐一粘拢。”他回忆当时年仅七八岁的儿子也吓坏了，连声说：“大件事！我长大后找到钱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给你。”家传之宝“惨遭”“粉身碎骨”，作为刘门子孙自然心疼。然身为父亲的他则对儿子说：“流传至今的官窑制品不多，不计它的古董价，小小古瓷瓶起码值几十万元。我希望你长大后，不单只想法买回一个古瓶还我，只望你长大后能为保存中国的文化艺术做些工作，那比你赚几十万、几百万买回一物件给我更值得。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点。”

为父的一番话令儿子如释重负，做父亲的没有责骂儿子，而是以简单的道理、深奥的含义启发儿子。很可能刘汉铨本人就是经祖父、父亲如此这般教导出来的，他再以此家训训导儿子。相信今天正在成长的儿子对七八岁时发生的事不会忘怀，父亲开导的一番话也会永记于心。

我问：“小瓷瓶传至儿子是第几代？”他答：“不知道是第几代，这里的古玩都传了好多代。啊！中国古玩做得‘靓’至如斯地步，其手工叫你叹为观止。”

本不想干扰他之雅兴，还是问：“小瓷瓶打烂了，可惜吗？”他避而不谈，自顾自从侧面说：“由于打烂小花瓶，而换来保持他愿意为中国古文化艺术做些事，我觉得值！”

访问结束，步出屋外，那被我戏称为“白宫”的小洋房在余辉中越显尊贵、高雅。我邀他在“白宫”前为他拍下多帧照片。在屋前的茵茵绿草、开阔庭院映衬下，山边白洋房越显气派。

私家车沿着山路下来，我脑海里仍想着那只可爱的薄胎小瓷瓶。

我问他：“你真觉得打烂了小瓷瓶，会令你的子女继承刘氏家族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吗？”他挺认真、蛮有把握：“绝对有信心，我的子女会继承这一切！”

一九八〇年 九月 八日于香港

霍英东：

其实我做人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以退为进，成功时多少有些满足感。我的家庭比任何人都苦，我不知如何理解自己，不管有多困难，我还是喜欢迎接挑战，我想让大家理解，冒险不能发达，应一级级、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

吃得苦中苦，方为……

霍英东小传

1907年 缘月 元日生于香港，广东省番禺市（前番禺县）人。

出生于贫苦水上人家，成长于战争动荡时期。受私塾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帆船同业学校，于香港皇仁书院读完中学。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时辍学。

做过铲煤、打铁、日军机场苦力、磅米等。

1946年与友人合资杂货铺，自任兼职伙计；战后开始学做生意，开拓房地产业后发展多种经营。

很早便支持我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

1981年获广州市中山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春田大学颁授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及获国际奥委会颁授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1985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

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预委

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国际足球协会执委等。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世界象棋联合会会长等。

外间传得更多的是他今天的成功，事实也很难让人联想：今天眼前的亿万富豪，昔日早已饱尝人世间的种种磨难。

待与他进行了两三次合共有五六小时的倾谈后，我不禁对他说：“今天的你正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了’。”他连忙谦称：“切不可说是‘人上人’。”

其实我也不愿意以如此老套的话形容他，然霍英东吃的苦，的确称得上“苦中苦”；而他目前的政治地位与拥有的财富，又堪称“人上人”。

伟大母亲

过去见他，三句不离便讲体育，他花了许多心思、精力在体育，他从年轻时代起即酷爱体育，体育对他太重要了。我理解。

然此次是采访，不想只谈体育。甫见面即告诉他：“外间看你是位很成功的人士，请谈谈从小到大你是怎么过来的。”似过于拘谨，过于行话。可能出于他地位的尊崇，一开口我竟问了个这么蠢的问题。

请听人家怎么说：“我一生人觉得好遗憾，‘奉而亲不在’，明知人死不能复生，但每逢清明节我都会动员一家老少去扫墓。先母的确是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你瞧！人家政协副主席一下就把我引入故事中去。我想少谈或绕过体育，提了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人家却很切题，马上开始了故事的故事。

我惭愧了好一阵子。国家领导人的头衔很吓人，但听他倾谈，全无架子。已年逾古稀，对晚辈之记者，态度、语气、用词，异常的谦恭；所有故事慢慢道来，轻声细语，不急不慢。倒让我有点受之有愧，不知所措。

想起来了，我访问他时正好是清明后几天，难怪一见面他就说早几天清明节时去荃湾永久墓场扫墓的事，并感叹母亲的伟大。

水上人家

我问：“你是哪一代到香港的。”他说：“我们到现在也没法考察清楚，自己是水上人家，五代都在香港，祖父的乡下在哪里也不知道。早期香港有个霍氏宗亲会，我是创始人之一，当时霍氏宗亲会使用的地方叫霍太原堂。太原在山西省，我猜度霍氏老祖宗是否有可能从山西来。”

“水上人过去备受歧视。”很坦承，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也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他说：“八十年代我曾去过一次南京，参观中山陵时，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其中有句‘解放蛋民’，使我觉得水上人受歧视是由来已久。”

他说得没错，以前听说对水上人轻视，称之为“蛋家仔”、“水流柴”，意思像蛋壳与柴一样，随风飘泊，稍遇风浪便船翻人亡。还有，规定水上人上岸不准穿鞋，水上人不能与岸上人通婚等。以前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一部电影《南海潮》，说的就是水上人的故事。

有云：热极生风。水上人以船为家，以船谋生，终年在水上飘流。一次刮台风，霍氏的船（家）沉了，幸好母亲被人救起，而两位年幼的哥哥则落水溺死了。其时英东尚未出世，但他一直知道此事：“那时明知有台风，但根本没有天气预报，我们的帆

船出海后也没法靠岸，任由台风吹到哪里是哪里。其实是九死一生、听天由命。如果不好彩，船碰到礁石、堤岸，便什么都完了。后来我的叔叔也在一次台风中翻船浸死了。”

水上人家像无根的浮萍，终年担惊受怕在水上，哪一家没有一肚子的辛酸。

祖父霍达潮曾拥有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做货运生意，可到英东出世时，家境已非常艰难。不堪回首的往事，令霍英东说起来也格外沉重，他叙述：“先母的遭遇很少人有经历。那次沉船之后，我们一家人搬上岸居住，代人雇船运输煤炭，记得当年一吨煤炭的运费仅一毫子多些，每吨赚取佣金才几分钱。我也不明白当时的水上人怎么生活。”

“我爸爸从来没穿过鞋。”他说：“水上人的小孩基本上没袜子、没鞋子穿。告诉你一件事，有一次过年，父亲买了一双新鞋，他穿上新鞋到大芬档吃饭，蹲在凳上吃完饭，他竟然忘记把鞋穿回来，因为他从来没鞋穿，已没有穿鞋的习惯了。”

幼年的英东随家人上岸，至今仍记得五十多人挤住在水渠街的情景。

霍英东六岁时，父亲便去世。忽地令我想起，我采访的成功人士中，李嘉诚、曾宪梓、徐展堂、乌兰木伦、孙南生等许多人都幼年丧父，莫非父亲去世后的孩子更早熟，尤其是男孩，他们要早早地担起父亲留下的家庭重担，无形中成为一种发奋图强的动力，终于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我惊讶他们相同的境遇与雷同的成功。

父亲的早逝，令霍英东过早地尝尽人间苦楚。他说：“当时没医学常识，父亲得的是淋巴癌，记得母亲煮田螺捣烂后给他敷，以为可以治‘疮’。那时家境非常困难，而且父亲生病时，已靠典当度日，最后什么钱都用完了。”

香港沦陷后

母亲目不识丁，年纪轻轻守寡，带着三个子女艰苦度日，原想帮人缝缝补补过日子，最后还是选择代人雇用运煤艇的工作。对英东则是：“当时我刚懂事，只知爸爸死后第一件事是我没有书读。”

青少年时代，他的生活曾多次几乎陷于绝境。按族谱近十代的辈份排列，他是“和茂盛发达，耀好应联兴”中的“好”字辈，结婚时取名好钊，然这“好”字在他出生至青少年时期并没为他带来好运。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希望儿女知书识礼，英东大约六岁时，便被人背着去私塾拜师启蒙，接着到免费的帆船同业义校就读。

面对家庭的艰难，英东从小用功读书，在皇仁书院读书时，常考第一，并得奖学金。他笑称：“当时好勤力，几乎读至神经衰弱。”在这里，他接受了比较正规、系统的教育，他回忆：“那时我读书很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然有成绩落至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得脸红。”

那段日子他的生活相当困苦。皇仁书院学费很高，对霍氏家庭是个沉重负担，他记得：“读书时母亲每天只能给我一角钱，皇仁在荷里活道，每天从湾仔走上去，连三个仙的电车钱也舍不得用，仅用四个仙做午饭钱。”为了省钱，霍英东常常不坐电车，花半个钟头急急脚步行上学。

总算读完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他被迫结束学业。

香港沦陷后，霍家的生活如雪上加霜。母亲与人合伙购置的小火轮让日军征用了，生活没着落。十八岁那年，他找到了第一

份工——到轮船上当火炉工，轮船烧煤，他做铲煤。火炉在船舱底，又闷又热，每天从早到晚，回到家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但也好景不长，九个月后，在一次裁员中，他被解雇了。

过后，霍英东花了十元日本旧军票，经人介绍到太古船坞打铁。说是打铁，其实是由日本人用铁钳把铆钉钳住，再叫人用力捶打，不但要出尽力气，而且要每锤都打得很准，否则打在别人的手上可不得了。不久，这份工又告吹。

1942年夏天，日本军队扩建启德机场，需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再经朋友介绍，到机场做苦力，每天工钱七毫半子。因粮食奇缺，初时每人一天配给六两四钱米，到后来要为日本人做苦工才有米配。

为了每天的六两多米，霍英东到机场做苦工，扣除了米款，每天仅得五毫半子，每天花一角钱坐轮渡到九龙的机场是不可以省的，其余路段只好步行。霍先生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时说：“那时好凄凉，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天天数脚步上、下班。开工时尚可，每天放工时踱步回家最辛苦，筋疲力竭还要一步一步挨回家。每天一家人靠六两四钱米度日，什么番薯藤、木薯粉等都用来充饥。”

幸好有位印度籍管工同情他，介绍他做修车学徒。霍生当时很想学开货车，认为能学一门技术可以回到大后方找工作。于是，等别人都下班后他便偷偷学开车，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撞坏了汽车，被日本人打了一顿，兼且“炒鱿鱼”，自然连那份苦工也丢了，每天的六两四钱米也没了。

霍英东受的苦在今天匪夷所思，老一辈深受外族侵略之苦，同时也饱受生活煎熬。但霍生所受的苦远不止此，还有……

杂货铺往事

1949年，母亲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与多人合伙，在湾仔鹅颈桥开了间杂货店，取名“有如”，原意取名“有和”，但登记注册时写得太潦草，误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店照开。这家杂货店就交由霍英东打理，别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以为做了股东的日子好过多了。但……

“我觉得一生人中最苦是在香港沦陷时做杂货铺那段时间。”这段艰苦岁月，霍英东刻骨难忘：“杂货铺是母亲和另外十四个人合股开的，为什么我说做杂货铺比做苦工更苦呢？因为杂货铺油、盐、糖、米、蒜头、豆豉、海味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每天早上，来铺头购货的人一下来几十人，每日只有三个伙记。”我奇怪为什么几十人是一齐来，他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做采购的一大早买齐一天的用料，便于安排全天的伙食。”

“最辛苦是应付这几十个顾客。”他继续说：“而且每位买客都买十几二十个品种，我们要即时过秤，即时报出价钱，并依次不断累计。买家站在门外的咸菜档，中间还有讲价的，秤货品时，顾客随时要求多一些或少一些，我们便随时给予满足，以便多挽留一个顾客。所以每送走一位顾客，收得钱来时已是头昏脑胀了。你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如是，而且每天做足十六小时，感到压力好大。因此在日本仔投降后，我与妈妈说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关闭杂货铺。”

除此之外，原来还有另一段更苦的往事。十四个股东中竟有人做“老鼠货”（水货），日本人来杂货铺拉人（捉人），做“老鼠货”的人逃走了，霍英东无缘无故做了“替死鬼”，被拉入警察厅。

事有凑巧，当他被押着沿街寻找逃走的人时，竟被母亲看见，老人家尾随宪兵，在跟着走时也被捉了去，与儿子一齐被日

殒

本人扣留、灌水，母子俩以为这辈子都出不来了。结果日本人又生一计，转而把妈妈和姐夫扣留作人质，放他出去找那逃走的人，人没找到，妈妈和姐夫被关了四十多天，直至抗战胜利才被放出来。

“从这件事可见得你母亲对你这个独生儿子的疼爱。”他同意我的说法：“唉！我觉得人的遭遇有时好难讲，日本人来时，香港很缺粮，甚至人吃人。”我惊诧：“真有人吃人，你是听来的还是亲眼看见。”他说：“真的，那时的人没法帮助别人，天天都饿死好多人，如果谁一头倒在地上睡着了（实际上是饿昏了），第二天肯定发现他的大腿肉被割去。当时日本人开始捉人，每天几十人、几十人地解到离岛去活活饿死。”

啊？很可怕，我从未听过如此悲惨的人间悲剧，只听霍先生说：“香港最凄凉是没有粮食，香港被盟军封锁，粮食运不进来。”

我记下了一个日期：1945年日本投降前，这个日期告诉我：当时香港只剩下三十万人左右。

东沙冒险记

战后的香港支离破碎、百业萧条。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处理战后大量物资和沉船，有许多剩余物资和沉船运来香港。“我非常注意政府宪报上关于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他说：“我及时落标购回那些只需小修小补的小艇、廉价的舢板，以及海军的机器等，然后迅速转卖出去。我当时没本钱，惟有拍卖船上的旧机器和烂船。”他赚了一万多元。

从1945年到1946年，他说已有了少许积蓄，我以为他赚到“第一桶金”，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了。然接下去的是他“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一个到现在也没法弄明白的东沙岛的故事”。

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有种药名“鹧鸪菜”，可以消滞，专治小孩生积用。当时香港制此药的原料是海人草，听说长在东沙岛的珊瑚礁上。

1955年，二十五岁的霍英东决定冒险去试试，东沙岛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澳门有人肯出每磅一美元价格收购，有吸引力。然他们从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极力反对，他却主意已定，与别人合股，成立公司。在香港长洲招了八十名渔民，加上船员，仅凭一张海图，便带领九十多人从澳门正式启航。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最大一个岛屿，当时属广东省管辖，出海执照须由广东省建设厅签发。由于出海手续不齐全，行至三门关，即被海关扣留。船上的舢板、锚等工具被指为货物，统统扣留。

九十多人困在船上整整十天，带去的咸肉、咸鱼全吃光了，只好转往汕尾。但所招渔民多是海丰人，到了汕尾犹如回到老家，纷纷不辞而别，霍英东只好在汕尾重新招了一批人，再度启航。

终于，他带着新招募的九十多人飘泊到了既没淡水、又没房屋的东沙岛。上岛后，霍英东方明白这里不是什么“金山”，而是“炼狱”，今天霍英东叙述起那六个月的非人生活，虽过去几十年，仍心有余悸。

手持落后的工具，潜入三四米深的海底折腾一天，一个人也采不到半筐。岛上气温高达 摄氏 40 度以上，人人任由烈日暴晒，不知褪了多少层皮。

全岛仅有一口水量有限的水井，除煮食与饮用外，每人每天只获分配半杯半咸半淡的“淡水”，从海上作业回来，又腥又臭，难以想象的是六个月都没法洗澡。

这还不算，原来吃才是最大问题。“出发时我们计错数。”他
殒

说：“原以为可以钓鱼充饥，没想到东沙的鱼很大，我们放下去的钓鱼线全被大鱼扯断了，根本钓不到鱼。有一个月我们净是梅菜送白饭，尽管如此，我们却又不甘心半途回来，因为一回来便全部破产。”

我惊讶他的平静，今天听他说起这段炼狱式的生活，冷静得惊人，语气低沉，表情平淡，似乎激不起半点波澜。杂货铺的日子被他形容为“这一生人最辛苦”；东沙岛则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阶段”。统统的苦似已被他吸收、化解，历尽苦中苦的人，可以想象还有什么可难倒他？他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坚强、果断、深沉等，此时在他的亲身叙述中得以证实，现在我面前的霍英东已让我徒生许多尊敬与钦佩。

“苦熬六个月，回来肯定赚了！”听我这么说，他连忙摇头：“不是呀！不是呀！回来后，又上了一个人生中最痛苦的课程，我们辛辛苦苦、非人生活的六个月，换来一句淡淡的话：全亏了。管后勤的人只列进账，没有出账，说海人草陆续卖出后，不够各项开支，全亏了，什么也分不到。”苦熬半年，一分钱也赚不到，霍英东的心里懊恼极了。但他认为这段“最痛苦的课程”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日后只要想起东沙岛一百八十多天的日日夜夜，不管什么困境和逆境都有勇气和决心去克服。

话虽这么说，我听后仍不禁：“哇！好惨呀！好大的打击呀！辛辛苦苦的六个月，却换来一无所有的下场。你是怎么爬起来的？”他平静地说：“确是一无所有了，但最难受的是妈妈开始不信任我了。”

是第一桶金

最困难的时候，霍英东抱着一个宗旨：看准时机，抓紧时
殒

机，努力寻找出路才是最重要的。

从东沙回来，一无所有，霍英东又天天看政府宪报刊登的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告示，他说：“机遇来了，有天我刚看完宪报，知道有四十部旧机器，随后我以一万八千元中标。心里盘算如何筹款呢？当时我刚从东沙回来，几乎身无分文，连用作押金的一百元也是向妹妹借的。我知道母亲有少许储蓄，高高兴兴回家向母亲借钱，但此时妈妈怎么都不信我，断然拒绝。我又不敢向别人讲。”

借贷无门，眼看到手的大买卖迅即落空，幸亏当时的香港什么行业也没有，许多人都在炒烂船、机器、胶喉等剩余物资。他找到一个老板，告知有批机器没仓库存放，商量租借其仓库存放机器，老板看了机器，同意租仓。霍生看见老板对机器很有兴趣，不失时机地说若看中可以卖予他，老板问他要多少钱，他说：“那时任我有多大胆也只敢开价一千元一部。”老板也愿意出四万元全部买下。霍生说：“事情的发展好似很简单，他看过机器后即刻交钱予我。”

“我把此事告诉妈妈，说这批机器可以赚十万元，只要你肯借一万八千元予我就行了，妈妈仍不相信，不肯借。”说起两母子间的事颇有趣，由于东沙行使母亲对他失去信心：“直至看到我把赚来的二万二千元交给她，才相信。这是我从东沙回来后首次赚的一大笔钱。当然，在与人合作中全亏了会很难过，但回过头想，一生人怎么可能那么顺摊。”

“全世界都说犹太人会做生意，但我的第一宗房地产生意是与犹太人做成的。”霍英东介绍：“我好奇为什么会忽然搞房地产生意。1949年，中国刚解放不久，香港的人口一下子从几十万猛增至两百多万。当时居民住房环境没法想象。房地产业以前叫置业公司，后来叫地产建设。因为刚打完仗，大家对香港没多大信心，那犹太人就是基于这种心态，一次过把二十二万多平方

苑

英尺的一大幅地卖给了我。”

1978年初，霍英东开始经营房地产业，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他很快找出过去房地产业的弊病，决定闯出一条新路。于是他第一个以房地产工业化方式大量盖楼，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等综合大楼，兼分层、分单位出售，并预售“楼花”，提倡分期付款。这在当时是个大突破，也大受买家欢迎。

“很短时间，香港真的大跃进。”他说得很开心：“以工业化的方式盖楼不需要多少本钱便取得很快发展，很快，住宅楼、写字楼、综合商场大厦等各式各样洋楼大片盖起。香港房地产业带动了香港的经济，也改变了整个香港的面貌。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香港房地产业迅速发展。”

霍英东的个人事业也从1978年开始得到真正发展，首次涉足房地产业为他赚取的“第一桶金”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山与天鹅

任何成功人士都会被人问及同一问题，我也问他：“成功的原因？”他谦厚地笑笑，认真地说：“到现在自己也不敢讲成功，讲‘成功’两个字似乎很夸口。我游水游得很慢，但懂得教人游水；我‘揸车’（开汽车）‘揸’得好差，但我很快教懂人家‘揸车’。我如何去理解自己呢？对每样事我喜欢接受挑战，而到现在我都不敢说自己成功，但每样事我都会做好。有人说我锲而不舍，有时我也很傻，我会考虑如何理解自己的命运之神是怎样操纵自己的。”

我说：“你的一番话充满辩证法。”他说：“因为人始终是有外来因素的，我不能称赞自己赚了钱就是成功。”

记得我问他成功原因时，他很为难，总说不出口。待第二次应约到南华体育会见他时，看来考虑了许久，断断续续说出自己看

法。经仔细推敲，方发现他的话实实在在、经验所得、蛮有分量。

中山宾馆与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投资兴建的，言谈中看出他对它们满含深情。然他对深情的理解不是建一座、两座宾馆那么简单，而是他多次强调的“对症下药”。

“建中山宾馆让我体会了如何发挥人的积极作用。”他有棋高一着的看法：“不是投资多少、回报多少的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中建多少宾馆的问题，而是在改革开放中，如何把中国人的积极性调动、发挥出来的问题。如同我为何要支持体育运动一样，因为一块奥运金牌会为全世界的华人、全中国的十二亿人带来民族自豪感。”

我说：“我知道霍先生为国家做了许许多多事。”他坦然大说：“我只是想用有限的资金做更多事。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今天能更好地站立在世界上。所以我觉得自己每做一件事，都希望有一个突破，我这个人的一生，为何做到今天还要做？其实我感到很开心，就如我请人教我的五个子女学游水，教了很久仍不会，索性自己来，我用一日时间教，他们都学会了。哈哈哈！我很开心。”

“建广东中山宾馆时，我曾经作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改革开放之初投资的每一项目他都亲力亲为，今天忆及仍清清楚楚：“当我决定中山宾馆一定要在1980年底开张时，离正式开张仅有五个星期。所有的领导、朋友都吓了一跳，许多人更持怀疑态度。确实，当时的实情是：宾馆用的杯、碟、地毯等数万件物品仍在美国，而全港知名人士的请柬也已发出，没有人会相信可以在中山（当时是一个县）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建宾馆。”

“今天回想，我觉得那个决定很重要。”当时没有先例，是他首先迎接挑战，他回忆：“当时深圳和珠海特区刚宣布成立，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刚起步。中山宾馆的建立为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带来新事物、新认识。我一直认为它是发觉如何发挥中国人的智

慧和积极性的力证。唉！不过等到 1984 年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时，历经几年的全身心投入，那时我真的做至筋疲力尽，我真的病了，且病得好严重。”

“唔！”我点头称是，我知道这件事。

“我不敢炫耀自己在改革开放中做的事，所谓七十二岁知天命，人的一辈子好短暂，在无垠的宇宙讲光年就是几百亿年。所以在香港说霍英东如何如何没有意义；霍英东于宇宙来说是很渺小的。但做人应积极、消极还是搏命，则由各人自己去选择。而始终对社会、国家、家庭有责任。呀！毕竟岁月不饶人，现做起事来有时会力不从心。”听他这么说，我告诉他：“现在看你仍很精神，国家让你做你也没办法。”他说：“我相信改革中的许多事是旁观者清，认为对的事我还是会坚持去做。”

猛地怎么感到他说得那么深奥，什么宇宙、光年的，但我想，以他丰富的人生总结做人的道理也会给大家启迪。

走自己的路

问他成功的诀窍他始终回答得不是很直接，他称不想炫耀自己。当我再提起这问题时，他说：“我一直在想自己，至今也想不清楚。我觉得做什么事都要看时代，若不是香港回归祖国，若不是改革开放，我或许走的是另一条路。其实我做人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以退为进，成功时多少有些满足感。改革开放中知道分秒必争，如中途而废、‘唔汤唔水’，慢少少像苏联般散丢就惨了。中国有太多人才，我不知如何理解自己，不管有多困难，我还是喜欢迎接挑战，我想让大家理解，冒险不能发达，应一级级、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

“我的家庭比任何人都苦。”他把话题转回到母亲：“我伟大的母亲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养育了我，所以让我明确做人的目的

很重要，而不以赚钱多少衡量，我现在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若说是水上人，水上人这么多；论勤力，许多人勤力过你；问成功诀窍，我至今没法用什么字眼去解释。自己到这把年纪，好应该功不成都要身退了。”他虽说得一本正经，仍把我逗笑了：“你做了那么多事都不肯讲。”他指着眼前一摞摞的资料，颇为无奈地说：“他们写这么多，自己都‘搞唔掂’（办不妥），文章让人家写了很多。说实在的，人怕出名。”

我仔细翻阅，为他写传记的、为他写专题的、为他出各种书的，多不胜数，难怪他对接受传媒的采访已意兴索然。

举足轻重 实至名归

写至此，本文有一点是不能省略的。他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领导人，完全不谈港事、国事似乎不够完整。

霍先生经历了香港基本法起草、特区预委会、筹委会，至特区成立的整个后过渡期至回归过程，作为历史是证人，他认为：“自己有份参与其中，特别经过回归前的一年，顺利产生了行政长官与临时立法会，又经过特区成立一年多，中间不管发生多少大事、小事，大家渐渐觉得中央真正让‘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现在看来，董建华总的来讲让港人接受，香港回归至现在，虽然有许多事情发生，也有许多问题各持不同观点，港人的信心受到一定挫折，但我觉得香港的基础很好，香港人对待困难、处理困难的斗志，还有国家的支持，我觉得整体来看，还是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对此还是有信心。”

谈及国家，他认为中国人可谓多灾多难。近代史上就有八国联军入侵、日本侵华、国内战争，当中国人民站起来时，又有文化大革命，实在很多折腾。

而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得人心，以前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

纲，现在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的重要，且强调民生。我国会越来越走向昌明，改革开放使我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为中华民族带来希望，国家也会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等综合性的大国、强国。

“中国与香港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开放也与香港息息相关。”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前，我们相信香港一定会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回归后，虽然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低迷、金融风暴，但香港人在默默承受中与政府一道努力寻求出路。以前我觉得香港六百万人很彷徨，现在回流人士越来越多，大家仍对国家、对香港有一定信心。”

与他多次详谈后，我终于明白国家何以会委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重任。

霍英东在香港举足轻重，他论天下事、国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对国家贡献良多，许多人难以替代，该是实至名归。

采访过后，我都迟迟难以动笔，担心拙笔描不出他丰富人生；提得笔来，又每每“搁浅”，深怕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受。

我说不清有什么原因能令自己有那么多的顾虑、担心和害怕，只是感到一个人，在一生中多次经历了常人所未有受过的苦，最终能走上坦途，仍坚守自强不息。

那他的付出、他的情操，甚至他传奇的一生，只套用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能说得清吗？

惭愧！

一九九〇年 九月 廿五日于香港

邬维庸：

我把自己那份爱国情操排在什么位置呢？现在我不敢说自己如何爱国。我怀疑自己，如果有朝一日国家对我有所委屈或无理迫害时，我会全无怨恨吗？我把政治事务带入另一角度、另一侧面的看法与思考，是从行医者角度去发现、提高的。

行医者真性情 乐天知命邬医生

邬维庸小传

邬维庸先生生于家乡浙江省宁波市；三岁随父母来香港。

香港沦陷时的 邬维庸 年至 邬维庸 年随家人往澳门；日本投降后再度回港。

先后就读于培正小学；岭英、圣约瑟、华仁中学。

大学就读于香港大学，邬维庸 年毕业，获港大内外科医学士学位。

毕业后在政府医院工作十年，期间于 邬维庸 年至 邬维庸 年被派往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深造，现为该医学院内科荣授院士。

邬维庸 年起私人执业至今。

曾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期任政制小组港方召集人；港事顾问、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组长、筹委会庆祝小组召集人；

1981年至1985年为香港医学会会长；1985年被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并为新生精神康复会创办人，任主席达三十多年之久。

现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康复咨询委员会主席、平等机会委员会委员等。

在一百五十名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我与邬维庸医生的接触最多，也是我最熟悉的一位。

五年多前，预委会甫成立，他任文化专题小组组长，秘书处在香港仅我一人是文化组秘书，从此认识他，在工作上的接触比任何委员都多。

之前我不认识他，听别人介绍他是本港一位很有名望的行医者，心血管内科是他的专长。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组方召集人，预委会文化小组组长、筹委会庆祝小组召集人等。

显赫的政绩令我纳闷：著名医生怎会与政治挂上钩，为何会从政？也有相熟朋友向我打探同样的问题，我不得而知。

典型的香港仔

在预委会、筹委会相处的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我觉得邬维庸医生很直，直率的直，我曾亲眼目睹他如何“犯上”。

炎炎夏日的一天，我过九龙，在他的医务所里。

医生一开口就说：“我想讲讲人生观。”我一听，觉得题目太大了，说：“还是讲你的直吧！”他说：“从我的人生观自然会带出我的直。”

也罢！不妨先听听他怎么说。

“我的背景、历程是一个很典型的‘香港仔’的人生历程。”

很直接，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便开始了自己人生观的叙述。

香港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如果从英殖民者占领的小渔村开始算，当时只有二千多人，因此原居民不多。多是后来陆陆续续从中国内地移居来的，他们不乏已来港好几代者，其中有少数从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来港定居。

与许多香港人的经历一样，邬维庸三岁随父母来港，我说他几乎等于在香港出世，香港长大，从小读“番书”（英文书）在英国进修、打政府工至私人执业。

是许多出人头地的香港人所走的同一条路。

邬维庸很直爽，坦诚地介绍：“我在英文书院、神父学校读‘番书’，从小被灌输了典型的殖民地教育思想。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的思想好像与身边朋友或一般‘香港仔’不同，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民族有一份不太弱的感情。”

自亲身参与基本法起草后，他认识了不少内地朋友，他坦诚佩服内地朋友对国家、对民族的那份深厚感情，邬医生自叹弗如。他提到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无论过去自己受了多少委屈、多少苦难，都一如既往地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无私的奉献。

邬医生很动情地说起内地朋友：“每次与他谈话后，自己总觉得惭愧非常。”他佩服内地朋友的胸怀，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操。

以亲情看中国

一生人中，对自己祖国的真正认识恐怕是始于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工作。他很坦白：“我把自己那份爱国情操排在什么位置呢？现在我不敢说自己如何如何爱国。我怀疑自己，如果有朝一日国家对我有所委屈或无理迫害时，我会全无怨恨吗？”他是以钱伟长等内地朋友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感到自己欠缺了什么。

我则认为各人的经历不同，尤其他与内地朋友的经历迥异，内地人有着与共和国一道成长的历程，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的苦难是自己的苦难，国家的兴旺是个人的兴旺。因此对国家的期望各有不同。

然邬维庸自己的理解是：以犹如子女对父母有无孝心的心态看待如何对祖国。他说：“如果父母对子女不好，但子女仍以孝顺侍奉父母，这是真正的尽孝道。”他把这种“亲情论”用于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上。他又说：“父母与子女因亲情关系，对子女的成就既欣赏又引以为荣；反过来对子女的过失既怀着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感，同时又怀着愿意谅解的心情，主动、积极地伸出援手，但求子女吸纳教训不再犯错。”这是他说的真正的父母与子女相处之道。

反之，他认为：“外人只会执著于过失，拼命地批判、责骂、奚落、嘲笑，甚至落井下石。”他不屑于此种作为，他解释持此种所为的人，对国家就没亲情可言了。

但他深信：“每一个体内流着炎黄子孙血液的人，都蕴藏着深厚的爱国家、爱民族之情，犹如父母对子女一样，问题在于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是否有机会予以激发。但一旦国家遇上外侮，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激发的爱国情将势不可当。比如搅扰多时的钓鱼台列岛事件正好说明这个问题。”邬医生还认为香港在回归祖国的时刻，也能激起香港人的爱国情，这是件大好事。

香港有 ~~怨~~ 怨缘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大多数人说的是中国话，保留了许多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但你在香港待一段时间，即会发现：一百多年来，英国确是精于殖民地统治之道，一方面尽量避免与宗主国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淡化港人的国家、民族观念。从另一侧面说，英国的殖民教育是成功的，我亲眼见过一些有头有面、被香港社会冠以“亲中”的人士，在其“国籍”一

栏，填写“香港”。

我心里是一阵的悲哀，香港是一个城市、一个埠，原属广东省宝安县，怎么与“国籍”的“国”扯在一起，明明是中国人，他填“香港”。英国人造就了数代没有国家、民族概念的港人，所以我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常说的一句话：英国人在香港最成功的是教育，并不是经济成就。

我理解的割让香港对中华民族的耻辱就在于此，在于炎黄子孙不认自己的祖宗，有的虽然口头上说自己是中国人，但行为却证明了一切。因此香港的回归，人心的真正回归，才真正是任重道远！

“转移教育目标至极端的功利主义，也是英国精于殖民统治之道的一个体现。”邬医生还有高论：“虽然自己深受殖民地教育的荼毒，但从小有幸从父母谈及‘九·一八’、‘一二·九’、‘七·七’等国难事件中，觉察人民生活与国家荣辱相连；还有小学与中学期间在中文学校就读时，从公民教育中多少孕育出一份民族情。因此我深深领会对学生从小灌输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的重要性。”

让他开心的是可以在预委会文化专题小组的工作中，落实了自己的意愿。记得当时文化组的委员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讨论研究教科书中有关“殖民地色彩”章节，同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九七年度教育书出版商及学校师生“顺利过渡”，不致出现教科书“青黄不及”。预委会文化小组在教科书问题上功不可没。

行医者过去确实从未参与政治，因没机会参与。但自参与起草基本法之后，他经常自问：“我有幸参与一个历史性的光荣任务，身为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见证人，自己可在其中作何贡献？是否多余的一分子。我经常提点自己，感到经多年之经验，自己是有价值的。我把政治事务带入另一角度、另一侧面的看法与思

考，是从行医者角度去发现、提高的。”

我问：“岂不觉得自己在架构内是另一种声音？”他解释：“是观点、对问题的看法，可说殊途同归。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行医者的指南

众所皆知，医生的最终目的是医好病人，他说：“至于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颇似“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这是务实的态度。”邬医生赞成这种“以结果为主导，像医生般以最后结果考虑问题的方法”。

“政治上，也应最终明白效果，订下目标；然后以最有效的方法、手段；同时考虑过程中会否衍生另外的问题，如果有此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去预防衍生问题的出现；最后一点是当这些问题都没方法防止，应采取什么措施应变。”邬医生讲的这五个问题就是他通常在考虑达成某件事时所称的“行医者指南”。

套用他的话说：“这是一般行医者的指南，如果医生学不到这些本事，则‘撞板多过食饭’（碰钉子或碰壁的机会比吃饭还多）。”在预委会、筹委会期间，经常在许多工作中以“行医者指南”去衡量，如成立推选委员会时，他便从产生推委会目的是什么、在社会上会衍生什么问题、有什么法子可防止、再用什么方法达致最好效果等思路去考虑。邬医生认为：“‘行医者指南’可应用于政治问题的方方面面，例子多不胜数，以此出发，可能会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意见如不被采纳呢？”这问题他回答得很干脆：“‘唔紧要’（不要紧）！反正我早就做了不被接纳的准备。我会检讨，可能错在我，也可能我的解释或表达方式令人不信服。但我毫不失落，因为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感到他很洒脱，如此心态，是他行医经历中参悟所得。

乐天知命安乐人

“你可用乐天知命邬医生作为今天采访的命题。”听他的建议，看出他越来越轻松，我立即回应：“我会加多一句：乐天知命邬医生，行医者的真性情。”哈，哈，哈哈！很开心，都乐了。

我问：“难道‘乐天知命’也是你行医的心得？”他坦诚地说：“是行医心得。凡事尽量去做了，得（行）与不得是命也，不是自己可控制的。我常想：做人未必可做快乐人，但最要紧做个安乐人。是心安理得的‘安’，最紧要对得住自己，问心无愧，可以常常睡安乐觉。”

此番高论，令我产生共鸣，仍问了一句：“所以你敢讲话？”他点头称是：“可以说贯彻了我从头到尾的思想：要做就去做；要讲就去讲。这就是率直。为了达到效果，有时讲话难免听来尖锐些，可能冲着某些人而来，会得罪一些人。”

“总之我尽力而为，犹如我要医好病，打针也罢，开刀也罢，顾不上病人的痛与苦，操刀就割下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求医好病，可能医生就是直接些，我今天讲的一切，也解释了我以往的一切行为。”

医生不讲医院、病人，但他巧妙地用了医生的思维考虑周围的人 and 事，及政治问题，把自己行医的体会揉入许多深奥、枯燥的政治问题中，又变得易懂、易接受。

人到无求品自高

想找答案，我问：“身为医生，参政有困难吗？”他答：“我反而觉得医生对政治问题的考虑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细致。我愿

为以医生背景做政治家是有利的，因为政治家讲实际，有别于政客。”

“在从政过程中，你性格直、说话尖，会否觉得处事会难些？”我继续问，他的回答似乎有点意外：“我并不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我奇怪：“为何有此说？”他说：“我抱负不大，只可说是有限的抱负，做完（估计他指的是预委会、筹委会，包括过去的基本法咨委会、草委会等某一阶段之某一工作）之后，我还是做医生。因此只为了做好目前这份工作，不为将来第二份工作铺路，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或者有损我的职责。”

回归后，邬医生仍做回自己的医生（实际上他也从未离开过医生岗位），但他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说做完以后仍做医生自然可以，但政圈里的许多事似又欲罢不能。

邬维庸明知率直、真性情等对自己有阻碍，但他做完就放下，并无所求，正应了“无欲则刚”、“人到无求品自高”，于他，已达另一境界。他加强语气强调：“一定要这么想，否则不够放。”

看得出他同样以行医者心态从政。

把从政路看得如此洒脱，我问：“会否全情投入？”且听他解释：“我做每一件事都会全情投入的，我指的全情投入不是终生投入，而是某一阶段的投入，但肯定会全情，行医者心态永远要考虑事件的长远，而不是个人的长远、个人的得失，一旦介入个人因素，就做不好事，更永远做不成好医生！”

今天的话题离不开行医者，惜时间关系，不能较全面了解他与病者间的关系，或他与医生职业之间的故事。

我问：“是从小立志做医生吗？”原来答案为：“不是。”“那么是半路出家喽？”我的提问令他想起往事：“我从小喜欢数学，想读工程科，我们家四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二，大哥带了头，

首先行医，家人也希望我走这条路，我便改行学医，结果还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

哈哈！没想到一读医、行医便总结了这么多心得。

而每个人今天之表现，离不开他个人之过去。

邬愿年 怨月 圆日于香港

李伟庭：

我在香港一辈子，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几十年，最高兴的事是：不但看到国家收回香港，而且能亲身参与其中工作，我很高兴中华民族的屈辱已随着九七年香港的回归而结束。

新华分社里的香港人

李伟庭小传

他的履历再简单不过。

1946年 12月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博罗县。

1964年十八岁时入职新华社香港分社至最近退休，整整四十八年。曾做电讯、资料工作，任资料室组长。

1981年任研究室主任；1985年任港岛办事处主任；1989年起任社长助理兼社会工作部部长；1998年退休。

曾任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代表、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代表处顾问，预委会、筹委会委员。

现为港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华社香港分社内的干部分两大类：内派干部与地方干部。

所谓内派干部就是从内地各政府部门派来香港工作之人士；而地方干部指在香港本地招聘的员工，他们都是香港人。

国内曾有两种自行车的牌子很有名，分社内也爱把两地干部冠以该两名牌：内派干部为“飞鸽牌”，地方干部为“永久牌”。言下之意内派干部是轮换制，他们有朝一日要回内地；地方干部是港人，他们会永久留在香港。

因纪律严明、各有分工，两地干部相处也很融洽。

李伟庭就是“永久牌”中的一员，堪称分社内港人中的佼佼者，曾官至部长级。

千真万确香港人

李伟庭千真万确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一家四代世居香港；观其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是十足的香港人。

然从任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委员起，至预委会、筹委会时，他的大名又赫然于“内地委员”栏内出现。

大家大惑不解之余，也常听他说：“艳呢，我都唔明点解将我放艳‘内地委员’处。”（是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把我放在“内地委员”那里。）说起话来，地道的香港腔、香港味。

“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香港人。”这是李伟庭本人的标准解释，原因很简单：他生于斯，长于斯，已达半个世纪有多。

但他不苟言笑的外表，香港人内地委员的身份像谜一样，令许多人猜测、不解。记得在 1984 年 7 月香港筹委会预委会成立之初，因名字在“内地委员”栏内，已招来香港朋友和传媒的诸多询问。

有一点倒是与内地官员相像：要采访他不容易。若谈一般的政治见解或对某问题的看法，有时在电话里、或在公众场合遇上了问几句、就算上他写字楼问多些，他大都乐意配合，接受访问。说到写人物专访，便面有难色，一推再推，老说自己经历简单得很，不像别的香港成功人士般有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知道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向他作了承诺：不写不该写的事，而且简单经历就作简单文章嘛！

内地委员有缘由

第一次，他仍在刚刚退下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兼社会工作部部长的位置上，仍是新华分社楼上的这间办公室。

看见我到访，他早已猜到我的来意，且早有准备，打好腹稿，坐下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从年纪轻轻到六十多岁，四十几年都在香港新华分社度过。自始至终、我第一份工、惟一的一份工就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并以此为终身职业。”

“我自己认为，我做‘内地委员’或‘香港委员’两边都可以。”马上切入主题，解答大家不断猜测的“谜”，而由他解释最准确：“如果从新华社是中国政府派出机构理解，以中方官员身份看，可以是‘内地委员’；如果从香港生、香港长的角度看，又可以当香港委员。”他笑称：“我当了内地委员，可以让出多一个名额给香港人，增加一名香港委员喽！”果真？他答：“仅是个人理解，不一定就对。”

听李伟庭解释方知：原来回归前在香港的中方官员有两种情况：一是上面讲过的从内地干部中选派来港工作的内派干部；二是香港居民参加了中国政府驻香港机构的工作，成为其中工作人员者。而此种情况在九七回归后仍保持原状，李伟庭先生属后者，这种情况在香港很多，如当时的中英土地委员会，就有香港居民以中方代表身份参加工作。

想当初，李伟庭的特殊身份也曾引起一些香港朋友的误解。1995年11月，筹委会刚成立即开展工作，最早碰到的问题是由推选委员会小组着手准备组成四百人的推选委员会。有委员提出：李伟庭既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中方官员，可以参加推选委员会

吗？

后来这问题极易解决，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明确规定：“推选委员会委员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成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香港地区代表”。自然李伟庭后来当选为推选委员会委员，履行了推选首届行政长官、临时立法会议员等工作。

在新华分社数十年

在香港，转工跳槽好平常，尤其是年轻人，一生人几十年“从一而终”，从参与工作至退休服务于同一机构者并不多见。

我问他何以能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干几十年？在香港选择走这条路并不容易，他则用“简单”来形容。

生于旧中国，经历过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他承认：“战争对我的影响很大，在一种朦胧意识中认为那种社会对普通老百姓不公平；也从战争中初步懂得了国家、民族的屈辱和苦难。”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一个时代的大变化。

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年轻的李伟庭对新中国的诞生满怀热情与希望，他盼中国有个好转变。早期，他参加了一些香港进步团体的活动，晚上到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创办的中业学院读书，年轻共和国的蓬勃生机，给他很大鼓舞；每年休假，他都与社内同事争取回内地看看。他说：“当时国内虽然物质生活不那么好，但整个社会风气、精神面貌都很好。我每次度假回来，心情非常舒畅。”

那时的年轻人很单纯，新中国的新事物让李伟庭接受，也奠定了他选择个人路向的基础，他能几十年始终在新华分社服务的原因也容易理解了。

“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此话是邓小平先生于1984年说的，访问中，李伟庭引用了这段话，以此说明祖国的发展壮大，是中国能够收回香港的重要原因；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将会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是“值得信任的”。他颇有感触地说：“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很曲折，国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我相信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应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

“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一代，奋斗了一百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天（指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的到来。”他说：“我在香港一辈子，在新华分社几十年，最高兴的事是：不但看到国家收回香港，而且能亲身参与其中工作，我很高兴中华民族的屈辱已随着九七年香港的回归而结束。”

不是简单的工作

李伟庭称自己的历程很简单，十八岁从学校出来不久就进了新华分社，一干几十年，直至退休。他说得很谦虚：“时间看来相当长，个人只能说做了少少工作。”他从颇为普通的资料、通讯工作做起，至社长助理。我想：“除却新华分社为他提供机会外，他个人的努力、信念也颇为重要。可能你会觉得他的工作神秘、枯燥，可他就是全情投入几十年，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的几十年。”

在看似简单的历程中，从事并不简单的工作。

身为社工部部长，他曾有许多机会与众多社团接触，他曾反复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解释中国政策。他认为：“大多数人理解，但也有少数人对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

一件往事，曾听他说过。一次，他宴请同一团体的十几人吃

饭。

席间，一位客人言辞激烈，批评中方只信“亲中”人士的话，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李伟庭思忖：“大家第一次见面，有不同看法，或不信任不奇怪。”他便耐心地听对方讲完，并对他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解释。分手时，客人紧握李伟庭的手说：“我所接触的中方官员中，很少有这么耐心听取我意见的。”从此以后，该团体组织成员有机会回内地参观，发现香港某报刊登的文章与他所见事实不符，便自动投书报社，把内地之所见所闻告之读者，以正视听。

后来，李伟庭与该团体的交往越来越多，用他的话形容：“已成为可以交往、探讨问题的朋友。”他自己则感慨地说：“说明我们要多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只要多接触、多交往，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特殊身份显作用

回归前我曾问他：“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港人内地委员的特殊身份在香港开展工作？”

他介绍自己在筹委会时曾参加了行政长官与经济两个专题小组，在小组工作中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与香港委员、内地委员沟通，顺利开展工作。

1995年，李伟庭当选为港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李伟庭再次当选为港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说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在每次人大会议期间，他在关心祖国发展的同时，都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成立香港筹备准备工作机构的构想，最初就是由包括李伟庭在内的几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来的，以后再以广东省代表团（回归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没有独立组团，而是附属于广东省代表团内工作、活动）名义向大会提出提案。

无论担任预委会委员还是筹委会委员，李伟庭都与其他委员一样，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界团体、人士的聚会，听取意见，同时向港人介绍预委会、筹委会的立场、运作、意见和建议……

身为港人，他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像一晃就过去了。但几十年下来，切身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命运分不开，正所谓祖国好了，香港一定好！

“当然，祖国的发展也经历了顺利——曲折——正确的道路。”他坦诚地说：“但是我觉得观察问题一定要从大处考虑，要站在高处观察国家的前途，这才会使你充满信心。”

几十年间，李伟庭以看大局、看主流的意境指导个人信念，他承认：“若不看大局、不看主流，对一时的曲折看不清，就不能坚持自己的方向。”

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事物，总是曲折地往前推进。

港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任期正好跨越九七，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香港代表又首次在香港进行选举。选举前我见到李伟庭，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在香港举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选出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香港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由港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只有香港回归祖国后才能实现。”

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全国人大工作，李伟庭称，首先，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香港，今后的日子很关键。国家制订了跨世纪的蓝图，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三步走目标：第一步，~~1980~~年至~~1990~~年为实现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1990~~年至~~2000~~年，全国人民生活达小康水平。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国家将完成第二步任务，使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祖国的现代化。

“从整体来说，回归前后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能都是一样的。”李伟庭说：“但所承担的责任则有所不同。过去，首先关注的是国家建设与发展。当然现在亦然，但现任的全国人大代表

应为中央制订的‘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贯彻实施起积极作用，这一点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已成活生生现实

又一次与他联系，是今年 9 月，这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做了四十八年整的香港人已于社长助理兼部长的岗位退休，但分社仍为他保留了原来的办公室套间，仍任分社顾问室顾问。他对我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一年多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成活生生的现实，香港内、外各方人士和国际舆论普遍对此表示赞赏和认同，并预期将会取得成功，对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将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但是，1997 年 7 月 1 日凌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却终生难忘。”李伟庭有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今天说及，仍历历在目：“英国‘米’字旗降下来；中国五星红旗、香港特区旗升上去，高高飘扬，胜利宣告香港回归祖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民族耻辱彻底洗雪，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夙愿终于实现。”

对当前的香港，李伟庭仍满怀信心：“一年多来，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以及港英时期不当政策所造成的泡沫经济需要调整，香港经济正处于一个困难阶段，但调整期过后，‘东方之珠’将会焕发出更为耀目的光芒！”

岁月匆匆，李先生回顾自己的过去仍清楚记得许多往事：“从 1949 年 8 月我进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算起，我为国家和香港人已服务了整整四十八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的黄作梅社长（他已不幸于 1950 年乘机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中，为国民党特务破坏而牺牲。即当时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曾号召我们‘要把五星红旗插上港督府’，现在这一目标实现了。”

“从一九八二年八月开始，我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了，走上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退休，本来很正常，但碰上九七回归，原来他的退休还有一个漫长过程。

他说：“本来，一九八四年在我满六十岁时，就已提请分社领导考虑我的退休问题。但由于九七日近，任务繁重，我与其他一些已达退休年龄的同事，还得继续工作多几年。现在香港回归祖国已一年多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一代人，应该说已完成了主要的历史任务。四十八年的时间过得很快，但很有意义。前三十二年，我参与了为收回香港奠定基础的工作；后十六年，我直接、间接地参与了有关谈判、准备和筹建特区政府的工作。对我来说，我只是要求自己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做点事情；而分社领导则对我过去几十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我觉得是受之有愧的。”

目前和将来呢？

他说：“目前，我还挂着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室顾问和第九届全国人大香港区代表的名衔和职务。与过去工作比较，相对来说是轻松多了；但我将本着以往的工作精神，尽己所能，继续发挥点作用。当然，今后我会有更多时间读点书，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相信，祖国和香港的明天会更好；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国将更加灿烂辉煌！”访问行将结束，李伟庭语重心长地寄语：“我在新华社几十年，中间发生许多变化，我体会最深的是：看待香港问题，不能光从香港看香港；要看到祖国的发展，看到祖国充满希望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看得全面，香港的许多问题才能处理得好。”

李伟庭——一位土生土长香港人的话，对你认识香港，了解香港有启迪吗？

本文至此，我想就此打住。

他——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香港人的谜应有答案了；也应该是

这个缘故，他——一位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可以中方官员身份担任特殊的职位——中方代表、内地委员。

一九八〇年 九月 四日于广州

王敏刚：

感觉我们香港厅的几个特色——淡雅、明亮、庄重，已为国内建筑界认同、看好，这是最好的解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历史的交替时刻，作为个人，哪怕问题再多，我花点时间，也深感值得。

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

王敏刚小传

1935年生于香港，广东省东莞人氏，是香港中华造船厂创始人王华生之长子。

在香港喇沙书院毕业后，即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及船舶设计。

1961年学成返港，协助打理家族生意，从低层做起，至1982年出任中华造船厂董事总经理。

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筹委会委员，香港小轮（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1983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7月初被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1987年被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现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以及任西北拓展有限公司等十四家公司、酒店等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

同时任香港青年联合主席、香港临时市政局议员等二十多个社会公职。

香港回归祖国前，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有广东厅、四川厅、上海厅、甘肃厅……全以各省份或直辖市名称命名。

似乎意味着在这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开会及举行全国性重大会议的场所，全国各省及直辖市均有属于自己的“地盘”。

后来连台湾厅、澳门厅也相继建成，惟独不见香港厅。

回归意义大于一切

全国人大代表五年一任，二十八名港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急了，他们的任期于九七年届满，代表们盼望能在 1997 年 9 月举行的八届人大最后一次会议时，可以到香港厅坐坐。

这次工程发起人之一的王敏刚曾说：“若到八届人大最后一次会议时，香港厅尚未建好，实在愧对后人！”

我想探讨，这次工程的分量究竟有多重？从炎黄子孙角度，在王敏刚心中，他把在人民大会堂内建香港厅看得很重、很重：“建香港厅，回归意义大于一切。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全国迈向统一，标志着推翻一百五十年前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崭新的写字楼，是全海景的，很开扬，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在王敏刚办公室，我们的话题从建香港厅开始。

“我听说你们把香港厅的面积正好建为一千九百九十七点七一平方米，能建得这么精确吗？”我开玩笑问：“还不如索性把我的专访叫‘~~九百九十七点七一平方米~~’。”

他笑答：“~~九百九十七点七一平方米~~是香港厅设计师——清华大学设计院提出的。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需要，~~九百九十七点七一平方米~~

米只是个数字，代表不了什么。”

一厅两门寓意深刻

1995年元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成立大会期间，应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之邀，全体新任筹委会委员参观了未来香港厅之雏型——人民大会堂西南厅的七百平方米。

同年圆月，港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港聚会，其中一个话题涉及当年要做什么事，敏刚与阿棋（人大代表陈永棋）自告奋勇，发起决定在1995年建香港厅。

源月，经与人大会堂有关人士交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们希望把香港厅改在东大厅建，并要求多拨些面积，建大些。我问为何要改在东大厅，王敏刚答：“因为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东大厅会见外国首脑与外宾，他们便可时常路过香港厅，更多了解香港。”可惜东大厅确实划不出这么大的地方，王先生介绍：“我们惟有保留在西南厅，外加一条长廊、一个车库，总面积达二千一百平方米。”

后经多方斡旋，该项工程由德高望众的本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率领，港区人大代表各有分工，正式开始筹建香港厅工作。

代表们同意香港厅的设计构思为“一厅两门”，寓意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从正南门入，车可从西南门入泊在门口。而大厅按主体建筑不与其他省份厅脱节；但其他省份的厅多数展示当地著名、出色的工艺品、艺术品，香港厅则设有一个小展览厅，展出香港从鸦片战争起至九七年回归的历史。让来者更多了解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章节。

愧对后人刻不容缓

香港厅一定要建立，已达刻不容缓地步。当时身兼筹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敏刚说：“迟迟才建香港厅已万分不好意思。”香港回归祖国在即，香港民众皆认为一定要在人大大会堂内有香港的一个位置。王敏刚形容：“我们争取 1997 年 7 月 1 日前完工，望 1997 年 9 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可以坐进去，倘届时尚未建好，简直愧对后人！”

他计算过，初步估算香港厅造价为三千万。经发起，香港各界人士反应踊跃，在他与我倾谈时的 1997 年元月，认捐已超过二千万。他说：“连采访筹委会的记者也提出要捐款。呵！香港回归是历史事实，这个里程碑举世公认，哪怕捐一元、十元，也是一种心意、一份荣耀。关键要发动更多人参与，让广大港人为筹建香港厅有所表示。”

接着，他们筹钱的筹钱、设计的设计、宣传的宣传，并广泛征询设计图纸，可谓分工细致，行动迅速，务求大家对于人大大会堂内香港的象征有一份归属感、认同感，让我们香港人的子子孙孙将来到人大大会堂时，都会感受到：在祖国首都的这里，我们也有一份；在祖国大家庭中，我们也是一分子。

讲到此，他开怀地笑了，说：“现阶段要扩大组织，有许多专业人士义务帮手。而大会堂则认为需要一百个工作日。深化设计尚需三至四个月，目前修建工程正在密锣紧鼓中进行。”他为香港厅的筹建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我是知道的，所以对他的采访也集中介绍香港厅。

当时王敏刚深感肩挑重担的压力，他很高兴看到香港厅已于 1997 年 7 月初动工，与我倾谈时，他仿佛已憧憬着不久的将来，香港人可以在人大大会堂内的香港厅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同议论

香港事务，啊！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金碧辉煌香港厅

1990年 7月，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参观香港厅；

1990年 7月 16日，香港筹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香港厅的落成仪式；

从此，人大大会堂内的香港厅正式启用。

我有幸与他们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在它是雏型、初步建成、正式启用后，都能一睹其“芳容”。

坐落在人大大会堂西南方的香港厅，总建筑面积为一千七百二十八平方米，是人大大会堂内三十二个以行政区和直辖市命名的大厅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厅。八百一十八平方米的屋顶花园和双门、双厅的设计别具匠心，在人大大会堂的所有大厅中，是独一无二的。

正门，雕刻着香港区花——洋紫荆图案；迎面是一座花梨木与石材组合的巨型屏风，屏风正面，中央以海蓝色大理石为背景，镶嵌着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金箔题词：“执行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绕过屏风，金碧辉煌的七百平方米主厅呈现眼前，王敏刚称之为：“中西合璧、古今合璧。”是采用了西方古典大型公共建筑常见的石材结构，四壁以八米高的米黄色大理石砌就，中间镶有仿古罗马雕刻；天花板上具民族传统的沥粉贴金彩画，引证了王先生“中西、古今合璧”的评价。

主厅西墙是一整幅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夜景绒绣；我最喜欢的是三盏直径达二点五米的水晶大吊灯，一颗颗如水珠欲滴的大水晶，折射出七彩亮光，如彩色光球熠熠生辉，直让人心里感叹：好一个富丽堂皇、典雅华贵的大厅。

主厅北侧可通往屋顶花园，园中绿草青青、石灯古朴；左侧宽大的花岗石台阶，可以通往室外花园；主厅东北角，两樽三米多高的雕花汉白玉柱，形成一道巨型拱门；拾阶而下，来到与主厅风格迥异的多功能厅，是举办展览、宴会与新闻发布的好场所；举头望去，梯间右面，几只可爱的白海豚汉白玉浮雕在海浪中嬉戏、追逐，跃然墙上，为庄重的大厅，平添几分轻松、活泼。

多功能厅内的铜浮雕壁画，是一幅香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沧桑图，把香港的历史、回归、团聚、繁荣尽收画中。

香港厅集会议、展览、宴会等多功能用途于一厅，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人大会堂庄严肃穆及宏伟壮观的气概，堪称庄重、大方、得体兼富丽堂皇。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评价：“香港是特别行政区，香港厅的设计就是要特别一点。”

香港厅工程发起人之一的王敏刚，亲力亲为，为香港厅的建成耗去许多时间、精力，因此每每与他谈话总会提及香港厅。

今天（~~1985年~~ 1985年 5月 5日），这一天，我与他通电话，他又告诉我一件有关香港厅的轶事：~~1984~~ 1984月中旬，即前不久，他与本港方树福堂教育基金同仁赴南京、北京、上海处理基金事宜，在南京大学的教育基金捐资仪式上，看见该大学其中一个堂很特别，怎么就觉得那么眼熟，正想着，同行中有人高叫：“王敏刚，这中西合璧、古今合璧的堂不就跟香港厅一模一样吗？”

王敏刚也正想说，你瞧！堂顶光猛、墙壁龛是香港厅的格局；细看！恍如缩小了的香港厅，完全是一个仿照香港厅建筑的堂。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感觉我们香港厅的几个特色——淡雅、明亮、庄重，已为国内建筑界认同、看好，这是最好的解释。”高兴吗？他老实不客气：“很高兴！”

仿佛为自己辛勤付出取得合理回报般，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

喜悦。

又骂又求极矛盾

王敏刚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觉得有使命感，不能马虎，大家都很认真。

他回忆自己过去十多年所走的路：当年出任中华总商会工作时，有机会入立法局，但自己选择了继续当广东省人大代表的位

置。
1985年出任油荒地小轮工作，视作为公众服务，接受挑战，两年后提出辞呈，却干了四年，至1989年辞职，直到1991年1月1日正式离开。他说：“除家族生意的原因和自己在内地西北发展了业务外，主要是我直认在中方阵营肯讲话的人不多，要维护中国的立场，便需面对很多问题，处于一种又骂又求，非常尴尬的境地。”

一是小轮加价，他介绍：“作为小轮的行政总裁，一方面每样事要与当时的港英政府许多部门交涉，游说许多人争取加价。但与某些人士由于政治原因谈不拢，甚至有要求到港督的，所以过去，在回归前的几年，自己相当矛盾，一方面要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骂港督，另一方面又要求他，显得矛盾极了。”

另一是港府要建机场铁路，需二百五十亿元，接载四万客人。王敏刚认为：“四万客人实际上有十艘双体船已可接载，所需费用六亿便够了，相差四十倍。”但此问题一提出，港府即劝王敏刚：你再别提这事，我们不会派人手与你做码头上盖。他认为：“类似事情中，许多事被港府牵制着，这事情港府是明显考虑不周详。”

听得出他心中愤愤不平，他无法接受这又骂又求，异常尴尬的位置。

一分为三好协调

“我现在有三样工作。”听他这么说，我问：“哪三样？”王敏刚说：“首先，我的时间是一分为三：自己在内地的商务、全国人大代表和以前在筹委会的工作、以及本身在香港社会的公共事务，各占了我三分之一的的时间。”

我问：“对三个三分之一，你的自我感觉协调得好吗？”他说：“现在还可以对付，因为这些事情都得自己去做，相比之下，当时筹委会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自己的商务反而摆在最后，花时间最少。”还是香港的事务比较紧迫，在筹委会时，王敏刚参加了推选委员会小组与经济小组的工作，经济小组有很多迫切的事务要处理，当时他是九广铁路董事局成员，工作涵盖西北铁路、香港财务、金融等问题，他说：“当时中英很多争拗，港英政府仍有很多小动作，很多尚未成为事实的新条例，要在回归前的三百多天出台。因此，我当时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尽管如此，王敏刚想到的却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历史的交替时刻，作为个人，哪怕问题再多，我花点时间，也深感值得。”

定本位 不忘本

访问中，王敏刚偶尔说起爷爷是地主，我问他此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也是听家人说起，祖父早年在乡间有许多渔塘，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曾经挨过批斗，渔塘也被没收，仅剩两间祖屋。”他七八岁时，遇上放暑假回乡玩耍，依稀记得这些很激烈的“阶级斗争”片断。

王敏刚知道父亲十四岁时，已放弃乡间的一切，只身来香港

闯世界。他说：“从我们家族来看，从父亲到我，或许阶级、阶级斗争观念早已淡化，但最少曾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过。”我问：“你为何还跟着共产党走？”他答：“这问题很简单，就是要面对中国的现实。从广义来看，现在的香港人要有国际观；但身为中国人，看问题或发表讲话，一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只有本位定清楚了，才不会忘本。”

怎么才能不忘本呢？他说：“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要看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才不会忘本。纵观中国近代史，今天中国人所享有的，是哪一个政权可以给予？国民党吗？他们曾经试过了。难道香港今天的民主党？相去更远。姑且勿论这几十年新中国的发展有多少起跌，但今天中国之成就，举世瞩目，是共产党的功劳。我们拥护什么人，站在中国人的本位和立场是很重要的。”

难得他如此深明大义，祖辈的事不加理会，更不会追究，一门心思做香港中国人该做的事情。王敏刚解释：“对过往的事，我爷爷心里可能会不舒服，但到我爸爸已经不上心了，我自己更不上心（不挂在心上）。有说：‘好仔不论爷田地’，父亲是这样理解，我也是这样。其实爷爷的事，是当时整个时代的事，不光是我们一个家族的事。父亲早已放弃乡间的一切，我在香港出生，专注于香港的发展。今天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业绩如何，有目共睹。我爷爷处在那个时代，各人的遭遇不同，我们不能盲目去支持。”

完全是一种理解、豁达的心情，正所谓“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王氏家族的长子，以此种心态对待发生在祖辈及家族身上过往的事，所以能轻松面对人生。

船到桥头自然直

小轮工作需面对公众，王敏刚有很大的满足感。1995年元月

旦，王敏刚辞去小轮的一切工作后，~~1995~~1995年的元月四日，香港特区筹委会成立，他专注于筹委会的工作，他视之为历史的交接时刻，认为必有许多事情做，因此顿感自己责任重大，说：“在历史的交接时刻，我们抽时间多看看，效果会更好。”

身为造船厂创始人之长子，讲话时，他经常三句不离本行，常以船形容，现在他说：“回归已成定局，有说‘船到桥头自然直’，香港回归，犹如飘流的小船，泊向祖国这码头，我们是轻轻地、和谐地泊过去，还是怒气冲冲地撞过去呢？但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香港这艘船始终都需泊过去。”

“我们当然需要效果好些，若不然，我可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搞香港厅。”

听得出，对香港，他有很深的感情；对祖国，他也有很特别的情感。这些情，是自己实践和思考得出，统统本能地体现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情。

香港后过渡期，他寄情于香港厅的兴建，他琢磨透了其中含议，象征祖国的版图从此有了香港的位置，因此他的寄情几达至忘情的境界。现香港厅早已建成投入使用，王敏刚再一次当选，续任港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此，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港区之三十六位应届人大代表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香港厅里议事、论事、开会了。代表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我相信，王敏刚的心情一定与别不同。

我曾亲眼看见他在香港厅的模样，其神态确实与别不同：没有与人交头接耳，没有特别的兴奋；而是静静的一个人，独自踱着方步，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仔细地看遍每一处、每一物、每一角落，细心得叫你难以相信，那神情恍如在细细品尝自己家中之珍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敏刚对香港厅的一切，有否包括如何设计、选材用材，直至每一装饰、每一摆设，甚至一砖一瓦都仔

细推敲、过目、拍板？如没如此夸张的话，笼而统之地说：花费许多心血与体力。总不过分吧！也算对他有个交代。

因此，每每提及香港厅，王敏刚理应引以为荣！引以为自豪！

从今后，香港人，香港的后人、后辈，到北京有机会参观香港厅时，希望能记得曾经有一位香港生、香港长的香港人为此曾作出过付出！是在他任香港筹委会委员、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

2008年 12月 27日于香港

王凤超：

文人、学者从政，若抛开许多东西，不要想得太多，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应的，从这个角度看，做官也不难。我这个人的哲学是：遇到倒霉的事不要垂头丧气，要对生活充满信心；遇到高兴的、好的事情也不要得意忘形，永远处于一个比较平稳、平和的状态。我觉得这样会活得好一点。

叫我老王好了！

王凤超小传

1952年 12月 10日生于辽宁省东沟县（今东港市）。

于东沟县孤山镇、吉林市、长春市上小学；六年中学于长春市实验中学度过。

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至 1975年 12月毕业，被分配往辽宁省新宾县中学教书。

1975年底至 1977年于《辽宁日报》任编辑、记者。

1978年 12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主修中国新闻史。

1981年获新闻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

1983年初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历任副司长、司长、副主任。

曾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筹委会委员。
现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老王”，中国内地一个普普通通之称谓，然出自他口却叫人动容。

有朋友告之：在某公开场合，他趋前叫了声：“王社长！”王社长立即谓：“叫我老王好了！”

一声极平常的称呼，何以让友人唏嘘？他说：“王凤超真低调，说：‘叫我老王好了！’这么多高官，我觉得真是少见。”友人乃属常与中方有交道之人，口出此言，必有一番想法，是惊讶？是感叹？是少见（多怪）？还是兼而有之？

来自贫寒家

友人之感叹，我没深究。但我也猛然忆起：香港回归后一个月，在京采访他时，刚见面，我正为称他王凤超主任（当时是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凤超委员（当时的筹委会委员）还是王凤超先生之间费思量时，他也是憨厚的一句：“叫我老王好了！”看他满有诚意，以后在公开场合仍称他职务，但私底下也敢“斗胆”称其老王了！

我向友人解释：他父亲是教授，出身一个普通人家；他太太在文革中受了许多苦。试问他们还有什么看不透？如果用我的话说就是：早已看透人生、看破红尘。这样的人，会以一种极平常之心态对待周遭的人和事，“叫我老王好了！”便是一种平常心之表现。

“我小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王凤超开始进入被采访状态，他忆述：“因为我父亲是个科技人员，主要从事化工、化学纤维工作。我母亲读过小学，但家里孩子比较多，五个孩子，我是老

大。母亲很早就丧失了工作的机会，因为孩子没人照顾不行，所以她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但是她有文化，也很明事理，母亲一个人就挑起照料全家的担子，一力承担照顾五个孩子。”

谈及贫穷家境，他的语气挺沉重：“我父亲没念过大学。”他不是教授吗？他说：“完全没念过大学， he 现在是教授、高级工程师，已经退休了。他做过吉林省化学纤维研究所的所长，完全靠自学。”

“由于家境比较贫寒，我父亲工资最低时一个月五十八块钱。”哼哼！我一阵苦笑：“一家七口？”他说：“那时还没有我小弟弟，就算六口吧！当时在吉林市生活。”现在的人无法想像，但五十年代的人，知道一家六口每月以五十八元度日之滋味，当时算不错。“对，还可以。”他说：“五十年代初，吉林省的省会在吉林市，不是现在的长春，~~1954~~1954年，吉林省的省会才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所以我们就跟着父亲从吉林市到了长春。”

直到六十年代，“由于我父亲在科研上有些成就，所以他的工资就翻一番，有一百多块了。”但他记得最困难的时候是五十八块。

小小电影迷

五十年代的中国，看一场电影虽然很便宜，一张学生票才一角二分钱。“但这一毛二分钱也很难拿出来。”区区一角二分钱让小凤超颇费思量，他说：“我从小爱好文学，非常愿意看电影。记得我家住在二楼，家里用煤球生火做饭，煤运到家里需送上二楼，当时的工钱是五分钱，我为了看电影呢，提出由我来背煤。”天呀！一担煤有一百斤吧？“大约是五十斤，我背两次可以有一毛钱，再加二分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

“当时因为愿意看电影，机会又不是很多，所以我就等电影
愿意

演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才看。”是否便宜一点？他说：“不是便宜，是不清场。”哈哈哈哈哈！我笑得很辛酸：“可以一直看下去了？”他说：“不清场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买票都可以进去，你看多少场都可以，直到放映至最后一场。我为了多看几场，都买不清场的票，星期天早上进去看，一直看到晚上。”哈哈哈哈哈！有意思，一毛二分钱从早看到晚上。

“记得那时我看一部苏联影片《短剑》。”他忆述小小电影迷之轶事：“从早晨的第一场看到晚上最后一场。”都看这部片？“对！”看得都会背了？“唉！而且中午不吃饭，因为我看了一天，也没告诉家里，家里不知我到哪儿去了，回去挨了父母一顿骂。”

这就叫废寝忘餐、如痴如醉，他说：“我没想能看这么多场，因为电影很吸引人，就一直看下去了。由于从小爱好看电影、爱好文学，所以在 1956 年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到父亲的工资长到一百多块钱后，家境好转。”他说：“我就可以买一些书，我最大的爱好是买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的文学作品，从而培养了兴趣，选学了中文。”但报考时还碰到一些阻滞：“父亲是搞自然科学的，不同意我考文科，他不解地说：‘你是中国人还考什么文科？还学中文干什么？你可以学别的科目嘛！’”

普通教书匠

我说：1956 年入学的大学生，命不好，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他说：“我正好赶上末班车（指文革前收的最后一班大学生）。”家里就你一个大学生？“我弟弟妹妹是文革后通过其他办法，如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制度后上的大学。”他说：“我告诉父亲：我对其他科目没兴趣，当然经过学习，可能会学得好一点，但兴趣很重要。当时吉林省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只有三名，而

长春市仅考上两名，我是其中一人。”

外地人很难考取北大，可见他是吉林学生中之佼佼者。

“进大学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好不容易考进去，他不无遗憾：“北京大学五年的学制，进去一年，搞了四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学了一年。”很无奈，幸好学文科的人很大程度还是看踏入社会后的实践。

“当时北大、清华的学生需提前毕业。”他说：“于是我们便在1969年猿月份毕业了。”毕业分配讲“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王凤超与女朋友雷渝平同时被分配到辽宁省新宾县。他说：“听说当时那里很需要教师，问北京要人，我便没有回家，到辽宁去了。”

辽宁省有个新宾县，现已改为满族自治县，据悉过去是努尔哈赤起兵的地方，原名兴兵堡，因为反清遂于辛亥革命时改为谐音——新宾。“当初分配时没有选择的余地。”王凤超说：“学校公布学生分配往什么地方就完了。所以当公布我被分配到新宾县时，我是现查的地图，才知道这个地方在辽宁省的什么位置，它紧挨着吉林省的通化，是个山区。”

分配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当时北京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到北大来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当时我在行李标签上写着‘到站：新宾县’，结果办理行李托运的人怎么都查不到这个地方。”就你一个人？“二十多人，各个系的都有。”这么多人竟然找不到这个地方？他说：“后来才明白，原来新宾县不通火车，根本没这个站，所以‘到站’查不到。我们的线路是在北京开往吉林的路上，经过一个小站南杂木，在此下车，然后坐汽车才能到新宾县。”在此还要说明一个问题，是以前北京从来没有一个包裹寄往那个地方。“所以托运行李的人告知，你们的‘到站’要写南杂木。”唉！真是有笑又有泪。

“我记得很清楚1969年猿月猿日这个日子。”他细说从前：
1969

“清晨四点多，火车到达南杂木，天还没有亮，我们二十多个人就下来了。那时的南杂木还有残雪，因为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等着。当时人们还没起来，打电话又不方便，到天亮了，八点多钟才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才知道分配的人已经来了。便现联系，我们再坐一百多里地的汽车，到达了新宾县。最后，我又被继续分配，到了离新宾县一百多里外的苇子峪公社。当时县里有六所中学，其中一所在公社里，所以我就分到苇子峪中学教书，直到 1974 年。”

整整六年在山村乡间当个普通教书匠。

双双执教鞭

我问：“你当时结婚了吗？”他说：“我是和爱人一齐分配到那儿，我们 1970 年结婚。”她也是北大的吗？“同班同学。我们是同龄人，她就比我小一岁。我们一齐分到那间中学。”她也是学中文的？他再一次说：“同班！”

“也许是苇子峪中学第一次有北大分配来的大学生。”一去还是两个，他说：“对！所以当地感到很新奇，全校学生停课、列队，从长途汽车站，一直排到学校，欢迎我们两个人。反映出当地人和孩子很纯朴、很热情。对北京人，他们认为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大学生，到我们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停课，夹道欢迎。”

“我看你们开始去的时候，没人理，心都凉了，会不会呀？”他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在新宾县是那样，但一到苇子峪，农村的孩子很热情、纯朴，学校是九年制，我教文科，语文、政治、历史等，凡是文科都教。”

“我当时二十三岁。”倾谈中，知道这段经历为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虽然从繁华的北京，一下子到了小山村，但当时并没感到很大落差，想法也不多，既分到那地方，看见民风很淳

朴、同学们很热情，对我们期望也很大，所以我们感到要尽量教好课，提高教育水平。”

“虽然当时没有高考，但上学很不容易。”看得出，他对教过的农村孩子很有感情：“农村的孩子上学需克服很多困难，他们有的走几十里地，走读；远途的学生，几十个人住（睡）在一个大炕上，而且要把一个礼拜的干粮、咸菜都带好，就是些玉米面的饼子，或炒了的玉米；个别家庭比较好的，骑自行车。学生很艰苦，我们惟有把课教好。”

“当时还是文革，学生上课与劳动的时间，几乎是一比一。学生经常要种地，再有当时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因为当地的农民对修梯田劲头不是很足，因此学校还要种出‘样板田’和修好梯田，作出示范。”他介绍：“所以我们在深山上，凿开石头以后，垒成梯田，种好庄稼，然后让生产队到这儿来参观梯田是怎么修的。所以我在那里是一面教书，一面带领学生劳动，一直做到了1976年。”

在他，难忘的山村、难忘的六年！

“随遇而安”，是我对他那六年之评价。首都名牌大学的学生，或许是高材生，到了一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贫困山村，虽然听他语气平平的叙述，但同龄人之理解，我能感受到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意境。他很能适应环境求生存，以有限的条件，创造出美好的成果。我佩服王凤超那份以平常心待人处事，在困境中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乐观与勇气。

“所以我感到虽然从北大毕业以后，分到那么一个小山村，吃了很多苦，但我觉得这六年呀，收获还是很大：一是了解基层；另外与农民和学生也相处得很好；了解了基层生活的艰难。我觉得对我们以后的工作也是有很大帮助。”我说：“渝平是高干子弟，有了这六年，什么子弟（的痕迹）也洗掉了。”他连说：“对，对！”

所受之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但经他说出来仍是一贯的平和。而这六年，依我之见，除却对日后工作有很大帮助外，特别是当他位居高位后，尤显重要。他们的平易近人，诸如“叫我老王好了！”“就叫我小雷或渝平吧！”是人们常听到的，大家也感受到他们的真心，应是个好印证。

都是同龄人，大家的经历太相像了，我理解他们！

记者是本行

其实他们的学生不全都是农民子弟。

文革中，《辽宁日报》和上海《文汇报》成了“重灾区”，沈阳、抚顺的大批干部在苇子峪“插队”（到农村接受“改造”），他们的子弟都在苇子峪中学就读。“所以他们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又是一个“无巧不成书”的故事。他说：“后来这些‘五七战士’都纷纷回城，安置了工作。1970年，我和北大的若干同学一道，借调到县里，给老师编辅导教材，因为当时老师讲政治课和文化课没有辅导材料。在编教材过程中，我有机会经常到抚顺、沈阳与教育部门联系，因此很多学生家长又见到我了。他们告之《辽宁日报》很需要人、找不到人，你能否到这儿来工作。”

“我说可以！”学中文的，可以教书，但本行是记者或其他文字工作，他回忆自己回到本行的经历，也高兴起来：“大约在1970年底至1971年年初，我调到《辽宁日报》任编辑和记者。”渝平也一起去？“她没有，她有另外一段经历。大概是1970年吧！因为他父亲文革中被关起来，后来有病了，总理（周恩来）批示，让我岳父到医院治病，由于身边没有子女照顾，他们家的孩子当时全都在农村，她是老大，所以就调回北京了。人虽回京，但当时的户口还解决不了呢，她就参加了基建工程兵。因为军队不需要户口。”

“当时正是科学的春天。”此话怎讲？他解释：“《辽宁日报》新开辟了科技版，我就在科技版工作。由于我爱好文学，要普及科学知识，我想把科技版办得活泼一些，不要搞得太专业，便注意寓科学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我发现了东北工学院的科普业余作家朱志尧，他花了很多精力，写了大量科普书籍。我觉得他的事迹很感人，便采访了他，写了我到《辽宁日报》的第一篇人物通讯《把科学知识献给青少年》，而且还被评为优秀稿件。”

是否一炮打响？他只是说：“这位朱先生后来调到《光明日报》任部主任，并一直在此工作，我记得很清楚。”

新闻之深造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与招考研究生，给才到《辽宁日报》一年多的王凤超又一次机会。他说：“当时我妻子已在北京，我们一大帮同学都报考研究生，在同学们的鼓动下，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觉得研究生要搞研究的话，在新闻领域里，比较值得研究的是中国新闻的历史，我便报考了这个专业。”

“1978年10月我到北京学习了。”他说：“三年的学习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学生中大部分都是已工作过的，年龄从三十多岁一直到四十多岁都有，这是文革后的第一届，都比较成熟、有经验，加上当时提倡解放思想，所以印象很深刻。当然学习很吃力，你想想，我当时入学已三十三岁了，年龄大了，记忆力也不及从前了。”唔！很苦涩，很无奈！

王凤超感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里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把中国新闻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或者是政治思想史。他觉得：“新闻史应该有其自身的特点，否则不会成为一门科学，所以我写了一篇评论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一本流行的大学新闻

史教材，文章题为《新闻史应有自己的特点》，发表在社科院内部的探讨刊物上。当时大学新闻史的教材，都是按照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新闻史的分期，所以这个框架的本身就把新闻史的特点给抹煞了。”

终于，他毕业的硕士论文选择了《试论中国新闻业史的分期问题》，他认为：写史，一定要把分期研究好，分期要有科学性，新闻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阶级斗争，但是又不能等同于它。

他便是以此取得硕士学位，~~1985~~1985年毕业后便留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我说：“你才是真正搞新闻出身。”他赞同。我知道他后来升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并从助理研究员升至副研究员。

王凤超，专业人士出身，他的成长史，是一部很典型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在文革中辍学，经社会最低层之磨炼，人届中年方有机会再入学深造。不过，正是这班吃过苦的人，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因此，他们大多有所作为，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之栋梁。

服务港澳办

~~1985~~1985年初，王凤超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工作八年之后，被调往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于当年 圆月 缘日正式上班。

“我为什么调港澳办呢？”他自己解答：“纯粹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我的家住在北京的西边，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工作地点在北京的大东边，我每天上班往返骑自行车需要三个多小时，虽然社科院的工作不坐班，但每周总要去几次。冬天骑自行车，开始很冷，越骑越热，每次到达工作地点，连内衣都湿透了；在八年工作期间，因骑车出了几次车祸，比较危险；而当时社科院有五千多人，住房比较困难。当时渝平在全国记协工作，与港澳办的

人有很多接触。有人说：“你可以到港澳办来工作嘛！也是在北京的西边。若论与港澳办熟悉的程度，她比我早得多、熟得多。”

他说：“再一种情况，我在研究中国新闻史时，已对港、澳、台的新闻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中香港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是香港，比如说中国人办的近代报纸，最早出现在香港。如 1874 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中国人自办报刊，其中最早的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该报的前身，就是《香港船头货价纸》；1877 年由王韬编的香港《循环日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报纸，而且王韬经常在该报上发表政论，开创了我国报纸政论风格的先声。所以我做这个工作也与香港有一定的关系，我便于 1984 年初调到港澳办来了。”

刚来任一司副司长，当时基本法起草已近尾声，“我只在港澳办做了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他说：“所谓尾声，正是中英两国外长交换七封信件，在进行磋商的时候。”1985 年任二司司长，负责除香港经济以外的有关香港事务。

当时港澳办的司，是以一、二、三、四排下来的，没有具体的名称，港人对此称谓也有猜测：以为是保密或感到不够透明。“实际上是因为名字不好起。”他解释：“因为当时负责香港的事务就两个司：一司，负责香港的经济；二司，负责香港经济以外的所有事务。所以一司可以起出一个名字叫经济司，但二司就起不出一个名字来涵盖其业务。后来把二司一分为二，分出社会文化和政务，就有名字了，也就是现在的格局：政务司、经济司、社会文化司。可以说我们是听取了香港人的意见，让人一看，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在二司工作期间，王凤超参加了中英关于新机场问题的谈判，参加了中英关于 1985—1986 年香港选举安排的政制谈判；以后又参加了预委会、筹委会的工作；一直到来港前。

文人从政记

从文人转为政府官员，有何感受？“以个人体会，觉得与到农村去一样，反差不是很大。”

是否觉得自己适应能力较强？“不是。”他说：“因为我认为香港工作，与内地其他的行政部门工作有很大的区别，香港工作有相当多的成分是研究，要研究香港的情况，否则你提不出意见，或不能很好地提出对策性意见。港澳工作有很大的特点是要进行研究。”

“而我做过八年研究工作，所以我研究工作的底子，对我在港澳办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是把香港问题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且我过去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做学问的办法，对各种专题自己去做，做大量的卡片，我这种研究的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并用到现在。我是把香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香港和外国关系、英国的政策，甚至其中还可以详细再分，越南难民问题、香港人的国籍、居留权等相当多问题，我都做成专题卡片，我要力争对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有详细的了解。我得益于过去的研究工作，使我到港澳办后能很快进入情况。”

他觉得：自己是把文人做学问的一些功夫用在香港工作上，并说：“对我来说，觉得差别不是很大；另外我在研究所任副所长时，也做过科研的组织工作，也做过人事工作，管人、管物、管学问。而需要转变的情况则因社科院是个学术研究单位，提倡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统一不了也可以存疑，但这一点在港澳办做香港工作是不行的，香港的工作要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阶段，大家都可以在内部发表不同意见，但最后定下来了，就要集中，按定下来的办，不能再搞辩论。我来时就很清楚，两个单位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很快上路，到现在我也在注意积累资

料。”

做官也不难

我有感而发：“其实你这个文人做这个官并不是很难！”“对，不难！”他不否认：“我在人事方面、仕途方面不去考虑，而是一心一意做好香港工作。”跟你学者的身份有关？“对，有关。我不大关注人事关系，我也不到任何领导家里去，也不走这些门路，而是力求把工作做好，了解香港各阶层人士的看法，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放在向港人宣传‘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上。”

“文人、学者从政，若抛开许多东西，不要想得太多，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应的，从这个角度看，做官也不难。”他认为：“香港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要把来龙去脉搞得很清楚，提出对策，作为中央的参考，中央一旦定下来，便坚决执行。”

在内地，跳了单位再获提拔不容易，我说：“你官至副主任（指当时）已很不错，是哪一年当的副主任？”他说：“~~1985~~1985年。其实文人做官也可以不止做官，还可以继续做学问，这对提供作决策时，有更扎实的基础，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帮助，很多事我可以超脱，我没有面对那么多复杂的关系。”

回归后，港澳办的工作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王凤超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已成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港澳办的职能要作出调整，会涉及内部机构的设置，以适应香港回归后港澳办的任务，港澳办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起到一个统筹、归口管理的作用，但这个任务如何落实下来，就要经过好好的研究。”

“但不管作任何调整，我还是愿意继续从事香港工作。”他表示：“在港澳办工作八年多，我对香港还是很有感情的，结识了很多香港各界的朋友，而且曾在一起共事。通过预委会、筹委会

的工作，我感到：只要把道理讲透，把情况分析得很明确，内地委员与香港委员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他坦诚地说：“香港顺利回归，凝结了两地委员共同的心血。”

随遇而安平常心

我问：“一辈子印象最深是什么事？我们不打官腔，不讲大话，不讲冠冕堂皇的话，只讲对自己、对人生，讲自己的事，好吗？”

“我这个人几十年来比较顺。”思索良久后他这么说，我奇怪：“到农村去也比较顺？”他说：“我到农村去，一待六年，也没感觉到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我这个人呀，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处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力求把本职工作做好。”

随遇而安，对吗？他很赞同：“对，对！就是说不祈求太多其他的東西。”我接下去：“‘随遇而安’是一个词，还有一句是：知足者常乐！有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否认：“也有这个意思，我不像其他人，好像在农村就待不下去了，北大一毕业，到农村去，就好像屈材似的，闹别扭，搞得自己心情不愉快，周围的人也不愉快，我们没有这样。我到农村去，还是尽心尽力把学生教好、把本职工作做好。但我觉得六年基层的工作，使我了解了基层人的想法，对我将来理解各种不同层次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帮助，我对各种人都能比较理解。”这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一点！

“另外呢，我也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看看他是否有道理。”他很有体会：“基层的六年生活，我与农民都相处得很好。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我在农村，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五，但我是当地最高工资者，当地有的农民干一天才挣两分钱，有的人干了一年，也挣不了几块钱。那么我一个月四十三块五，当地的人羡慕得不得了，他们认为我在那里挣这么多钱，你怎么花呀？”难

得他在困境中，也能如此乐观开解自己。

“这种情况下，我就经常请农民喝酒。”竟然是贫困山村的“富翁”，只听他说：“所谓喝酒很简单，花五毛钱，从酒坛子里头，用竹筒子舀出二毛五分钱一两的二两酒，放在一个大碗里，农民从地里拔出一根大葱，剥皮不用洗，咬一口大葱喝一口酒，觉得这是最大的享受，也觉得是我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快乐。所以我也感觉到反差不是很大。”苦中求乐，也是一个人求生的最大本事。

谈及这些往事，他情绪高昂，他说：“我三十三岁，在工作八年以后，而且又长期在农村那样的环境里头，一下子就考上研究生。让我感觉到人生呀！有时的变动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我从苇子峪调往《辽宁日报》社时，头一天晚上我还是睡在公社招待所的土炕上，第二天，我到报社的当天晚上，就到了当时沈阳最大的演出厅，审看节目去了。”从农村的土炕到省城里最大的演出厅，真有点戏味，有时你真的不可不信人生变数之大，还真叫人瞠目。他继续说：“你说这反差不是很大吗！而当我在《辽宁日报》做编辑不久，一下子就又带着行李，到了全国最高学府念研究生去了。”

虽说反差很大，但你个人的心境呢？他说：“我这个人的哲学就是这样：遇到倒霉的事情不要垂头丧气，要对生活充满信心；遇到高兴的、好的事情也不要得意忘形，永远处于一个比较平稳、平和的状态。我认为这样比较好，要把事业、工作放在第一位，人生的最高奖赏是在事业的追求之中，我觉得这样会活得好一点。”香港会说活得轻松些，他同意。

我直感叹，倘若刚才草草结束采访，就听不见这许多精彩的感受。

结束语中他一再强调：“那是我的人生哲学，我没有太多想法。”我说：“你对很多事都泰然处之、坦然置之！其实你一生中

的反差很大。”他说：“不管遇到什么，我都以平常的心态，香港人不是也爱说这句话吗：以平常的心态看待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你是中庸之道，或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愿干、无所追求、无所事事、饱食终日的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最高奖赏是在事业之中，不管在什么环境、处于什么条件下，都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

老王！一个活脱脱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豁达开朗的平常人！

一九八〇年 元月 四日于香港

梁振英：

我绝对相信自食其力，只要努力，社会及身边的人都会给你机会。如果好彩的话，便一分耕耘有多于一分的收获；若不好彩的话，一分耕耘便没有一分收获。但还是有收获，因此：做！总比不做好！

很自信，但信奉自食其力

梁振英小传

1957年 1月 18日生于香港，祖籍山东省。

1975年至 1979年于香港英皇中学就读，并毕业。

1981年至 1985年于香港理工学院就读并毕业，获建筑测量系高级文凭。

1985年至 1987年赴英国 伦敦理工学院深造，并于 1987年获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1987年获英国 伦敦城市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为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及香港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

曾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组长、筹委会副主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等。

现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义务秘书等

职。

还任上海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等。

毋庸置疑，梁振英的成功早已为自身形象定型：聪明过人，事业有成；年轻有为，名成利就。令许多年轻人对他佩服有加，五体投地。

他自信、努力、理性、成功，几乎集中了年轻人梦寐以求，努力达至的目标于一身。

年纪轻轻，已在香港社会崭露头角，举足轻重。但他平时为人低调，很少张扬。

满口说格言

为他做访问，听他说了许多，猛地想起：他这么年轻已那么成功，定有什么格言、名句激励着自己。

因此问他有什么格言？他竟然答曰：“无格言。”

然整个访问过程，又听他很自然地、不自觉地道出许多格言、名句，诸如：

很相信自食其力；

生命是自己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刀越磨越利；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一下子可以收录许多，他对每件事、每个问题的分析、概括，都像格言。

事实上，他的成长、他的人生是在许许多多格言、名句、警
员源

句的激励下度过，只是他不经意罢了。

梁振英是位自信心很强的人，他信心十足地说：“作为亚洲人，我们觉得很自豪。1982年12月，我们与欧洲、美国两间全世界最大的同行业公司结盟，三分天下，友好地负责亚洲地区测量业务的发展，大家平起平坐，这是亚洲人的一种荣誉。虽然有许多事要做，但势头不错。”

据悉，在此之前，欧美已结盟，知道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颇有潜力，加上亚洲地产市场广阔，也需要在亚洲物色对象发展业务。

1982年，梁振英他们刚开业，权衡后，决定与这两间世界性的大公司结盟。接下来他们很忙，下一个目标是把三大地区的业务重新组合。

从专业谈起

专业人士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地位，向来，专业人士有专业知识、收入高、地位也好，是许多人羡慕、向往的职业。

目前全港大致分有九大专业，从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到测量师等都是人人称羡的专业人士。梁振英介绍：“一直以来，专业公司都为英国公司所垄断。而英国是从不在殖民地生根的，有朝一日会下旗归国，现在它不是已走了吗？本无可厚非，但香港是个很依赖专业人士的社会，身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主张不排除，但要有自己的专业队伍。”

1982年，包括梁振英在内的七位不打算移民的香港仔（香港年轻人），当时年纪最长者尚不超过四十岁，决定自己做股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他自诩：“我们成立的测量师行属于香港掌握自己前途、自己命运的专业人士，亦旋即成为全行业中本地人最多的机构。”

初生之犊不怕虎，测量师行一成立即崭露头角，很快，业绩便与仲量行并列，在中国内地、本港及台湾等地设公司十多家。

做足六年胶花

梁振英的成长史，是典型的香港社会中的一部自食其力史。

他小时候，即五十年代的香港，整个香港社会比较清贫，但梁振英在很小的时候已完全知道钱的价值。“我们三兄弟书读得很好，可免学费，当时每人每日能省五元学费已很高兴。”他回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每天步行往返学校，来回各半小时，可省下车钱。当时生活很简单，一年仅两套衣服，冬天、夏天各一套。如此清贫的生活，我相信当时整个社会都这样。”

梁父为警员，每月薪金三百元，又没外快，在当时，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亦相当勉强。梁振英说：“我们一家人住在警察宿舍，但很怕爸爸退休后没房子住。为了买楼，爸爸妈妈发动全家人做胶花。”

那时香港轻工业正蓬勃发展，塑胶花出口世界有名，许多厂家的塑胶花便发外加工，像梁振英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他记得妈妈把爸爸的薪金作家用，全家人起早贪黑做塑胶花赚来的三百多元则存起来。

终于，当爸爸退休后，做胶花积蓄之钱，做了买楼的首期，全家辛勤的结果是可以自住其屋，不必住廉租屋。

一间名为“好景胶花厂”，格局类似现在的山寨厂，给梁振英留下深深的记忆。因为从他八九岁至十四五岁期间，一个人从儿童至少年的整个阶段的课余时间，足足做了六年胶花，全部“献”给了好景胶花厂。

他说自己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子，经常要去交货（属重活），所以认识了工厂。我说：“工厂的名字也起得好，‘好景’、‘好

景’，也为你们家带来好景。”他连忙解释：“话虽这么说，可我也做得很辛苦，日夜地赶做胶花，我的手都起了老茧。”

他也觉得那段时间比较特别。“其实当时爸爸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家计，可以不做胶花，但为了买楼，做了。回报是：住上自己的房子。”他回忆此难忘童年往事，颇能总结出一些人生哲理，他说：“我比较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比如有的人，天生残疾、或因为天灾人祸、或因为身体有毛病，皆情有可原。但我绝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能获取的绝对是自食其力得来的。”

“哈！成功人士都相信自食其力的道理，在采访名人的过程中，这句话我听了不下十次，此话是否你们共同的经历达至一致的总结？”对我的问题，他以笑作答，算他默认了。

香港社会很公平

梁振英成功了，他是在香港成功了！

因此，当他回首望过去时，他深感香港社会给了许多人机会。“只要肯做，就会给你做。”这是他总结的另一哲理：“香港社会有这样的益处，过去三几十年，由于经济发展的关系，香港基本上没阶级观念、没阶级屏障，因而也没阶级压力。只要你努力去做，社会及身边的人都会给你机会。”

“因为他成功了，才有这样的想法。”我心里这么想，但却问他：“这个观点你很早就知道了吗？”他不加思索地答：“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我接着说：“所以你不断给自己机会，所以你会取得成功。”他说：“我是不断给自己机会。”他肯定了前一个“所以”，而把后一个“所以”否定了，认为：“只要肯做，就会有做事的机会。我经常讲：香港公平的地方在于你肯做，便让你做；只要肯做，就会有收获。”

“不是每个人都有收获的。”我打断他的话说：“我看见许多人，做了一辈子，也没什么收获。”他还是坚持：“你一定会得到的，如果好彩（运气好）的话，便一分耕耘有多于一分的收获；若不好彩的（运气不好的），一分耕耘便没有一分收获。但不等于没有收获，还是会有收获的，因此，做！总比不做好！”我也坚持，说：“但我看见的香港人中，你说他不做事嘛？其实他也做，而且他勤勤恳恳的，也可能他的勤恳价值很低，使他一辈子也没条件供楼。在香港，这种人太多了，你……”

不等我说定，他已抢过话题：“还是总比不做好！有的事情你想做，却没法做到，比如在英国就没法做到。”我希望他说得深些，也抓住这观点抢着说：“其实你也很清楚，就算你的亲戚朋友中没有，但你在香港是可以看到的，有的人，不太少的部分人，他们一辈子都过着一种……”他抢着接下去：“基本生活。”我也不罢休，回敬他：“有的人连基本生活也没有，或靠政府综援金生活，他们也很勤力。”他忙说：“少数，少数，少数！”连说三遍，他仍然坚持：“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公平的，有的人不劳而获，可能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但这是极少数。”略略顿了顿，他说：“相对于外国来说，我觉得香港的机会比较平等。”

“你是否想告诉大家，只要勤力就可以了，但机会呢？”继续我们的探讨，他答：“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但在同等条件机会的情况下，你勤力与否，得到的回报仍有很大的区别。”

与梁振英的对话颇有趣，他大有有理不饶人的味道，始终充满自信。

他的成功、他的经历，只能总结出梁振英特有的经验。打工时，他曾试过年薪过千万，被称为香港的“打工皇帝”。记得我曾问他：“为何这么高薪还要自己出来当老板、伤脑筋？”他很幽默地笑着说：“我是打算出来找更多的钱。”果然，据悉他出来的

第一年，就比打工时挣多了两三倍。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

刀越磨越利

梁振英的成功，还在于他巧妙地、合理地安排时间，一天满打满算，二十四小时，他对二十四小时的分配也挺有趣，似乎在有限的时间里使时间增长。

他常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分成三份：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休息。其中八小时工余时间你可以百无聊赖打发掉，但如果你每天拿出其中的一小时去做一件事，而这件事你可以不理会是什事，可以不一定与物质生活有关，比如你可以看书，可以追求某一种信仰，也可以学一种技能，甚至培养一种兴趣。但一定要持之以恒，一年下来，共有三百多个钟头，是很见功夫的。”

原来是这样算出来的，自然一年多了三百多小时，很见用，然持之以恒则不是常人可为之了。相信他一定做得到，我单刀直入，直接问：“你是怎么利用这一小时？”他答：“多数花在公司的事务上。”我再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利用这一小时呢？”他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用途，读中学时，我看很多书，从古时的章回小说，到现代的杂志、报纸；在英国读大学时，我又去做帮工、搞中华同学会；回到香港工作后，我每晚用两三个小时做公司的事，下班后，我经常把工作带回家做。”

虽然聪颖、有为，但他的事实告诉你，他付出了过人的勤快，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他给我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他称之为：“看起来似很残酷，但是现实中的事。”他介绍：很多同行中的外国公司问：为什么这行在欧美赚不了什么钱？但为什么在香港或亚洲地区有钱赚？

而梁振英认为很简单，他分析：本行业所有的支出几乎都是固定的，假设成本为一百元，做八小时没钱赚的话，但你做十小时，便有两小时是不用成本的，那么这两小时便是赚了，算起来赚了百分之二十五。他说：“实际上是赚了自己的超时，但西方人不接受这一套。”

因此，身为老板的梁振英，每天早上八点钟前（香港的写字楼一般为早至晚上九点开工），不是第一个、便是第二个回到办公室。他并说：“我们的公司从早上八点钟至晚上九点钟都有人在办公。”我问：“真的？岂不超时很长时间？”他强调：“其实香港许多私人公司均如此。”

信不信由你：香港中环任何一座写字楼，旁边是一座私人写字楼，若你晚上七点钟去照张相，你会惊讶是一幅鲜明对照的景况，这边厢乌灯黑火，那边厢灯火通明。

梁振英笑称为我推荐这个上好的新闻素材，我问他有什么含义，他表明：“我不是有意批评公务员，只讲事实。说明在政府机构可以准时上下班，而私人机构的加班加点则是极平常之事。”我笑他：“你是老板，完全没有加班费，自然希望雇员超时服务，但打工仔怎么想？”他的回答却很干脆：“刀越磨越利！”

一代人的经验

“梁生，你今天的一番话对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很有启发。”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聪明过人？”他很快接过问题，并很肯定：“不是！”随即顾左右而言他，转说当年自己有机会读书不容易。再说：“生命是自己的，一个人，不管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很多事父母帮不了你，起码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帮你，你看，至少书要自己读，事要自己做。”他继而说：“不管出身什么家庭的人，即出身于小康人家或大富大贵家庭的人都需要努力；出身

生活条件差的人更要努力。有的年轻人自暴自弃，不好！我认为，始终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谈了这么久，虽然他讲了许多自己的体会，源自对自身经验之总结，但我发现他没有很直接地谈自己，我请他谈谈自己、分析一下自己，他说：“分析自己没意思，我所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

许多人觉得梁振英很懂得保护自己，不分析自己，准确地说，不向别人分析自己，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莫非保护自己是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有说有笑中，时间匆匆过去，话题很广，他谈及国家、事业、家庭、子女、同事、同学等等，惟独不触及自己。

我问：“为什么很少讲自己？”答曰：“自己没什么好讲，香港社会几百万人，全中国超过十二亿人，讲自己不值得。”

普通人家的孩子，年纪轻轻，早已成为万人瞩目之才俊、政坛名人。梁振英成功了！理应付出很多，也承受很多，但他说：“不觉得压力，不觉得累，我是越忙越精神！”

永远的自信心十足！

一九九九年元月九日于香港

李家祥：

我承认政治没有中间立场，但在特定环境中，既定利益却把政治利益拉开了，于是便坚持代表自己阶层的政治利益。我们则在几个不同的观点中协调，在不同共识理念中找平衡点，即求同存异。当然我们不必求次成功，但做到了就会拉近距离，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

不群不党行中间

李家祥小传

员缘年 缘月生于香港，广东省番禺人，三代世居香港。

员缘年至 员苑年于香港圣保罗男女子中、小学就读。

员苑年赴英国深造，员苑年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获荣誉经济学士。

是 员苑年度首届香港会计师公会杰出会计师。

员苑年 怨月被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东区区会议员；员苑年再被委任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当时，两者均为全港委任议员中最年轻者。

曾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亦是 员苑名筹委会委员中最年轻的数名委员之一。

热心公益事业与社群服务，兼任公职超过九十一个，恕不在此一一介绍。

不知路经多少次，就是没缘走进去。

终于在最近（~~1995~~1995年 9月下旬）的一天，我有机会进入香港最高立法机构——香港立法会。

感觉上，未入去时：既神秘，又好奇；置身其中：仍觉神秘、好奇。但对来访者，很严；对议员，则相对宽松。

电视上看惯的大会议室场面，议员可以自由出入，专设的小型会客室，供议员接待来访者及传媒采访；还有许多旁听席，专供市民旁听，及每次会议各传媒机构派专职记者自始至终“贴身”采访。去的当天，碰上血站来搞义务捐血。走廊上、会客室之热闹程度绝不亚于大会议室里热烈辩论时。

李家祥议员应约在会议空隙接受采访，使我有机会“走马观花”般领略立法会概貌，更难得的是看见许多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议员。

有个早餐派

立法会里有政党人人皆知，每届立法会选举，各政党为直选议席争个不亦乐乎，市民早已司空见惯。而许多人不一定知道，立法会里还有个“早餐派”，名气还颇大。

所谓的立法会内有“七党一派”，除七个政党外，“早餐派”便是指那“一派”。

很多人都说：欲知“早餐派”内里乾坤，可找李家祥。

见得李家祥，他倒说得简单：“外界称我们早餐派，我们自称‘为食派’（好吃派），每周聚会一次吃早餐，也经常吃午饭，如碰上吃晚饭，太太可以参加。”

我问：“只是吃早餐那么简单？”

两次访问，加起来有近六个小时。李家祥口才了得，人也爽快，在一问一答中谈了许多心里话。他的原话已是上好文章，为向读者披露更多内容，力求原汁原味，特以采访实录示人。

两次采访，时间、地点不同，我会作详细交待。

为方便读者阅读，权且以符号代表我们两人，●为李家祥先生，○为本记者。

第一次采访：

时间：1995年 7月；地点：李家祥写字楼。

●说“早餐派”也好，“为食派”也罢，准确地说，我们是不群不党中间派。

○都知道政治没中间路线可走，这中间派怎么做？

●我从来讲的是政党之间，或议会不同意见之间的中间派，而不是中国和英国两国之间的中间人，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总得有组织、有政纲、有核心、有行动，否则不可能长期聚首，行动一致。

●我们没主席、没龙头大哥。大家一般高、一般大，一齐相处基于互相信赖和信任，谁也不比谁高明。我只做推动的人，或许比其他同事主动些，在政治上参与多些，但我仅称得上是联络人、或信差，传递信息而已。

香港多中庸

○1995年你以最年轻议员入局（指回归前的立法局）？

●对！未入局前我已认识一半议员。我们专业人士不喜欢政治斗争，我们想以理智的态度，在议会架构起平衡作用。我觉得大部分香港人比较喜欢中庸、理性及很和平的方式，而不喜欢太多争吵。

○你们就这么定位了？

●政治定位是我们几个人度出来的。大家志同道合，最初，我们只为了让香港人、政坛人士和传媒接受。这条路很难走，很

多朋友劝我，但我始终觉得，当时我们这班人并不是坚持某条路线，而是觉得香港没有第三种声音，只有两个极端。我自己很相信政治有时会很强硬，真的，不可以没有强硬，但有时需要能坐下来谈判，方能达至成熟、理智。

“媒人”基本法

○早餐派有几人？

●最初只有六个人，后来发展至十一人。我们的特点是大家专业背景很清晰，人人都是本专业顶尖级人物，个个也是本专业会长。说来好笑，是基本法把我们撮合在一起。

○很好奇，什么意思？

●哈！即“媒人”是香港基本法，他们全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自己则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界别内的代表，有份执笔和推介，还有机会接触九个专业团体和他们的头头。六个人中，只有我一人是分别与每个人认识、熟悉的。哈哈！可以起到媒体的作用。

○几个人中数你最年轻？

●若论年纪，“早餐派”有些人甚至是我的长辈，他们与我爸爸认识十几年后才认识我。我承认，自己的位置不适宜做政党。我们感情好深，没有谁处于领导和主使的地位，也没有谁处于主导或从属的地位，在“早餐派”，大家觉得很开心，这也是我们容易相处的理由。

政治平衡术

○其实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中间路线？

●没有！（很坚决）

○我糊涂了，怎么理解你的“中间派”？

●我们不是生存在两个政党之间的中间派，而是保持政治中立，使某个问题在上纲上线后给予一些理智的、带协调性的意见，让双方都能接受。主要目的是维持稳定，我想，这仅是一种政治艺术。我们的中间路线很特别，只包含这些意义。我认为政治上的独立不代表某一政治阶层的利益，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重视稳定性和坚持理性谈判，以此达到政治决定。

○但政治决定是没有中间立场的！

●我承认政治没有中间立场，但在特定环境中，既定利益却把政治利益拉开了，于是便坚持代表自己阶层的政治利益。我们则在几个不同观点中协调，在不同共识理念中找平衡点，即求同存异。当然我们不必求次次成功，但做了就会拉近距离，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我想：如果做到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理解的中间派。它是新共识的政治，我们的解释即是在新政治环境中，可以寻求共识。

○结果呢？效果如何？

●我们不是中间人、也不是中间路线。但我们谈判式的政治，在香港起很大的作用，党派之间有什么事会与我们倾（谈）；香港市民、传媒也很重视我们持中立态度的意见，这就叫香港的政治平衡术。

○此种平衡术有市场吗？

●香港始终是多元化社会，整体利益需要协调，那就需要有些人不介意，不采取鲜明政治立场去发挥应有的作用。反之，政党的旗帜鲜明，我们反而不容易做到。在上届立法局（指回归前的倒数第二届），我们占十一人，六十个席位中我们占了重要的位置，每次选举都有政党争取我们的票。

○真有政党向你们拉票？

●哈！你计下条数（算算这笔账），我们只要有八九个人到

一边，来回便是十六至十八票。所以在立法局的六十议席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我们的票也成为决定性的票源。但我们发挥最大的力量就是齐心，每次投票相当齐心，宁愿稳阵也要齐心。

没双重标准

○会不会让人说“亲中”？

●政治上我不敢讲，工作上与中方、新华分社、北京已有很多年交情，沟通良好。在议会中若讲道理，接近我们的脾气；辩论时我们立场很清楚。不是中方代言人，很少人讲我们“亲中”。其实叫我偏帮任何人，与我性格格格不入。

○但以我之见，我始终不认为有中间路线。中间路线于你是否存在？你是筹委会委员，是全国人大任命的，能说不“亲中”？

●我本身是中国人，完全不反对或介意任何人说我是“亲中”人士，但我不会常挂在口头，当作一种身份的象征。惟一表达方式是要有行动，为中国做这么多事，完全以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香港为出发点。至于外界、传媒以什么方式去描述，我不在乎，那不是我自己的标签。

○在历史的转变时期，你怎么处理？

●现在处于历史的转变，我愿亲身去体验。比如接受做筹委委员，我想，既然中国政府委任我做，讲明我过去服务社会的纪律是对的，我有什么理由要转向？

○我明白了。

●如果我的信念、我的行事方法别人接受的话，我乐意去做，但绝不强求。我对任何事、任何政府都不会改变真性情；做任何事都会交待清楚，绝对没有双重标准。

○在筹委会的处理方式也与立法局相同吗？

●具体操作上还是有点不同，比如筹委会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我采取文章交待的方式，我写过多篇文章，有自己所在小组的，也有对别的小组的意见、建议。

○你怎么看待筹委会的工作？

●在我，对筹委委员的工作，我更重要的是看成公共事务性工作，因此我认为最重要是真，可以要求自己谨慎，不可以假。我在筹委会讲话与在外面是一模一样的。开会时，我会多发言，自我感觉其他委员会听我的发言。

香港是我根

○墙上挂的像是你父亲吗？不介意我为你拍张相吧？

●不介意。这是先父生前办公室，他已于两年前（~~1989~~1988年）去世了，但这里的一切，仍按父亲生前模样布置，我经常在这里办公。

○你子承父业，父亲很重视你？也对你很重要？

●刚好相反，我在家里排行第六，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地位属行行企企（等闲）角色，因此从小知道要自力更生，自己搞掂（管理好）自己。直到中五选择学会计时，才“突围而出”被父亲发现。

○从此受父亲重视？

●有个过程，入大学后，几个暑假都回香港，在父亲公司做暑期工，我很勤力，受到父亲重视，忽然发现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一直在幕后默默帮我。

○父亲对你很信任？

●是，他临终前，把母亲托付与我；把在家中做了四五十年老工人交给我，告诉我：要管自己人的生养死葬。

○你父亲等于把他的一切，把他的根都交给了你。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但我妈妈不喜欢离开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也是要我留在香港。

○如何看香港？

●从地图上看，某一个地方只是一块土地，你会没归属感；香港也绝对称不上环境美。只是我积极参与香港的建设，熟悉本地运作，与这里的许多政界、民间社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香港给我和我家庭可以享用的非常多，包括朋友的支持、家庭富足的生活（也包含精神上的）还有很多不该得的荣誉和香港对我的很多认同……总的，香港这个社会给我很多很多。所以加加埋埋（全部加在一起），我对香港有很深的、很实在的归属感。

○有没考虑过，自己对香港的这种意识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的？

●我去英国八年，读中学、大学至考会计师牌，从未动摇过回香港的心。其实从我第一天去英国算起，我从头到尾都想回来。

○是自己的选择？

●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否则绝对不会那么投入。我对香港的感情很深，香港是我的根，无论任何情况，我都要留守香港。

朋友满天下

○与你谈了半天，发现你的脾气很易与人相处。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似乎是顾左右而言他）。小时候在家，我就很识（知道）保护自己。我很自立、很有主见；在学校也学会与人平等相处。所以，不论在任何环境，我都好容易生存。我从小就做义工，我希望永远在多元化社会中生活，永远在社群中起作用。

○我经常见你忙个不亦乐乎。

●我是喜欢忙的人，个人很享受做事情。在香港，老人、伤残人士、妇女、幼儿等，全是我的工作范围。全港计有一两千个集团与我有接触，每周接受邀请的超过一百个，我最少出席十几次活动，对我来说，接触群体很重要。香港是个大百老汇，什么都有，我与一些很基层的人士、和伤残人士能以兄弟叔伯相交，我们可以无分界别、无分阶层；我与商界的顶尖人物也可以兄弟相交。在香港，很多人与我很熟悉，我建立了许多社群关系。正所谓相交满天下，所以我对香港的感情是很有归属感。

○很多谢你说了那么多。

●但我最后想说的还有一句话：中庸不等于不积极！

第二次采访：

时间：1985年10月14日；地点：香港立法会大楼。

时隔两年多，我们又有机会坐下来，说说特区政府成立后的立法会里面，不群不党行中间的“早餐派”在新架构中如何运作的故事。

巧合多于设计

○上次我们谈得很投机、深入，觉得你与我谈了许多事，时间过得很快，又两年多了。我一直在注意，你是“不群不党行中间”的议员，我相信你现时仍然继续在走这条路。

●是，我想我稍微走偏一点点，都会给报纸批评。

○哈哈！完全有这个可能。

●我这条路就是这样走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建立了一种凝聚力，现在正在参加补选的两个人都打电话来，就是金融组别和临时市政局的候选人，他们都表达了想走我们这条路的意思。现在是谁想走这条路便自己来找我，在某种程度上说，加入

“早餐派”已成为一种从政选择，而我们则很清晰地提供了一种从政取态的选择。所以我行偏少少，传媒也会觉得奇怪。

○就是你现在就算有心走偏少少，也不行？

●是！

○记得“早餐派”后来有十一人，现在有否发展，是多少人？

●现在基本上也是十一个。

○不止吧！

●如果算上以前也参加的，就有很多朋友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现在仍在立法会的。

●仍是十一个。

○十一个？为什么这样巧？

●我觉得巧合多于设计，现在各派系都在上上落落，但也有好多新议员有兴趣加入。我认为：十个人左右，相对于六十位议员来说，是一个好数目；对于我自己，我并不想集结什么政治势力，我相信这批议员想做实事，而不是想表现什么大的政治野心，或联群结党，去做什么执政党。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做执政党，我们没有这样的野心，但我们也看到党派的势力这么大，需要有一个组织，使一些议员有发挥的机会。宁可说为了保障自己有一个发挥空间，多于去争取做一个大党的机会，所以人数太多的话，反而不……

○你说到党，难道你们也承认是一个党？或一股政治力量？

●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团，即一个政治团体。而这个政团只局限于立法会内运作的一个政团。我们不是党，党要具备三条件：党纲、党纪、党的集体行动。包括在选举时，资源和党纲的运用，这一切“早餐派”都不会有，我们不会集合起来，一齐去参选；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党纲；如说代表我们十一位议员的，也没有一个党纪，要求大家投一致的票。只是有个“君子协定”，

并非纪律的行动。这三样，不要说我们，就算外面已有的政党架构，都未行到这一步。外面当我们是政党，我们分得好清楚，我们还未是。

七党一派鼎立

○外面把你们当成政治派系？

●是！是当政治派系，所谓立法会内“七党一派”，我们去见财政司，特别指出是“七党一派”，这“一派”就是指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是一个政治派系，总的看，有议政特色，也可以吸引到新的同事加入。有坚决不入任何政党者，现在全都主动来找我们，相当主动，询问与我们合作好不好，我们也会吸纳一些适合的议员加入。

○为有些不想参加政党的人，找一个发挥的地方？

●你看第一届立法会内，如既不是我们的人，又不是政党的人，已绝无仅有了，大约有几个，他们自有一套行事手法。但基本上他们对政治不是十分投入，不过与我们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很多事也和我们商量，曾经参加我们的聚会，但不是正式成员，我们是十一个人，但讲十一个半也可以。

○是否处于游离状态？

●确有什么事也问我们怎么做的，很游离，不过也会积极向我们的朋友了解。他们是走直选路线，所以取态不一样。

○你任过九七前的立法局议员、九七后的立法会议员，也曾是临时立法会议员，你觉得九七前的立法局与九七后的立法会，前后有什么不同？

●惟一能掌握的是政治取向，是这么多年来相同的。市民和传媒基本上都接受我们，我们讲话比较少政治动机和政治色彩，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发言比较专业，实事求是发表意见。你见

到很多传媒都很乐意在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上，给机会予“早餐派”的独立议员发表意见，这在政治取态中已确立了地位，在几个议会都没有改变。

与政党之关系

○与政党呢？

●同政党合作的关系就变化得很快，基本上谈不拢，现在政党结合的力量越来越诡秘，变化多端、离离合合，令人看得五花八门，政党也越来越多，在你上次做访问时，“早餐派”的实力是比较强的时候。

○啊！那是 1985 年初。

●算起来 1983 年最强盛，现在也可以说很强盛。如果说 1981—1983 年不是全盛时期的话，那么 1983—1985 年是我们比较少发挥作用的时期；到了 1985—1986 年的临立会，我们恢复了规模，有十一名议员，真正在议政方面就较少发挥大力量；而在临立会，意见比较单向，没什么分歧，所以虽有十几个人，但基本上几个大党合起来，就不用听取其他意见。那时的意见比较单纯些、意见比较统一一些，差不多没有中间的存在空间。虽然我们规模存在那里，但我们说话仍然突出了政治色彩比较淡化的角色，我们依然有所表现。讲到发挥力量，我们反而在 1986—1988 年恢复了一些相对大的影响力。

○应该说在五月选举之后、在第一届立法会之后。

●我们可以中和政治的两极化，也可以说起了冲淡两极化的功能，这是比较明显的。之前，立法会对民生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对中国的态度，现在比较接受，基本的取态是合作的态度。而社会上对民主的步伐，工商界的利益和基层利益的分歧，在立法会仍会存在，对这些分歧，我们这些专业学术背景比较强的议

员，仍然可以起到少少淡化政治的角色作用。

对政府的态度

○对政府的意见呢？

●也可以做到当特区政府有合理的政策时，可以帮政府说一些公道话。因为我们少一些政治负担，或者包袱。比如政府这次积极入市，捍卫联系汇率的行动，其中最鲜明、肯出来公开辩护的，是我同吴亮星议员，几个平时走在最前的，反而没这样，我们主要是没政治包袱。

○对这次政府入市，似乎有许多不同意见。

●我们是真真正正旗帜鲜明地最早指出：这次行动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我们没有这么多顾虑，很多人会看看背后的功能组别怎样看，才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我们已经去马了，见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便有这么快的反应。对于批评政府，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包袱，因为基本上是以事论事，见到政府有不合理的地方，也很愿意提出积极的批评意见。你会发现我们这批议员比较少用一些很负面的字眼，相对来说，温和好多。

○你觉得九七前后的对比怎样？

●我觉得很难用九七来做分界线，我前后做过四个议会，就四个议会来说，个个议会的互动力量都很不同，感受也很不同。看议会的组合多过看政治环境，现在可以说，议员不同的组合，很多时是需要，现在已是 怨月，大家（各政党）仍然处在适应中，适应新的组合与内部的动力，目前我们也都在摸索中。

○就没有改变吗？

●当然议题有少少变化，九七之后，在政治议题上，很强烈的两极化的因素消除了，相对来说，少用了一些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政治议题，挑起一些很感性的辩论，这是减少了，因此

在会上擦出火花的机会相对减少了。但在民生问题上有辩论，现在看，比以前理性少少。

○大家都比较理性了？

行政立法之间

●对，大家都比较理性了、温和了，这是事实。我要讲的是，九七年之后，我们反而感觉行政主导有少少变质，我想：行政架构本身在九七之后，未完全理顺，没恢复以前那么统一的对外形象。现在是这样：反而出现行政、立法两会的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现在真是这样？

●是呀！这样反而会间接导致立法会议员更加合群。

○令你们这些议员走到一起了？

●不是我们设计的，是好巧合、意想不到的、意外的结果。我们反而要面对一个对立法会意见不是很听取的、对立法会议会文化有相当抗拒的行政架构。由此也可见行政架构本身，其内部未能达至上下一心、未能做到内外一致，我们看不到一个团队的精神。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产生？我没有理由去深究。有人说某官员阳奉阴违，好多这样的意见，你可看见董建华先生在行政会议所讲的话，和官员所执行的经常出现差别。

○自相矛盾？

●导致立法会里好多派系根本无法适应，基本上好像我们这样好支持合理施政，亦有相信政府不是做得太差的议员，有时也要与政府对着干，这才搞出了“七党一派”迫政府出来做事，也迫使“七党一派”结合。其实这种情况大家都不想的，只是后来清楚反映出当时政府是以乱对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怎么去形容它呢？你是否觉得以前的行政局比较强势，现
员近

在的是各方面代表都有？

●以前的行政局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感，知道应该怎样做。当时的行政会议有相当的灵活性，给人一种强势的感觉。为什么呢？第一，基本上市民对他们有信心，不会前后不一致。

○你们今天下午是否讨论行政、立法的关系？

●是呀！第二，他们说话比较言行如一，所做之事，上面说话，下面跟着一齐做。

○上行下效？

●有一个明显团队的对外形象。

○有没有这个感觉？他们各说各的，你讲，我可以不听你的，不当你一回事，如何理解你说的团队对外形象？

●是呀！甚至乎这个官讲，那个官不出声，抄着手，不睬你，就算不出来讲不同的话，也不做。他们当时比较懂得利用政党之间理念的差异，提出一些政治上的折衷办法，很多时候可以拉到足够的支持，当然有时未必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但很多时可以灵活走位，包括中间派的支持。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铁板一块，通通都打，完全不变。讲得不好听，“撞板多过食饭”，不肯“讲数”，也不肯迁就。

○现在的议员岂不很难做？

●以前还有一样，当做到的时候，政府会给予政党和议员一些分，如提出过好的意见，则给他一个机会，你说领功也好，向市民交待也好，你有份出力，政府向议员多谢一声，让人感到舒服。现在很少这种情况，以政府的眼光，没什么是对的，仿佛议员做什么都是错的，就算一些很帮政府的议员也很难做。

○好像经常在唱对台戏，觉得很难做，是不是在讲自己呀？

●不单止我们，我们也算其中一个支持政府的“派”，你问问其他，相信他们私底下也会说。

○这是否一个新政府成立所必须出现的问题呢？

●可能是太过于行政主导；可能自己要求太高，对自己的威望看得太过紧张，担心市民对自己失望；担心国家领导人失望。同时也反映出在行政机构内，和政界人士打交道的老手越来越少；作为沟通桥梁的也比较少，因此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我见特首时，是我提出的，后来不知为什么，特首搬用了我的字眼。因为“早餐派”议员见面时，我提出一个概念，希望重新建立一个互信、互助、互相尊重的关系。

○六十个议员中，对，现在是五十九位，你们会不会觉得特区成立一年多来，行政立法的关系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在今天的辩论中，大家都知道，连最温和、最帮政府的政党都出来说话：要改善！他们修改了议题，但基调不变。

○你自己怎么看？

●我自己都觉得有必要。很多人都说不要太突出矛盾。但我想：我做事时习惯了有问题就要勇于提出来，勇于改善，最后争取实实在在的结果。这也是考验从政者的承担和勇气，不怕去面对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对我来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大家对着白，都说黑的话，不等于令人更有信心。若给人感觉最后是不能兑现的话，从长远来说，更容易打击整个特区政府的威信。现在市民“好叻”（很醒目），文化相当高，大家看实质结果，施政预测与实质结果的出现是不一样的，这才是建立政府威信的基础。而不是他讲一句话，个个都跟着讲同一基调的话，这不是威信。

政府勤政爱民

○如果撇除金融危机这个因素，你觉得这个政府怎么样？

●我好相信上至董先生，下至所有官员，都是勤政爱民的；也好尊敬他们。所以我从来不用挖苦的字眼来责成他们，因为基
员愿

本上他们的用心和动机是毫无可疑的。但只是在施政的时候，是不是第一协调行政内部的关系，使其做得更好，包括政界意见。能不能减少猜疑和不信任，我觉得特区政府不太信任从政人士，包括党派与议员。你说行政会议真心信任官员，我不知道；你说官员真心信任行政会议，我也不敢说。

○你真这么看？

●是！如香港电讯今次的行动，理由太弱，它做生意是独家独市的，不可能蚀本，没有受经济低迷很大的冲击，它不像一些律师行连生意也没有。自己去减工人“人工”（工资），只是为了老板的荷包，又如此高调，得不到人们的同情。

○你觉得你们中间派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下，在目前的经济低迷情况下，怎样发挥你们中间路线的作用？

●我们也做了不少“保经济，防狙击”的研究，让专家有机会发表意见。我们也默默耕耘，无论在政府内部，还是公开发表意见，我们见过四五次金融、保险和证券、地产界不同的人士，有很多具体建议，如果特区政府和董先生所做的事，配合我们的说法，我们也会支持。

○如何配合？

●作为议员，可以做到的就是讲话，如果特区政府愿意找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人参与工作的话，我们很乐意去做，但是作为议员只能提意见，则很难取代特区政府去做什么。我自己有篇通讯叫“祥话短说”，是我这几个月的言论。政府有多少行动，虽然口里不承认，但事实上不少是跟着我们讲法的大方向，我觉得政府虽然好像没有怎么采用，但很多已认同了我们的观点。

多数议员气馁

○如果从工作的难度来说，你觉得回归前难些，还是回归后

难些？比如从议员的角度，或者干脆从“早餐派”的角度来看。

●以往来说，我们辛苦好多，即体力上和组织上都辛苦好多。以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做协调工作，但做出的结果，如我们的投票，对一件事和政府如何走中间的位，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是有直接的起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公积金，政府都走向贴近“早餐派”的路线，最后得到议员的支持通过。

○大家不是很惊奇吗？

●是呀！很多人看报纸都会觉得惊奇：为什么政府会得到这么多独立派人士的全力支持？如刚刚通过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只不过走的路线和我们接近而已，事实一早就和我们有很好的沟通。我们做的事虽然辛苦，但有直接的影响。现在就少了这些政治磋商，从某一程度来说，反而轻松了，说完就算，等于说了就听天由命。

○真有这么悲观？

●现在真真正正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我们已做不到了；所有政党也做不到了。基本上没有那种讨价还价的场面，差不多没有了那种精神。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做的事少了，但是凭良心讲一句，从政的人宁愿辛苦些做出一个实质的结果来，也不想偷懒，宁愿再难些给我做。现在我们是有点气馁，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做不了事。

○就是说并不是温和派，而是中间派也有些气馁？

●绝对有！（很肯定）我可以代表很多议员这么说，甚至我可以告诉你：气馁、觉得少少不服气，这些词不是我用的，我是借用其他同事的字眼告诉你。

○比方说，六十人当中，有几成人气馁？

●绝大多数！（全不用思索，冲口而出！）

○这种气馁来自何方？

●没法与政府商量、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时
员团

做了事后，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得不到比较明确的认同。

○（心想：一古脑地吐出，看来与政府“积怨”已久。）是不是（政府）样样事都模棱两可？

●不是，大多数是有“弹”（批评）无赞，而对政界的人“弹”多过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进行探讨？

●也反映了行政架构对最近的风波遭受较多负面批评，你问我这现象，我对自己都失去了基本信心。

○自己对自己没信心？

●是呀！我该这么说：失去了安全感，好想极力争取市民的认同。工作过程中，我也承认很想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表扬一下。这在九七前是很习惯的，但表扬也要有正面的功绩，我不会吝惜表扬。有少少担心一些政界的人走得很前，要求同政府分享权力，政府对这点有好大的抗拒，他们是过分了少少，市民也不认同这观点。在适当时机做了好事，应该有正面的认同，本无可厚非，但很不幸，最近天灾人祸不断，政府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永远向前看

○造成这样的局面会不会没了斗志？

●对从政人士来说，斗志是任何时候都旺盛，我做了八年议员，也经历过气馁，但没有现在这般长期，我们永远向前看。

○是不是真心话？

●是真心话，我在香港从事经济活动二十几年，经过多少上落，如果没有毅力，跟本就不能站在这个圈子里，你觉不觉得我有压力？（我摇摇头）还有一条，我们“早餐派”议员也不是有什么政治野心，我们是很实事求是的人，大家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大家希望争取改善环境。

○上一次的访问，我觉得你们这班“中间派”好积极，现在却有些颓丧，如果连你们都这样，我觉得事态有点严重了，是不是？

●是有少少气氛不同，不怕！我们是向前望的。

爱之深责之深

○就不想一些办法去解决？

●我想，向政府问责，监察政府是我们的基本天职，这是不可改变的。但在尽力履行这个天职时，我们也不需经常作为反对派，事实上，我们支持政府的时间，同质疑政府的时间，至多是一半对一半。

○自己有没有一点顾虑呢？

●没有！

○以前是港英政府，作为中国人，是中间派也好，你愿意怎么批评都可以，但现在是在特区政府，就算不顾及中国政府，现在是香港人自己的政府，又是你有份选出来的，你打算怎么做？

●越爱这个政府，越应该……

○（见他思索良久，我接上去）爱之深，责之深。

●对！爱之深，责之深。我绝对相信我就算好爱这个政府和国家，我也不会不出声。

○我想你绝不想因为爱这个政府而去忍受，或忍口、忍你的言论。

●我会给多少少机会，或给多一些机会，让它表现、让它调校工作，如仍不见效的话，我们一样会评论。我接触国内的工作多了，我发现在国内也一样，越是爱国的人士，越肯讲话。

○是喜欢它才批评它，否则懒得理它。

●当然啦！即使在公开的问责中，也讲道理，我们不挖
员圆

苦、不哗众取宠，也不会用攻击人格的字眼。我们很少对人，而是对事，对整体的环境，我们保持这个角色，不会因为回归、改变了最顶层的领导，就改变了我们从政需履行责任的心态。

○主观上仍然绝对不会这样想，但客观上呢？

●会的，不奇怪，我承认从政之人很注重政绩，很注重是否由始至终都贯彻一种理念。从政者不怕别人批评，只怕没有口去解释、最怕没有机会继续表现。如继续有机会表现，始终会令人理解为一个政客的性格和操守是怎样的，这很重要。

○机会呢？怎么看？

●最重要是有机会让我继续去做，我自己好有把握，大家都理解，作为“早餐派”我们所勾划的不偏不倚，在履行职责之余、爱惜特区政府之余，仍要尽力问责。它做得对，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支持。

○其他人的支持度怎样？

●我始终觉得这条路走了这么久，在政界仍得到好多议员的支持。很简单，如果我们这种问政的角色是行错路的话，首先，我觉得传媒，也是监察我们的，不会对我们的言论那么重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议员选择继续；不断有新议员很感兴趣，选择“早餐派”这种问政方式，与我們一起去扮演角色。通过了传媒作为第三监察者的考试；通过了从政者选择我们合作的考试；亦通过了与其他政党合作，党派之间互信的考试。政党也掌握了我们的行事作风，人家都很清晰。

○你个人的看法？

●你问我？我说，无论如何，有一个这样的政团组织，好过让议员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发挥不了身为议员应有的力量。这种功效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空间，只要有独立议员，就有这样的空间。

漫漫从政长路

○两年前与你的谈话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却听到这样一番话，你自己怎样去调整？

●随着香港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刚才我说已通过几个考试，这些考试基本上多是来自外人的，要真正用比较专业、肯办事的标准；少用政治姿态、政治色彩；继续能自成风格。最后要通过考试，就是要通过选举，这是大势所趋。

○你所讲的选举是直选？

●是直选，始终要通过这个考试，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你问我现在去考试的话，真觉得不容易，不容易过关，但始终要试，除已当选的以外，我觉得会有“早餐派”的议员去试。我觉得好多议员始终慢慢都要建立民众基础作为依归。当然我并不希望样样事情都是群众说对就对，我不赞成做那种唯唯诺诺的议员，要有自己的意见、特色、风格。始终我们应朝着争取更多民众支持的方向走，不是各走极端，我要做的是多对政府进谏。这也是你问我的如何调整，但去到底，这种政治取向，个别议员不会过关，是漫长的路。

○对六十个议员来说，应该不是个别的。

●这个空间有多大，多少人会成功？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和经验，但这是从政者惟一的方向，始终要向这个方向走，真是路途漫长啊！

○以前的选举你觉得它不完美，但现在这样的选举，你又会觉得是另一种不完美。

●我们经历过几种选举方式，次次出来的效果，即使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怎么改也会出现一些控制不到、令人遗憾的事。但一到选举的时候真是各尽所能，完全非理性，会出现一些

意外；而人们也会比较实事求是，作最后的选择。不过大家有实际经验后，将来的选举制度会日趋完善。

香港不需要那么多政党

○不群不党行中间，还有什么话题呢？

●老实对你说，事实上很多朋友，甚至乎鼓励和劝我，希望我们组成政党，但我不想，觉得无论在时间、时机上都不是时候。

○你们的活动局限在立法会。

●是局限在立法会，但现在组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时机。

○将来有没有机会？

●如你所讲的漫漫长路。外界对我们好留意，我是知道的，我觉得好多政党在尝试不同的空间，应该给足机会所有正在尝试的人。

○你怎么看目前香港的政党？

●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不少人踊跃走不同的政党路线，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有七八个党，走七八种不同路线，我认为太多了，香港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有功能组别的存在，可以轻松一些、客观一些，也要配合现在实际的政制环境，发挥一定的力量。我注重基础要从低做起，不是一步要上天。

○对你们来说，不能再从低做起了。

●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急，但始终要有人行过好多不同的路线。

○香港不需要这么多政党，假如以所谓的左中右来分，有三几个已经够了。

●反而无党变成一个特色，无党无派未必是一个负担，但无党无派的人一定要有自己很好的知名度，和一个比较明确的、鲜

明的形象。但在香港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一定要自然，不可同自己的性格相距很远，而一旦建立了之后，如果一站出来就站不住，或者是负面的话，水都洗不清，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这次机会你便要好好利用。哪怕你平时做了很多事，平时有好多机会，但那个机会你只有一次。

○你怎么样？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什么环境下，会掌握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如有，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不想组党，若行错了路，翻不了身，我们会比较小心，利用这一个机会。

○非常多谢你！

●谢谢！

1985年 10月 16日于香港

成绶三：

许多年来，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我都一直铭记着一句也许称不上名言的名言：逆境也是人生的一种磨炼，要善于把错误和挫折变为财富。

学而后知不足， 行而后知更不足

成绶三小传

员源年 苑月 源日生于家乡江苏省兴化县（现为市）。

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员缘年 苑月于南京三中高中毕业。

员缘年 怨月至 员远年 苑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就读；大学毕业后于本校继续攻读英语系研究生，至 员远年 苑月。

员远年 怨月至 员愿年 圆月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任科员、三等秘书（以下简称“三秘”、“二秘”等）；员愿年 猿月至 员愿年 源月派往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任二秘；员愿年 源月至 员园年 猿月回外交部，任台湾事务办公室副处长、一秘；员园年 远月至 员园年 远月派往中国驻美大使馆任一秘；员园年 愿月至 员园年 怨月，回外交部任港澳事务办公室处长、副主任。

1985年 1月，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85年 1月调来香港，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从小，外交部于我，是个神秘莫测的神圣殿堂。

我想：怎样才能得偿所愿，迈进向往已久的外交部大门，采访共和国的外交官呢？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偶然中认识一位热心人——成绶三先生。在他的热情帮助下，我很快如愿。终于迈进了神秘的大门，采访了外交部的外交官王桂生与张宏喜两位先生。

有幸采访外交官

待我欲采访他时，他却一拖再拖，显得颇为难，原来：“外交部像我这样的外交官实在太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外交官。我这个人没什么值得写的。”

当然最终经不起本记者的左磨右磨，大家坐下来长谈两次，后来还有幸被邀请上他于北京的外交官员宿舍，见到他的夫人和儿女。

可能与普通百姓相比，外交部的宿舍已算很好，可与我见过的南方沿海城市同级干部比较，他们的居所就显得朴素、简单多了。

记得曾听外交部官员打趣说：若外交部的官员三年不外派，就得“扶贫”了。

我曾多次感慨万端，外交部过去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后来至钱其琛副总理入主后，仍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尤其钱其琛任部长时的清廉故事，我从外交部普普通通工作人员中听得可多

了。

现在，我在外交部大楼、在外交官们的家里看到了，我打心眼里钦佩他们，我多次赞叹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素质之高，确实是从共和国精英中挑选。

他多次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不是赶上香港回归，不是历史机遇和特殊的工作，使我有幸成为筹委会委员，我根本不会成为你的采访对象。”谢天谢地我真怕他又临时不愿接受采访。

但他说的是实情，若他不是筹委会委员，我没机会认识他，也没机会通过他认识了外交部的其他官员，并与他们交朋友，我很庆幸有机遇认识了外交部的朋友。

出乎意料的竟是他一口气为我拟就了三个采访题目，并很高兴地让我挑，这对当时与他尚无深交的我来说，确有帮助，否则采访题目无从问起。哈哈！连访问题目也为我拟好的专访名人中，我想就他一人。

从与他断断续续的多次接触中，我挑中了本文之标题《学而后知不足，行而后知更不足》。

他性格活跃、思路敏捷、兴趣广泛，尤其钟爱书。

然而在言谈中他却坦言：“看了这么多书，却有许多遗憾与不足。”

书到用时方觉少

他对我，曾有一段颇为有趣、精彩的表白：“我爱好非常广泛：首先，是喜欢书，虽称不上博览群书，但看的书很不少。在读大学的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的上、下午全都‘泡’在阅览室里，浏览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摘录了不少卡片，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

“我很喜欢唐诗、宋词。”请继续听他的表白：“我很喜欢鲁
员园

迅（的书）；也很喜欢英、美文学，特别是名诗，至今还能背得出英国诗人华兹沃斯的《孤独的割麦者》；我还喜欢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和我国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但每每一提笔，总是感到缺乏文采。至今有时虽然也给报刊写写文章，但未能自如地旁证博引，因此到目前都没有一篇文章能令自己满意。”

除却书，他称自己也可以说是个音乐迷、球迷、集邮迷……说至这些，他可以津津乐道地说出一大串 悦 阅音乐碟的名称，歌星、球星的名字，以及集邮的众多乐趣，等等、等等。且听成绶三先生的自我评价：“我是杂而不精、博而不深。”再进一步的解释是：“我的爱好的确广泛，但自己总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还是关于书，特别是近年来，内地出了好多好多新书、好书，自己紧赶、慢赶，还是有很多没来得及看，工作起来自然就觉得功底不深厚了。”

成绶三先生的广泛爱好，反映了外交官丰富多采的人生，他们除了外界常见的严肃的工作、刻板的外交语言外，还有多姿多采的、很普通人的另一面生活。不过他的广泛爱好，没有充沛的精力也难对付，而实际中，他也确实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青”，未必胜于蓝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人生路，成绶三先生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永远忘不了一些人，他们在我人生每个阶段扶持过我、关心过我、培养过我，有我的师长、上司和朋友、同事。”

很记得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由南京三中的校长兼任，“他几乎决定了我的外交生涯。”成绶三回忆道：“是他推荐我到北京外语学院深造，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外交部。记得从前他在我的作文本上不止一次用红笔，洋洋洒洒写下好几篇评语，有的评语根本与我的作文一样长，每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那不单

是对我作文的评价，而实际上是为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范文，从文章的结构、段落、内容到文采，都值得我学习。他其中一些文章，用非常生动和亲切的语言，告诫我在那个岁月里，需很好地决定自己的人生路向。”

成先生对书的兴趣和爱好，也该得益于中学这位语文老师。

王佐良、许国章、周珏良、张冠林等，堪称我国一流的英语教师，他们中有的优秀翻译家、有的是语言专家。在北京外语学院，成绶三有幸成了他们的学生，并在这些优秀教师的培养下，学会了英文。他说：“从学院毕业后，我碰到好些外国人，他们经常会问我在哪儿留学。”“每次，我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在北京由中国老师教的。”

见他说得颇自豪，却又听他感叹：“但到用时却恨少，很遗憾达不到老师的水平，更谈不上超过老师。”我表示怀疑：“真的？是这回事吗？”他答得很认真：“确实如此！”我再问：“你不是读过研究生吗？”他笑称：“‘青’出于蓝，而未胜于蓝嘛！”

1956年分配到外交部，很快便爆发文化大革命，成绶三对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自嘲：“文革初期‘在大海里学游泳’，‘喝’过几口水。”我品出他在文革中受了些挫折。他说：“打倒‘四人帮’后，中央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我非常庆幸的是，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亲自关怀，使我在‘五七干校’待了多年后，又能回到工作岗位，让我这个当翻译的外交官，又有机会全身心重新投入调研工作。但我始终觉得老同事、老领导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以至各不相同的调查研究方法，使我至今受益。”

人生三个难忘的阶段，颇有刻骨铭心之感，他由衷地、坦诚地告诉我：“没有我说的这些人，就没有我的今天！”发自肺腑！

逆境中磨炼人生

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十多年，在内地，上了年纪的许多人都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于个人而言，文革及文革中的许多事，是刻骨铭心的，成绶三先生也不例外。

文革初期，成绶三刚从大学出来不久，年轻人革命热情高涨，参加了造反派。结果受到审查，他记得一位当时的专案组负责人在个别谈话中，曾真诚地对他说：“只要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以后几十年还可以好好工作嘛！”现在回忆这带启发性的话语，他动情地说：“这番话，令我永生永世忘不了！文革初期，我虽然受到挫折，但因为有这样的同志真心关心着我，才使我从未对生活 and 前途丧失信心。许多年来，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我一直铭记着一句也许称不上名言的名言：逆境也是人生的一种磨炼，要善于把错误和挫折变为财富。”

回顾文革，虽然受到很不正常的对待，但他认为：“在‘五七干校’度过的几年，等于又读了一次大学。”他总结，有以下的收获：

一，有的是时间，可冷静反思“文革”中的种种：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可反思国家的形势和前途，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

二，身为一个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有机会经历放牛、养猪、种菜、割稻、采茶等劳动，被他称为“过了一段田园般、自得其乐的生活”；

三，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有了了解；

四，由于周恩来总理要求所有到“五七干校”的外语干部“外语不能丢”。因此使“我这个不断受批评、做检查的人敢于有

条件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英华大字典》，同时通读了一遍《二十世纪英国诗文选》。”

四点收获颇“意外”，相信是他充分利用时间的结果，其实许多人在埋怨文革的同时，亦让时间白白流逝。而苦心通读字典，曾听人说过，听他自己说，全是真实故事，在那看不见明天是什么日子的年代，苦读字典非常人可为之。

外交官在世界

成绶三先生曾被国家派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尼日利亚和美国任外交官。前者属发展中国家；后者为超级大国。而两者又给了他截然不同的感受，令他至今难忘。

在尼日利亚，成绶三切身感受到新中国外交官在国外所享有的友情和尊重，同时交了许许多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他说：“他们的淳朴、坦诚，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美国的发达、富有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感受到的事实却难以置信：首都华盛顿，满街都能看到无家可归者和满街众多伸手乞讨的人；令他惊讶的是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他说：“我很喜欢与美国人聊天，走到哪里都爱与不同的美国人聊天和讨论问题。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但我发现，不少爱向中国大发议论的政界人士、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报纸编辑，竟然从没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很贫乏，真不可思议。因此，中美之间实在需要加强交流、沟通和理解。”

一国两制全新课题

在外交部港澳办工作时，成绶三主要从事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涉及香港的工作。

他认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碰到大量前所未有的、找不到先例和现成答案的问题。他说：“而这些问题靠一个人的苦思冥想，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经常要与周围的同事及有关各部门共同磋商、研究，尽一切努力，使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变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凡是自己经手涉及香港事务的请示、公文，呈送给部一级或更高一级的领导后，他们每作一处修改，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外交部的工作严谨，使他受到严格的训练，他说：“在如何不折不扣地落实‘一国两制’方面，确实感受中央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我们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使工作体现‘一国两制’，但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解、至具体化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常常感到力所不逮。由此，需要我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严格请示报告，听取中央领导的指示。”

成绶三的感觉是直接的，中央对香港工作的气息、感受对他也是直接的，他感慨地说：“在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遇到香港问题，在工作实践中，方知学而后知不足，行而后知更不足。”

学海无涯任重道远

随着九七的来临，与回归有关的工作越加紧迫，而香港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形势迫人，成绶三在努力学习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同时，又抓紧阅读了更多与香港有关的著作和各种文献。在此基础上，自1989年底至1992年7月的几年间，成绶三应外交部内各部门、北京许多大专院校、中央机关、社会团体等的邀请，同时趁去国外出差的机会，到我国驻美国、泰国使馆及驻日内瓦代表团，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的伟大实践》为题，

前后作了四十多场讲座。

对他来说，每讲一次，自己都能受到一次教育，也都能得到一次提高。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九十年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说：“我每去一所大学，学校礼堂或大教室里几乎都座无虚席，常有不少同学站在后面的走廊上，甚至坐在窗台上。全场或是鸦雀无声，或是不时响起笑声、掌声。期间还不断有同学递上纸条提出各种各样与香港有关的问题，其中许多很有水平，说明大学生们对香港问题跟踪得很紧，更表明他们对香港回归的关心。”

每每讲完后，还有不少同学围着他提问，直到学校团委、学生会的负责人来劝，学生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他今天说：“这样的场面更激励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97年 7月 1日，成绶三亲眼目睹了香港回归祖国那一历史性时刻，那一时刻被他称之为：“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日子。

两个多月后，他被派来香港工作，任中央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他认为：“搞了那么多年香港工作，现在能身临其境，更直接地感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际运作。而且通过广交朋友，更直接、深入地了解香港的方方面面，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他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目标、新要求。

工作环境转变了，他清楚地知道：“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还有很多工作等待着我去做。”

是啊！学海无涯，任重道远！

1997年 7月 1日于香港

王英伟：

我的性格很希望求新、求变，虽然在政府做事，我也不断创新。因为政府的训练，很多事会考虑得透彻些，考虑许多事时想得比较远，我未行第一步，已考虑第三步、第四步了，再想想，如果第四步是这样，眼前的第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不觉得这就是循规蹈矩，只是我们做事的组织能力，和思考问题的逻辑性强些而已。

求变 求新 走出新天地

王英伟小传

1954年生于香港，籍贯福建省厦门市。

在香港读小学、中学。

197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文凭，并获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学士文凭。

197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80年再赴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公共行政课程，获硕士学位。

1981年至 1985年服务于香港政府政务官职系，先后出掌多项要职，历任副公务员事务司、工业署副署长、首席助理经济司等职。

1985年离开政府加入嘉华集团任职副行政总裁。

1989年联同香港和英美著名金融及商业机构，创办中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内地基础建设、零售及工业等项目。

1993年至 1995年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

员；

1984年获中国政府委任为港事顾问，1985年缘月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1986年元月任筹委会委员。

1987年 10月获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香港工商专业联合会主席、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香港前高级公务员协会创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副理事长等。

甫见面说的全是他的生意，似乎在商场干得挺欢。

1987年初，我们筹委会秘书处几位同事在北京开完会后，应邀到天津参加其大桥通车典礼，我挺纳闷：一个香港人，大老远的跑到天津去开发，所为何事？

因为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如何经商，而是为何辞去如日中天的政府高职，下海经商去也。

今年也不过四十六岁，已过去六年多，今天仍是旧事重提。

提出一大堆问题

我说明来意，一口气便提了几个问题：

你原是港府高官，整整在政府服务了十六七年，（他说：是！）你在 1984年一下子离开了，一则听闻你云集了部分原港府高官；（他笑了：也不是，一部分吧！哈哈！）

二则无论如何要问你，你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中国的套话：正当前途一片光明，年纪轻轻为何要离开？我当然想问问你是否政治原因？现在回归了，可能可以聊聊。你当然可以说自己想当老板，但我真是想知道你为何要离开，我想听你自己的心里话；

第三个问题，你现在做了四年半的老板，过足（瘾）没有？做老板的成效如何？虽然大家有眼看，但我想听你自己说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个问题，目前香港已回归祖国，有否想过再回政府架构，回到回归后之公务员队伍？你说想，或者不想，为什么？

还想问问你的兴趣、爱好，从小养成的一些习惯呀！家庭影响或自己炼就的品格、习性等，什么都可以谈。好吗？

“好！”面对我的一大堆问题，他很干脆。

事后我笑自己，怎么一见面便一古脑地把所提问题全“倒”出来，以前从没有过。

看好中国的发展

公司以“中国”命名，公司标记只以“精英（中国）”为记。王英伟介绍：“我们公司其实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是我于1989年创立的。”

“当时我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并看到将来进展会非常地快。”自己创办的公司，倾注了许多心血，话题一拉开，偏离了我的提问，他首先说的是生意：“同时当时发现有个概念比较新，许多投资的基金买公司的股票，投资中国内地的许多公司，一是买有投资中国内地事业的香港公司股票，二是买国内公司的月股。而许多所谓中国投资基金，要么由外国人主理，投资经理全是外国人，如美国基金、英国基金等。另外一些则国内的人主理。”

“我感到投资国内既要懂得国际社会对商业上的要求，又要懂得国内最新情况，同时掌握国内最新发展和应付国内的其他情况。所以我觉得以我自己条件，我在香港长大，与国内有这么多年的交往经验，包括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开始叙述在中

国投资的心得，我问：“当时你还在港府哦？”他说：“是呀！我是惟一被邀请的港府的官员。”我告诉他：所以这次我看见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感到很开心。他连声：“谢谢！”

“所以当时我说，看看可否找一些朋友，有无兴趣把一些资金聚集，然后在国内找些好的项目投资。既可发挥香港的功能，使香港成为外国进入国内的一个跳板；亦可以让国内把香港作为一个窗口，以发挥自身功能，可以真正参加国内的经济的发展。

全是能收钱项目

“这间公司的股东很多，其中包括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先生、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美国基金会、廖创兴银行家族等都是我们的股东，也全是我好朋友，当时我一说要开公司，他们一呼百应。”合作伙伴对他很重要，说起来很高兴：“当时许多人不知道，以为王英伟是搞一间投资公司，认为我从政府出来没什么钱。”你是否最大股东？“不，我们是用股份制，股东完全不参与，全由我来负责，比如李兆基先生从来不参加我们公司的业务。”

“其实我们公司目前主要是从事三方面的投资：一方面是基础建设的经营权，比如杭州钱塘江三桥，我们买了三十年的经营权。”我说：你们想得好远呀！知否现在广州至番禺的洛溪大桥是坐在那里收钱，还收不及，现在第二座桥已快通车。他说：“是的，我们也想搞成这样。这方面的投资现在比较大，每个项目都是好几个亿的投资。另外我们在宁波奉化，蒋介石的故居，买了五十多公里公路，这些也是较大的投资。天津也有两条收费桥梁，已经完成了，全是正在收钱的项目，全部经营期限为二十年至三十年。”

“哈哈！”我笑他今后的二三十年就算不做事也有钱赚，他很

开心：“就算是这样想吧！哈哈哈哈！”我说：“那我的第五个问题（即会否重回公务员队伍）岂不不该问了！”哈哈！他说：“我们现在正继续看着其他一些项目。”

“虽说国家说会增加一两千亿发展基建，但事实上这一两千亿分配到这么大一个国家，仍然很难满足，有好多地方是需要资金的。有些不是那么优先的项目，尤其是一些已起好的项目，可以转让给我，他就可以拿到钱去做更加需要的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因为国家现在大部分做法是支持一些高速公路等大型基建，好多地方性的，比如宁波那条路，他们已建好，钱‘扎住’（积压）在那里，又欠银行很多钱，所以我去到等于为他松了绑，我把经营权接了过来。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机会。”

“第二是做零售，做综合超级市场，就是现在国内很时兴的大型综合商场，现在我们是与内贸部属下的中商集团与日本一间上市百货公司合资搞，有两个场，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取名‘百汇’。武汉的刚开张，开幕当天连剪彩都没办法，因为人太多，‘逼爆晒’，那天来我们场的就超过十万人，很厉害。商场以走大众所需路线为主。”现在国内生活水平提高，群众购买力日强，又是日常必需品，潜力颇大。

“但我们国内这些场与其他市场的区别，在于新鲜食品的加工全是引进日本那套，我们每天早上根本就是买生猪、生牛回来分割，再分为一包一包、一片一片，就在现场用玻璃窗让顾客看见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切的。说来好笑，武汉第一天开场时，我们订了七只猪，不到下午三点便卖完；第二天我订十五只猪，不到七点也全部买完；到了第三天，因是礼拜一，我们只订了十只猪，又是一到下午全部卖完。”

“顾客反映我们的货品干净，价钱比街市便宜。”为什么？“因为我成只买，不浪费，上肉切开，下肉另一种价钱。街市没冷气，加上我们是按广东人的习惯把猪拆开来卖。现今在武汉，

似乎是我们第一家这样做。”但中国人跟风很快，他蛮有信心：“不怕！我经常觉得如果做出的事有人跟，表明做对了，大家做，不要紧，因为我们最后的宗旨是大家比拼，不是价钱，而是环境与服务的比拼。”

“我们的员工全是日式训练。”他说得很开心：“比如第一日有许多问题出现，我们的员工样样事情先‘对不起’。我们的宗旨是与居民打成一片；二是不收入场费，即不收会员费。很多大商场收会员卡，我们不收，因为任何人都是我的顾客，任何人都我的朋友。现在刚刚开始，我们计划一直选中国一些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继续开这类大型综合商场。”

“第三样行业是我选的食品制造业。”他说：“目前在香港主力只是蒸馏水，已在香港经营十五六年了，但一直好低调，最近大力催谷，在广州和南京都有设厂生产，希望变为国内的一个品牌。但几方面以投资比例来说，仍以基建为最多，因为其投资好大，建一条路可能已是几亿了。商场投资也相当大，因为除装修的场之外，还有许多货品。”

原港府高官云集

听闻王英伟离开港英政府时，一班港府高官也跟随他出来帮手；更有传媒云：“王英伟手下高官之多，在香港除了港督和布政司外，可能已是无出其右了。”

我很感兴趣：“你的工作是否需要原高官帮手？”他说：“不是！全部找懂行的人帮手，或合资，找国外专家。如日本，过往的一年，我长时间有二十几个日本人帮我手做事，所以我们的成本好贵，他把日本的技术、制度、电脑系统等全部引进。说实话，我们很薄利的，赚的钱很微，如电脑系统管得不好，一损耗多就蚀本，一定要靠人家很先进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找懂行

的。”

高官呢？“有几个在总部帮我手。”我们切入主题，他介绍：“他们在这间控股公司做事，比如我的高级副总裁就是其中一位。”高级副总裁是谁？“是以前政府、即港英时候的一名政务官，我们在港府不同的岗位中，他差不多跟了我七八年。”以前你手下最高级是他？“是，是！他以前在港府的最后职位是：香港政府派驻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的代表，相当于助理工业署长的职位，很年轻；另外如我派驻英国的代表，是港英时期派驻欧洲的投资署署长；我派驻美国的代表，就是以前香港政府派驻北美的投资署署长。”

“哈哈！”听得我直笑，问：“他们全是被你‘挖’过来的？未到退休吧？”他忙说：“未到退休，他们中有一个英国人，有一个是贾施雅法官的儿子，他们两人都未到退休年龄。因为他们当时在工业署、在政务官时与我是同事，也都跟了我一段时间。1999年我创业，2002年之后他们相继来到。”他们的年龄岂不与你相仿？“驻外的两个大些，高级副总裁最小，现在只有四十一岁。”

“成班人当时想着退出政府。”他说：“因为外面那两位不是中国血统，考虑在特区政府工作再往上升已没什么机会了，知道我在外面搞了公司，即来找我，愿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做事。”

志同道合一班人

“我们现在全以好朋友的方式工作。”王英伟与合作伙伴自有一套工作方法：“有需要他们在那边做时，全以电脑联络；而我们每次到欧美，他们已把行程全编排好，全由他们负责；而平时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也允许他们做自己的事情。”

这是一种很松动的安排，便于他们利用时间和自由发挥。他

员源

说：“比如贾施雅的儿子，现在荷里活做制片。他拍片子很忙时，我就减少他工作；等他制片工作完成后，我到美国，他又跟着我跑。我们就是以此种形式工作、合作。”刚才介绍的三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问：“你们是属于志同道合那种吧！”他同意：“可以这么说。”是在港府里已志同道合？“我们大家处事比较认真、肯去拼搏，完全不计较工作时间。比如我这个高级副总裁，过去我们在工业署时，两人总是最迟下班，我经常是很迟下班的，因此大家知道对方的工作方式，比较能合得来。在其他国家的一些代表，在我手下做事时，比较明快、爽快，他们也比较接受我。”

政府机关与商场毕竟不同，最大区别是什么？“我想最大的区别是市场千变万化，在政府里，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职务指南，做任何事在部门的范围内都有迹可查。我们自己安排工作，通常较有组织性。而在私人机构，就比较千变万化，说不定今天这项好，明天就不行。我们要掌握信息、反应比以前敏锐好多。”

“第二，我们在政府做事从来不用忧虑某一事情是否做得成功，但求无愧于心，我做完就行了，就算做得不好，也是一个集体的决定。今天我在私人机构，我们几个若做错事，可能会引致公司的损失，若严重的话，公司会倒闭，所以责任制是相当的明显。我们在私人机构里就算有少少的不同，有时是要讲反应的。政府讲集体制，比如很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出现，我们会找几个部门一起商量，大家一起研究对策，再分析不同角度。但在私人机构，很可能三两分钟你就要做出决定，这是最大的分别。”

在政府打工时，比较合得来，现在呢？“现在一样。”听口气，他颇满意：“我的公司成立差不多五年，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证明大家合作无间，当然过程中我们有起有落，大家也有个适应的过程，有平淡时刻，也有高潮的时刻，但我想，由开始到

现在我们这班人还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你现在是公司总裁，做起事来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与以前比较，如何？“当然压力感与以前有不同。”我接过他的话问：“完全不同？”他说：“不同！我们以前但求无愧于心，做自己的份内事，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下面配合得不好时，可能对公司造成一些财政上的损失，甚至乎威胁公司的继续发展、生存，压力会大好多。”

“但因我们处事手法比较自如，在政府做过，天生比较保守。”哈哈！我问：真的？他说：“我承认政府工作人员再做生意会比较保守，我为什么会做基础建设呢？比较保守些嘛！哈！保险得多、稳当得多嘛！又这么巧，让我找对了一条路，倘若我现在横冲直撞，可能这段时间经济低迷时我会受好大影响。如果我‘炒楼’、‘炒股票’现在就‘唔掂’（不行）。”

他看准中国市场

我赞他能看准国内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人回去赚钱，但一定要看得准，而这准需超前少少，不要超前太多，太多了，脱离国内的社会，不容易被接受，是赚不到钱的，我说的是：“超前少少，带领潮流，就有得做了。”可能是纸上谈兵。但他说：“其实我们的宗旨好简单，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都要找中国、都看准中国市场，要走得对不容易，如果我进去做些来料加工很没意思，即是我把低廉的生产基地搬回中国，但没占领到市场。现在既已回归了，又是中国的一分子，我为何不去做这件事呢？而且这些事对国家的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三角债’，我做的生意全是收现金，只有我欠别人的钱。这也使我减少头痛。”虽短短的五年，他之生意经已头头是道：“你知道，很多企业在国内做得很好，但他收不

回钱，如超级市场，我每日做一百万，就是现金一百万，我每天来收两次钱。”天天如是？“武汉商场刚开张那几天，每天超过一百万，‘现兜兜’，我看见他们数钱，那收银机根本关不拢，刚开业当然会好些。”

我曾参加过他天津公路大桥的开通仪式，看出他的胆色，够胆去做。他说：“但我们现在钱赚得最好是天津，那里的回报比一般高。我现在已经有两条路了，你上次看的是第一条，我的第二条已建好，正在收钱；第三条正在建，全在天津。我是第一个与他们合资公路的，所以现在天津市政府开什么大会，就以我为例子。”我问他是否荣誉市民，他说：“不是！我是顾问。往后比较大型的项目，比如杭州、宁波便是吸收了天津的经验。现在还有几个项目，如山东等地，我们正“倾梗”（正在洽谈），已签初步协议。”

合作无间打天下

一起打天下五年，王英伟今天感到一份满足：“现合作下来，我们发现，政府出来的这批同事自有他们的长处：第一，组织性强，我们商量什么事情，书信来往、表达自己的能力都是很强的，这一点在许多商业机构是不行的，但我们很好，所以我们事前研究功夫做得很足。”

“第二，我们天生比较保守，所以我们不冒进，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未必有人家快，或者没几倍的增长，但起码我没有倒闭的危险。因为外国的经验，超过八成的新公司在第二年是倒闭的，它顶不住。但凡开新公司的第一年，人人都有注入资金，又想得很辉煌、很好，怎知市场千变万化，你根本到第二年是‘顶唔顺’的，很多顾问公司、咨询公司，其实名存实亡，只有一个牌在那里，做不成生意。我们可以发展到现在的第五年，不断有

新的项目加入，自己觉得有发展。”

王英伟还感到：“中国的水质越来越差，现在中国人饮水习惯改了，以前没人买一瓶水来喝，现在满街都是。第三，这类产品是长春的产品，我做任何工业都可以有人替代，只有水是没人可替代的，当时明知竞争好激烈，但如果基础打好了，这个行业是个长远的发展。总之我做生意全部是想着比较长远的计划。同时研究问题会从多角度考虑，因湿从政府出来的人，在研究问题时，好多时候会从多角度去分析。这几方面对我都很有用。”

有长远计划，稳中求发展，最初可能是公务员生涯之习惯使然，但他却从实际操作中求得稳健的发展。

政府给予很多机会

“为什么要离开港府？”是我此次走访之主题，他说：“离开港府的问题，我讲出来许多人都不会相信。”此说更有意思，我说：“既没人会信，请讲真话，以视正听。”

“我真是想，真是想离开港府！做的时间太长了。”我暗自偷笑，瞧他加重语气，连说两遍，以求人相信的神态，能说不信吗？我说：“你才那么‘后生’（年轻），离开时不足四十。”“离开时我已做了十七年。”他说：“因为我一毕业就做政府工，没做过第二份工作，我一入行就做政务官，做了十七年。你也知道，我做过副公务员事务司、工业署副署长等。”

从大学出来后的王英伟，走了许多路，而每走一步，都走出一片新天地，为他的人生增添更多姿多采的演绎。

在政府：是首席助理经济司、副铨叙司、工业署副署长；中国政府委任：有港事顾问、预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推选委员会委员；职位方面：是嘉华集团副总裁；最新动态：全国人大代表……有几本杂志更封他为“明日之星”。

不看将来，只看过去和现在，他已够夺目。

“事实上我不是不喜欢在政府做。”自始至终，他对在政府工作的一段时间也是给予客观、肯定的评价：“我觉得政府已给我许多机会，也给予我很多栽培，在职期间，政府前后保送我到英国牛津、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这些名牌大学全由政府保送？他答得很肯定：“是，全部政府保送！”

真有他的！他也坦诚地说：“政府待我是很不错。”简直可以说：“待你不薄。”他也承认：“是待我不薄。而且我走时是不准我走的，即不想我走。说：你不要走吧！你的走可能会影响好大。因为当时我是第一个走，那时陈祖泽、杨启彦先生都未走。”我说：他们走也许是年长一些嘛！

为了迎接新挑战

“我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他细说因由：“如果我今天不走，我可能还要做二十年，六十岁才退休。再多做二十年公务员的生涯，我自问：我到底还想不想走？我在政府工作转换的机会很多，所以政府的一套运作我基本上很了解，我怕再做二十年我会觉得不够挑战。”

真为了挑战？“是呀，是呀！”他说：“我牺牲很多的。”我说：“你这么成功，牺牲了什么？”他解释：“因为我不是退休，是辞职，所以我没有长俸，我要五十五岁才开始有钱拿（指政府给退休公务员的那笔退休金），我与退休公务员不同。”其实你五十五岁后可以领回嘛！他说：“但我要等，要一直等下去，等够十五年才有，现在我还得等十年。也就是说当时我一离开政府，为了生活便要立刻找事做。第二，我一离开政府，需把住着的政府宿舍立刻交还政府，那时立刻要买房子，诸如这类事情有很多。第三，你在私人机构做是没保障的，还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什么原因吸引你有那么大的勇气？他说：“我任工业署副署长时，常有机会出国外考察，与不同的跨国公司接触；做大陆工作时，又在那段时间看见内地起飞现状。我自己觉得：下世纪，亚洲起飞很快，尤其是中国。”

“我常自己想，如果我不离开政府，就算我在政府很成功，我的基地始终在香港，我不可能直接参与内地起飞的过程。”要下决心离开港府高官之优厚待遇和职位，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他考虑后，有大把理由：“但在私人机构，我可以就香港、台湾、内地三方面，看其结合的优势怎样，便怎么结合。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之有刺激性、很有吸引力。我这个人不喜欢墨守成规，我喜欢新鲜、尝试新事物、做新事情。”

以前在政府也这样？他说：“是呀！我在政府时很多时的新政策全是我订下的。”他笑说旺角的“一楼一凤”（指黄色卖淫事业中的一种）“是我带头去拆招牌的。”哈哈！他说：“以前没人拆招牌，是没人敢拆的，警察也不肯；观塘山边木屋区正式由电力公司供电，是由我去带头做的；油荒地多层私人大厦管理的改善计划也是由我想出来的……有很多新计划都由我去创新、我去做的。”

“比如在工业署时，工业及科技发展局成立是我主催的。”他说起在政府时的“威水史”（功迹）：“政府拿钱出来支持高科技项目的投资，也是我向‘财神爷’（指港府官员财政司）申请的。全部是创新、取新方向，我很喜欢做这些事。”他认为离开政府可以一展自己所长，便毅然决然选择了三十六计中最后一计：走为上计。

“你现在这么成功，当然是这么说，但当初出来时，你会想到今天的结果吗？”我的问题，他答得颇为老实：“没想过，不知道的，风险很大的。”什么挑战呀，刺激呀！你现在当然可以这么说，有些人出来都没事做。他承认：“是呀！但我自己这么想：

以我自己的能力，以我自己在社会的联系网，我不会找不到事情做。只不过是成功程度的区别而已，即可以很成功；也可以不是很成功。但很可能最后我会在一个跨国公司做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今天可以做成这样。”当时真的没想？他说：“有想！这是我的目标，但有多快可以达到，自己是不知道的。做人一定是这样，我做人的目标是希望最终自己能有一盘生意，可按自己的思路去发展，这就是我离开政府的最终目标。”

“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私人公司、私营机构很多都以政府作比较。”他说：“什么政府人员不醒目呀，你们政府官员这也不会做、那也不会做。我心想：不是呀！调转来，你也未必会做我的事，但我不信我做不了你的事，不如出来试试看。”

知道前路怎么走

“我想问问，真的没政治原因？”他很肯定：“有（没有）！”全然没政治原因？还是那句：“有！”

1985年至1986年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当时你尚在港府，我觉得对你思想是有影响，你想不认也不行。他坦诚地说：“对我思想绝对是有影响，因为我知道前面条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走呢？“这条路告诉我：我们一定要‘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实施。我一定要尽快了解和明白它将来如何在香港运作。我不会像一些人般怕了它，想移民，我没有这种恐惧，我完全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1986年在香港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我也明白，如果我留在政府一成不变的话，以后我就会在特区政府做一名官员。”我说：“但不是做一般的官员，而是高官呀！”他紧接着说：“我知道，但我现在如此这般在国内的运作，我的天地将比在特区政府大得多。你看我今天去天津、去杭州、南京，所有的市长或别的长，我都是他们的老朋友。”我无

话可说：“哈哈！那是你生意往来一定需要的。”

“是呀！”他一点也没想否认：“但如我在特区政府作一名官员就不同了，我的接触范围只是在香港。”哦！“因我觉得神州大地的确好大，我自己觉得香港……”弹丸之地？“对！我不想把自己的一生人就限制在香港。”我再一次“哦”：“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与他谈话发现他思路很敏捷，脑袋转得颇快，对话中，我的问题问得很快，很多时他像不加思索般便能很快地回答。

“直接的影响？”他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我能够透过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与很多本港的爱国人士多了接触，亦有各行各业的代表。我们过去在政府的接触面除却政府之外，就只有我自己工作的范围。但在咨询委员会就不同了，因为当时咨委会委员的组成，是由香港各行各业、各界选派代表，在那五年我全部认识了这些人，所以使我的社交圈子宽阔了许多，工程师我认识、会计师我认识、工会代表我又认识，新华社官员更加认识。使我与一般公务员的接触面有所不同，这对我影响好大。许多‘大有钱佬’我也认识，这个影响更大，各行各业都有我认识的人，这对我将来大展拳脚，找人帮手很方便、很容易。这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得益。”

“第二，当时有机会与新华社接触、与港澳办接触，对我了解中国怎么看香港、香港怎么发展，增强了我很大的信心。”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1985~~1985年，当时很多人成天唉声叹气，又叫唤着移民呀，又怕这样，又怕那样。”难道你连想都没想？“我从来想都没想，我的家人一个也没有走。”

港英时期的高官，在后过渡期，有机会在中国政府领导的架构中参与回归的工作，亲眼的目睹、亲身的感受，终能明白中国政府治港的决心与实际做法。实际上是年轻的王英伟，懂得用自己的意识去独立思考，不想再等二十年退休，而选择了弃官从

商、无官一身轻的道路，从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广泛接触、了解任何国家的任何人，直接感受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自己也在经济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

全都是机缘巧合

许多人都会问的同一问题：为何众多港府公务员，只选你一人？他说：“人的一生都是机缘巧合。香港政府于1985年成立一个民意审核处，该处只有一个很短期的任务，就是评估市民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接受与否，需写一份报告交与英国国会。当时的民意审核专员为英国人麦法诚，因他在政府做过我上司，我是第一个他带入去的助手。整个审核过程从头到尾怎么做、每一个香港居民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意见和忧虑，我全部了解、全部知道。”

“当设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时，就有人说：第一，需要一个知道如何搜集民意的人；第二，需要一个知道香港人较全面看法的人。当时就有人推荐我，说在这方面除英国人之外，就数我。”他回忆当时情形：“当时我收到邀请都好奇怪，因为这么多公务员中，我的级数不算高，是个助理署长级的公务员、还不到司级官员，但邀请了我。当时还要做特派员，我问过港府是否允许我去，因为我还要上班。最后是由当时在任港督批准后才参加的。”

“老实说，尽管如此，对我的仕途没一点影响。”他说：“但我付出很多，那五年基本上每个礼拜起码有两晚，我是五点半放工后去开会，开到七八点，每周如是，前后五年。正因为此，也得到我以上讲的两点好处，你认识许多人，人家与你很熟，个个都知道你，比如现在的工商专业联合会一班人，全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出来组成的。我为何这么快可以做主席，就是因为一班人根本上认识我。”

现尚未“过足瘾”

自己做老板，“过足瘾”未？他笑着拖长语气说：“梗艸（当然）未啦！哈哈哈哈哈！”我说：“从你一开始讲我就可以为你找出答案，但我要你自己讲。”

“现在只是一个起步。”他忽地谦虚起来：“我对自己的事业有一套想法，现在是依我思路走上轨迹了，但没到我认为最满意的那点。”你最满意是什么，能不能讲？他说：“我相信最满意是企业能‘生生不息，有自我延续的能力。’因为企业要达此目的，一定要有扎实的投资、不断的收入，令其能不断增长；第二要有一批很熟练的人，可以为企业延续生命；第三，令我们的企业能在规模大时逐步上市。”

他心中大志不减：“但现在市场不是太理想，而上市时，希望我们的公司不是太小型的。同时我们的股东本身多是上市公司，所以他们不急于上市。”我说：“但是你需要上市嘛！这就是你较满意的目的了，但上市后你又会不满意，又会为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他承认：“是呀！”

最大成效之探讨

我问：“你做了四年多的老板，你觉得最有成效是什么？”停了半晌，他问：“最有成效呀？”我换句话说，即最大的成果，他答：“最大的成果，其实是我个人在从商中不断得到的启示，以及个人的充实。”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我以什么形式去鼓励我的下属，使他们有所贡献。”虽官员出身，但管理企业的办法多箩箩：“这一点在政府就很简单，一级管一级，我认为你做得好，你为我搏
员源

命，我可以推荐你升级，否则就不能升级，在政府这一点是很大的推动力。但在私人机构就不是这样，在过往的几年，私人机构中好的人才外面抢得很厉害，现在是差些。但早几年，尤其是做中国投资的人才很吃香，我为何能留住这些人才？以我这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我又不可能如大公司般给最高的‘人工’（工资），而这班人怎么会为我去搏命？大家都知道跑中国市场是很辛苦的，我这里的职员，常回内地的，有几个患肝炎、痢疾等，什么都试过。”

“过去人手少时的礼拜六、礼拜日整天回到国内公司看着业务。”他说：“如何能令这班人肯为我搏命，肯为我做事？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在经商过程中我充实了很多，我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做一个领导人。”

从零开始，现在连国内，员工超过二千人，总部在香港，我笑他二十几名“首脑”统率了庞大市场。

对国内不断变化之商业环境，王英伟的认识越来越多，他说：“你想想，我从未做过生意，尤其是内地的生意。人家那些所谓‘中国老手’，个个做了几十年。”我接过他的话说：“有的都做至焦头烂额。”他说：“我不想说人家，但有老人家问我做得怎样，我告诉他：都韵啦。过得去吧！”

在国内经商，他觉得有“着数”（好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香港没做过生意，我一离开政府，便在一间公司帮助开拓国内市场。所以其实我像一张白纸，我一进去，一吸收，便是中国的那一套，所以没有香港人做生意的包袱。现在许多人做生意时会说：香港怎么样，内地不行的。我不同意，因我不知香港怎么做嘛！内地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

“这样你反而不知道烦。”他同意：“我是不知道烦。”人家会对比，他说：“是呀！香港不是这样呵！对比就烦了。内地的手续我接受，我不烦。”我说：“因为你做成了，在内地，当你做成

一宗生意后，接下来的会容易很多。如天津你会觉得他们很老实。”他连声说：“是呀！很老实的。”第一次大家不认识，但做成一两宗后互相有了信任，业务则容易开展了。

当他真正进到内地后，他始发现，中国经商的大部分人才，以前都是做官的，他很高兴：“我进去与他们倾谈，呵！简直如鱼得水。连他们也说：我们未试过与人谈得这么投机的。第一面就可以倾得很投入，因为我知道公务员怎么想问题。”

他打趣说：“这件事可能是我乱打乱撞，让我撞上了，哈哈！”

最大败笔今何在

冷不防我问了一个问题：“经商近五年，取得许多成功，如果我要问你：最大的败笔是什么？我不说最失败，只问败笔，说一笔，是什么？也可以作为自己吸取教训。”

“败笔？”他思索良久后说：“我估计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准备得不够。我们有许多投资，比如看到零售好，现在这个市场没开放，我们可以去做；或工厂好，我们去做另一件事。而很多时，大家谈完说好，就去做，但做时有可能我在内地和香港都没找到足够的人手，便先估计，最后导致许多方面要不断地改善，结果可能你要交‘学费’，比如你投资两千万，其中有可能浪费了两百万。”

现在回过头来看，王英伟觉得：“这些钱应该不会浪费的。现在我们发现每一个投资，如零售店，第二个场永远比第一个场好。哈哈！因为我吸收了经验嘛！”

“我们在国内比较成功之处，在于所有的企业我们都占控股的地位。”他转了一个话题：“现在许多问题的决定上，我有绝对的控制权。不像许多合资企业，在国内受到很大制肘，我们一直

坚持占控股权，专门有人去做这些工作。而每份工作我们都有专人负责，如开场时我自己便去站了两天。”

这就是他的做事作风——事必躬亲。

我是肯定不回头

“又想再问。”我说：“其实已知道你会怎么答，但希望你自己回答：做得这么好，有没有想过‘走返转头’（再回政府干）？”马上：“有！”肯定？“肯定！”回归之后也没想？“有！”一点点也没有？还是肯定的：“有！”点解（为什么）？

“因为我是想创另一番事业而离开政府的，而这一方面我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不觉得会这么快便放弃我现在已创立的事业。”他之感受从实践中来：“第二，我觉得自己不一定要在政府内才能贡献社会。在回归过程中，我先后参加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预委会、筹委会，这些我是不收‘人工’去为社会贡献的。同样，我今天做工商专业联合会的主席、青年协会的会长，我也是不收钱的，是私人奉献。我觉得这样可能还好些，一方面我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我用个人的时间奉献社会，推动大众利益。”

但他说：“将来政府如有任何需要，如做咨询委员会等机构，我愿意奉献我的时间。其实我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社会活动，只有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做我的生意。至于时间会否一路加大，则要视乎我的舞台有多大，若我回到政府做公务员，最终目的也是服务大众。如果我能两者兼顾，则人生更加多姿多采。”

求新 求变 求发展

王英伟开朗、乐观，有理想、有追求。我问：“你这一生人中，有没有来自家庭、学校或什么人给你最大影响”他介绍：

“我有四兄弟，我最大，所以在家里一向是我做‘阿头’。”我笑他在家里由他‘话事’（相当于做主）。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他说：“我的性格很希望求新、求变，虽然在政府做事，我也不断创新。因为政府的训练，很多事会考虑得透彻些，考虑许多事时想得比较远，我未行第一步，已考虑第三步、第四步了，再想想如果第四步是这样，眼前的第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不觉得这就是循规蹈矩，只是我们做事的组织能力，和思考问题的逻辑性强些而已。”

这就是政府官员的训练，我问：“你觉得十七年政府官员的训练给了你什么？”他不加思索：“呵！给了我很多。第一，考虑问题时懂得全面去思考，不是单纯从自己个人的立场去考虑，我做任何事，包括现在公司的事，在内地，投资的机会很多，哪怕有少许‘擦边球’（指少许违法的事）我都不做。我常对员工说：我们做事一定要正正当当，真正为中国的发展出力。”我说：“你认识的全是市委书记、市长，起码要对得起他们，你应该相信，陈希同之流毕竟是少数。”他肯定地说：“绝对是少数！”

“这些全是政府给我一个有助于自己独立思考的好处。”他说：“另一方面政府送我到外国，栽培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机会，我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了一年、在哈佛大学读了个硕士学位，这两段时间对开拓我个人视野、开阔个人胸襟起很大作用，这些全是政府支持的。第三个好处，是因为我在政府做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多朋友对我比较熟悉，朋友对我的人格、处事作风有认识，对我的信心是强的。”

公事 家事 遗憾事

最后我问他：“可否讲些家庭事？”他说：“我家庭很简单：我太太，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正在读书。现在最

遗憾的是我很少时间给他们，因为很多时都回了内地，就算在香港我也很晚才回家。小孩子很早睡觉，晚上我回家他们已睡了，我早上起床，他们已回学校了。所以这是最大的遗憾。”

“两三年前，大儿子在校写作文《我的爸爸》，儿子在文中写道：我爸爸在很多地方工作，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他。“哈哈！”他说：“当时他大约读三年级，他不会想很多事，只是把爸爸的印象写出来，我觉得很遗憾。”你岂不很心酸？”是呀！但没办法，这段时间公司刚刚起步，也是筹备回归那几年。你也知道，那时经常上北京，我又经常跟着到天津、南京搞自己的事，根本上是很少时间回家。在香港又有很多国内朋友来访，要接待什么的，哪来时间回家？”

“不过现在好很多了，我都尽量礼拜六、礼拜天不应酬。”

太太是否在家全职带孩子？

原来太太也是位事业上的强人，他说：“不是，我太太现在是我其中一间公司的总经理，是香港一间最大的独立电影发行公司——洲立电影，在香港已有三十年历史。”我说：“看来你太太也周身‘唔得闲’（没空），再写《我的妈妈》的话，又变成另一篇看着电影想起妈妈的文章。”他立即说：“是呀！是呀！但我太太是很全力支持我的，她无论多忙，晚上一定回家，为孩子作好安排，每天早上返工在车上，已把指示全交给司机，诸如放学学柔道、五点钟学钢琴……阿粤做什么、阿月什么，很厉害，我都很感谢她！”

哈哈哈哈哈！

一九九五年元月元日于香港

李泽添：

我奋斗了几十年，又经过战争洗礼，什么甜酸苦辣也尝遍，去哪里都不怕。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因此劳资矛盾依然是香港社会的基本矛盾，出现劳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出现，工会理所当然要站在维护工人利益的立场上据理力争。

与生俱来之缘

李泽添小传

员耀年 员圆月 员猿日出生，广东省从化人。

员耀年刚读完小学一年级，香港沦陷，随家人逃难回到故乡从化，读至小学毕业。

员耀年再回港当学徒，学习做鞋。

员缘年任香港鞋业工会理事，员远年至 员缘年任理事长。

员缘年脱产，任香港工联会驻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员愿年任工联会会长至今。

员愿年至 员圆年，曾以两年多时间学习，毕业于香港大学与广州暨南大学合办的综合社会学系。

曾任香港筹委会预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员愿年任全国人大代表，至今仍为港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告诉我，太太常对他说：“你辛苦了一辈子，该早些退休享清福。”

他曾自忖：“做到 1997 年可退休了。”

原因有二：其一，香港工联会会长职衔 1997 年下半年任满；其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至 1998 年初届满。

长洒汗水育花红

我每每打电话到香港工联会找李泽添先生，对方总是“添叔在，请等等！”或“添叔不在（是去了哪里，哪里），你可在那里找到他！”

有次我到工联会，与他谈了好长时间，吃饭时间到了，他请我到职工饭堂吃饭，正好我想亲眼目睹、亲身体验工人的生活（起码午膳这部分），便欣然下楼，沿路及至进入饭堂，所见之人全以“添叔”之称打招呼。

我知道香港有许多人尊称他“添叔”，尤其是工人。

香港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联会）有长达五十年的爱国（当然指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爱港传统及为工人群众谋福利的坚持。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工联会团结广大工人，旗帜鲜明地为工人争取权益，在本港享有“爱国工会”、“爱国社团”的美誉。

目前，香港工联会会员超过二十七万人，是全港最大的劳工团体。他们的行动，左右着香港的工运，只要有工联会的参与，香港劳工争取的合法权益便十分明朗；港英时期的立法局、特区政府的立法会中，谭耀宗、郑耀棠、陈婉娴等工联会的精英或通过直选、或透过功能组别选举，堂而皇之进入香港最高立法机关，全港市民经常听到他们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声音。

工联会在香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泽添先生为第二代港人，原应在香港出生，但家庭有个很传统的习惯：孩子一定要生在故乡。于是母亲每每临盆前便回广

州，因此李泽添的出生地在广州，满月后，随即被带回香港。

李父在香港圣保罗学校承包食堂，母亲是工人，自己也是童工出身。我笑称李泽添与工人的缘是与生俱有的，至今已以生命的四十四载投身工会工作。

添叔曾给我看一首诗，是他自己写的，他谦称自己工人出身，不会写。印象很深有一句：“为使香港春常在，长洒汗水育花红。”全诗抒发了对香港、对工联会的深深感情，表达自己愿以辛勤的汗水培育她的心意。

有数十万会员的工联会及工人运动，添叔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心血和汗水培育她，人们尊称他为添叔，事出有因。

本来他寻思九七后留些时间给自己，也给太太作些补偿。他说太太几十年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是苦、是累从不让自己分心，若时间允许，好应该陪她远足旅行，遍游国内外名山大川。

添叔还有一个心愿：让年轻人接班，让他们真正在工运中锻炼成长。

看来九七后，添叔的心愿仍难实现。在人大换届中，李泽添再次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回归一年多，添叔仍是工联会会长。大有欲罢不能之势，我曾笑他，只要工联会动一动，香港就会地动山摇。

虽说夸张了些，但多少反映了实情。超过二十七万人的动作，足以牵动全港。

一技傍身走天涯

就因母亲的一句话，李泽添十二岁就做了童工。

当然也不全因母亲的一句话。

1945年，正是日本投降之时，当他再次从乡下回到香港，家庭生活已非常困难。母亲希望他学一门手艺，认为有一技可傍

身。便送他去学做鞋，这一年他才十二岁。

学徒生涯从小小年纪开始。最初，他一直干杂活和被支使去买东西，根本没机会和时间学做鞋。他回忆：“制鞋是传统手工业，没有一套理论，全靠在实践中自己去吸收。”我问：“偷师？”他说：“做学徒的辛酸法好得人惊（很叫人害怕）。学师三年，没有工钱、没有零用钱，需要理发时，还得伸大手板向师傅讨钱。”

“学徒生涯最深刻的是什么？”对我的问题他不加思索便答：“吃饭。”民以食为先，今天看，吃饭是最简单的动作，却成为他童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实行配米，每顿饭多吃一碗，师傅即“眼掘掘”（用眼睛紧紧盯着）。正值发育期的他，饭也不敢多盛，可怜他的肚子，似乎总也填不饱：“更糟的是每每临到开饭，又被师傅、师兄、老板支去买东西，待急匆匆回来，只能吃‘芡尾’（剩菜）。”他现在说及，还有余悸。

困境中，李泽添逆来顺受，没像其他学徒般动辄被师傅打。

苦熬三年，终于出师。

制鞋离不开牛皮、猪皮或羊皮，我问：“割猪、牛皮的刀飞快，有留下伤疤吗？”他无声地挽起裤脚，清晰可见膝盖上留下的块块伤疤。他说：“每次割伤，流好多血，随手铲一块皮（指猪、牛皮）当胶布，抹点胶水往伤口一敷就算数。”不怕发炎？他说：“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发炎。”

现在他一身轻松，哈哈笑着说：“我经过战争洗礼，去哪里都不怕；我学做鞋一直没改行，一做三十一年。”

团结起来有力量

从1950年至1980年，三十一年，李泽添制鞋三十一年。他以制鞋养家糊口；也在造鞋行业明白了工人阶级的职责和地位。

造鞋业分旺季、淡季。冬天，人人买新鞋过年，是旺季；夏

天将至，好些人买新凉鞋，也是旺季；余下的该是淡季。造鞋这行，虽不像腊味工人般一年仅一次旺季，但老板要赶货时，立即召工人开工，赶完工即赶你走；同时造鞋是计件工，手停口停。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毫无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的工人翻身，当家做主人。而殖民统治的香港工人仍遇许多不平等、不合理事。要在英殖民统治的地方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惟有成立自己的爱国工会。

1954年，为加人工（增加工资），经多方努力，工会与鞋业商会达成三项加薪协议。李泽添会长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达成的最好成果。因为当年商会承认了工人的地位。

以后，全港鞋业爱国爱会热情高涨，经两年时间，筹款五万多元；到1956年，鞋业工会有史以来有了自己的会所；为工人争取改善待遇也在工人中产生很大影响，至七十年代，鞋业工人总数已达六千多人，但其中已有超过半数的三千多人加入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团结起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

李泽添也因为鞋业工会工作而走上全职工会工作的道路。他从为工人谋福利开始觉醒，明白工人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奥道理；并选择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工作为终身职业；而反过来，工会工作提高了他各方面的水平，造就了一代英殖民统治下的工人、工运领袖。附带的，他还练得一手好字。

一眨眼已四十五年

有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54年至今的四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十九岁的小伙子眨眼功夫已两鬓挂霜，被人尊称为“添叔”了。而这段时间，他则以全副心机投入工会工作。

我问：“为何把毕生精力投入工会工作？”他回答：“由于亲身感受到来自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压力。”

回顾五十年代，李泽添刚参加工会工作，耳闻许多爱国老前辈无缘无故就莫名其妙地、很容易被递解出境；而工会发起什么活动，港英当局的政治部人士随时会来找你。他身在其中，对这些行径都挺反感。这是政治原因。

经济上，工人失业、失医、失学相当严重，他自己也曾两次因工会工作遭开除厄运，幸好有工友的支持才得以复工。

“四十五年中体会最深是什么事？”对我的提问略加思索后说：“七十年代后，香港经济发展较快。但我们草根阶层、打工仔能分享的繁荣却极之不合理，如要求通过立法保障改善有薪假期与遣散费等问题。”

与添叔的倾谈告诉了我，他牵挂的全是工人的权益。他解释：随着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工人应如何合理分享成果呢？现涉及经济转型、市道低迷，失业率高企，香港工人长年争取的退休保障，被港英当局左推右搪，到今时今日才搞了个强制性私人公积金制度，实际上也保障不了现已步入中、老年的工人利益，即现年四十岁以上的工人根本享受不了这待遇。

添叔分析：香港现在的人均产值达二万三千多美元，比日本、英国、澳洲等国好，但香港工人连起码的退休保障制度也没有真正落实，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他寄希望予特区政府能按基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即“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

记得他曾感慨地告诉我：“始终社会主义祖国才是工人当家做主的。”

支持特区维护利益

回归前，在港英当局的长期压制下，工联会从没动摇，一直在香港坚持爱国爱港立场，旗帜鲜明地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但回归后，香港政权性质起了质的变化，她已由殖民地政权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架构中的一部分，是“港人治港”的主要机构，负有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的使命。

我问添叔：“回归前后，工联会的职能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过去可与‘英国鬼子’对着干，现在的特区政府可不能再对着干了。你们怎么办？”他毫不思索，答得很快：“工联会作为拥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政策的爱国工会，对新成立的特区政府理所当然地要予以支持。工联会将通过积极提出建议、参与特区事务，向工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基本法宣传，支持特区政府。”

工联会说到做到，就在特区政府成立四个月后的 1997年 6月，工联会在新时期的工作路向，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治港。添叔说：“工联会明白，1997年 7月 1日午夜，宣告英国对香港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的结束，香港回归祖国。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开始实施。香港进入新纪元，香港人正式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形势赋予香港爱国工会光荣而繁重的使命，并寄予很大的期望。”

“但是，”我说：“就社会制度而言，有中央人民政府的保证，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香港毕竟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工人与资方的劳资关系会长期存在；而政府又是你有份参与筹建、举手选出的。这劳资关系、劳资矛盾在新形势下似乎比以前微

妙。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在制订和具体执行社会和劳工政策时，难免不会发生忽略或有损劳工基层利益、有违公平合理或有违基本法的事。添叔，此时正所谓手背也是肉、手心也是肉，你身为工人领袖，你怎么办？”

他说得很坦然：“在这个时候，出于维护基本法和劳工基层利益；出于促进社会公平、均衡和合理发展，我们有必要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发挥工会对特区政府既支持配合，又批评、监督的作用，使‘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基本法得到贯彻落实，并使各阶层利益得到兼顾，社会得以均衡合理的发展。”

拥有二十几万会员的工联会会长，看问题自有他的角度，他屡屡从宏观的高度谈自己的看法，然劳资关系呢？对工人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

添叔如是说：“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香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因此劳资矛盾依然是香港社会的基本矛盾，出现劳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一旦出现劳资矛盾时，工会理所当然要站在维护工人利益的立场上据理力争。我们主张通过沟通、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工业行动。”

“资方应以文明、公平的态度，对待工人和工会，以减少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添叔同时讲了对资方的意见、要求：“尤其是借此困难时刻，资方应与工人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对那些把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随意裁员、减薪的不公平、昧良心的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

维护工人利益，添叔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对政府，添叔也有自己的说法：“政府亦应积极推动，建立恒常的劳资沟通协商机制，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最近，工联会代表约见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对政府施政提出了六点意见。除了反对资方单方面要求雇员减薪；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行再就业计划，确保每年五万公营房屋单位供应量；增强香港与内地经贸交流合作外，还希望政府加强政策的宣传解释，以增加市民的凝聚力，加深对政府政策的理解。

“特首董先生对我们的意见深表认同。”添叔说：“香港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市民的信心很重要。内地今次能成功抵御特大洪水，是由于全国上下一心，军民合力，坚定信心和顽强拼搏而取得的成功。反观香港，由于政府宣传不足，令市民容易被误导，造成混乱。这不仅不利于政府政策的顺利推行，也降低了市民的凝聚力。”

添叔并以此次政府入市为例，证明加强宣传的重要，他说：“今次政府在金融市场入市，目的是打击国际炒家，维护香港利益。但由于没及时进行宣传解释，不只受到来自内部的批评，还受到外来压力，被指‘破坏自由经济’，造成市民思想混乱。但经过政府解释后，澄清了误解，市民普遍支持政府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希望政府今后加强宣传推广方面的工作。”

年纪最大的毕业生

1984年 12月 24日，添叔终生难忘的一天，他经历了此生最不寻常的事情。

那一天，在本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李泽添登台领取毕业证书，获得全场最最热烈的掌声。

因为添叔是最年长的毕业生。

他说，自己做梦也未曾想过年过半百仍有机会读完大专课程，毕业典礼上的所有照片他一直珍藏着。

自当工联会会长后，身为二三十万工人的“阿头”，他深感

与以前的层面不同，自己原有的知识与文化水平均适应不了工作与日益发展形势的需求，添叔渴望有增进学识的机会，却又苦于五十出头的年龄和失去的机会。

终于，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毅然决然在年过半百之时，入大学进修社会学，成了最年长的毕业生。

两年多的大学生生活，添叔直觉得很苦。他说：“所有课程中，心理学最伤脑筋、最难读，我从未接触过；反而社会福利学自己最熟悉，所以最容易学。”回忆当年一家六口，仅住百几呎（相当于十几平方米）公屋。白天会务多，很繁忙，等至晚上孩子们都入睡了才挑灯夜读，复习功课、写论文。他说：“考心理学时头都大了（形容头昏脑胀），共五十个考题，以为一定不及格，很幸庆平时努力温书，考试及格，不用补考。哈哈哈哈哈！”

苦熬了两年多，终于完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福利、公共行政、写作等近十个学科之学业。添叔学有所成，终于松了口气，现在说起，很开心：“我五十出头始有读大学的机会，是苦了点，但收益很大，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亦启发了思维，开阔了视野。我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了，可谓收获良多。”

哈哈哈哈哈！是开怀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欢笑！

另一半的无私支持

访问期间，添叔多次提及太太。

我认识她，那是筹委会委员到深圳，参观未来的驻港部队军营时。

忽地，天气咋冷，刮起很大北风，我穿的衣服显然不够，冷得缩成一团。一位女士过来，笑眯眯地把自己身上的大披肩披在我肩上，我习惯地推辞，还是让她给我披上了。

后来打听，方知她是添叔的太太。自然由于大披肩的御寒我

没冷出病来，但我永远忘不了她亲切的笑容、坦诚的举止，使我这位当时的筹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确实感到了阵阵温暖，记得当时心里还感动了好一阵。

而她，绝对是自然流露，看不出丝毫的做作。

我想：我的感觉是很直接的。

他们结婚至今三十四年。在添叔几十年的工运生涯中，同是工人出身的太太，基于共同的理想和深切的理解，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夫君。

添叔夫妇共有四个孩子，最小两个为龙凤胎。世上也有那么巧的事，太太所生三胎四个孩子出生时，正是每一位做太太的最盼望丈夫能陪在身边之时，却适逢工会工作最忙之际，添叔均未能陪伴在太太身旁。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现在说起，添叔仍满含疚意。而太太则是一脸的宽容、满腹的理解。

任谁都知，工运工作工资入息低、经济状况差，多年住百多呎公屋。她却很体谅丈夫，除照顾好几个孩子外，自己也出外工作，以帮补家用。

1985年，添叔患肠癌，猿月 15日在香港浸会医院做手术，太太衣不解带，与长子轮流，日夜陪伴在丈夫身边，并不断鼓励、安慰丈夫，忆及往事，添叔展现满意的笑容，情深款款地对太太赞不绝口：“太太是位自立能力很强的女性，除了支持我以外，对儿女都严加管教，同时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完全不用我操心，使我可以全力投入工作。”

“我一世人几十年，最大安慰有三件事。”添叔急着出席另一会议，访问近尾声时，他抓紧时间表达了要讲的三件事：“一是我奋斗了几十年，什么酸甜苦辣也尝遍，盼望着香港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现终于见证香港回归，是‘百年耻辱随逝水，千秋伟业傲东风’；第二是爱国爱港事业不断壮大，我亲眼目睹爱国工运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目前会

员人数的发展已超过二十七万人，破了工联会的历史纪录，给了我最大的满足；第三，我的儿女个个听话，他们踏踏实实学习和工作，对我的事业理解、支持，假日回家团聚，一家人共享天伦，好开心呀！”

李泽添，让我认识了在香港特殊环境下工人领袖大公无私、工作为先、顽强奋斗的硬朗一面；同时亦了解他为夫、为父的温柔、慈祥另一面。

我只想说：“添叔，您好！添婶，您好！”

1988年 12月 10日于广州

李鹏飞：

香港没有天然资源，如果香港经济得不到完善发展就“大镬”（问题很大）。香港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直选与否、不是民主。民主的路一定要走，基本法已规定，不用担心。

忧乐天下事

李鹏飞小传

员缘年 源月 圆原日生于原籍，山东省烟台市人。

四岁随家人到上海，在上海沪江小学、沪江中学就读。

员缘年 年仅十四岁，只身来港，先于清水湾三育中学读书；后毕业于培英中学。

员缘年 赴美国读电脑，获密芝根大学工程数学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在美国洛奇飞机公司任职；员远年被派回香港工作，便一直留港发展至今。

曾于安培泛达电子有限公司任职，员远年任总经理，员苑年任亚太事务总裁至 员愿年。

员愿年至 员苑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于 员愿年至 员怨年间任香港首席立法局议员。

员怨年至 员怨年，任香港行政局议员。

员怨年至 员愿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

员。

曾任港事顾问、筹委会委员，立法局财务委员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主席、立法局账目委员会主席、立法局贸易小组召集人，香港总商会主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等职。

现为港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自由党主席，~~1995~~年~~12~~月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会员。

为 ~~1997~~年度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5~~年获授太平绅士，~~1996~~年获英女皇颁发 ~~爵士~~勋衔，~~1998~~年再获英女皇颁发 ~~爵士~~勋衔。

同时担任二十多项社会公职。

初时，李鹏飞不认识我，我也仅从传媒中认识他。他经常上电视、见报纸，我对他的认识仅此而已，相当肤浅。

印象颇深是他刚被任命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时，在钓鱼台出席国宴前，我们工作人员陪着委员们在外厅等候入席，委员们三五知己、七八新知聚在一起打发时间。因是国家领导人的宴请，委员们都携夫人出席，夫人们款式迥异、华丽非常的晚礼服，徒然为严肃的政治人物们增添了绚丽色彩。

猛听一女音“飞哥，飞哥”的呼唤，原来是李太太在寻找夫君，一声声亲热的呼唤言犹在耳。

先是政治人物

虽不认识，约他采访并不难，见惯大场面的他应付传媒驾轻就熟。

我写人物，不想写他们的政治，更不愿写政党，能避则避。

然香港的名人大多与政治相关，或根本就有政党背景；要么则是超级富豪或富商。

首先说明来意，拟先从他羡慕旁人的夫妻情说起，然他与我谈的是另一话题——

人很爽朗、坦白，初次倾谈即能过去、现在畅所欲言，时而谈笑风生，传来阵阵哈哈大笑。后来行家告诉我，他对任何传媒都这样，一旦应承做访问，便很合作。我想他大概是纵横政坛二十多年练就的本事。

我敢说全香港认识李鹏飞的人都认为他是位政治人物，起码首先是位政治人物。原因很简单，大家时时所见是他经常出席多彩的政治活动、参与自由党的政党诸事项、立法局的辩论、公众场合的滔滔口才。

眼前的他却与我大谈经济主导。读者信否，他说自己在政党内，在立法局；他任港事顾问、当筹委会委员，全以调查研究为主，以研究经济问题为主。

他表白自己：“对香港经济不只是有兴趣，而且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关心香港事务的任何人士，一定要关心香港的长远经济路线；香港工业转型，一定要想对策，让香港继续繁荣下去。没有繁荣便没有安定，没有繁荣也没有政治。”

倾谈后始知他确与香港经济有关，并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

少先队中队长

开腔说话，粤语中略带上海味：“好多人以为我是上海人。”难怪人家会这么看。

四岁即随父母离开山东老家到了上海，在上海完成中、小学学业，不难通晓满口地道的吴侬细语。

“我曾经是少先队中队长。”他指着左臂说：“在这里挂两道

红杠杠的那种。我参加过国家的许多运动（政治运动），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倾谈时，正值他在港英政府任立法局议员近二十年，我笑他：“儿时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还是中队长呢！），现时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两员’风马牛不相及，却集于你一身，哈哈，相映成趣。”

我也曾是少先队员，我告诉他：少先队员讲纪律，培养群体意识，牢记脖子上系的红领巾是红旗（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因此少先队在共产党、共青团的培育下，从小养成“五爱”意识，包含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

共产党的教育，对李鹏飞而言，他有十年时间耳濡目染及亲身参与其中。广东俗语有说：三岁定八十。不能说这十年对他的一生没影响。

“少先队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今天他仍承认：“虽然有时是口号式的，但提倡群体精神。从少先队员的历史来讲，是一段好经验。”

只身“偷渡”来港

像讲笑话一样，说了一句：“我是偷渡来港的。”我不相信：“才十四岁，怎么偷渡？”他挺认真解释：“我坐葡萄牙商船只身来港，也不知什么原因要我到香港来，只知是妈妈的主意。”家人把他送到商船上，便“偷渡”来港了，正好是五十年代港英的“抵埗”政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来，只要“抵埗”（人来到）香港，十四岁的李鹏飞没办正式手续，到了香港，就是香港居民。

从大上海来到“小上海”，举目无亲，依靠爸爸生意上的朋

友，为他安排在三育学校寄宿。“开始话也听不懂，好孤独。”他说当时：“最讨厌被同学叫‘外江佬’，因此与同学打过架。”原来不打不相识，打架之后成为好朋友。

父亲在美国经商，生意遍及东南亚，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听说父亲有几位太太，但他说：“我们从没见过面，只是有一次代表父亲到韩国（南韩）做生意，见过一位韩国妹妹及父亲那位韩国太太。”

1957年，母亲携弟弟妹妹来港，父亲却迅即于1958年安排鹏飞往美国求学，所以他从小像与家庭分开惯了。

深造七年后回来，猛然发现香港已是另一番景象：顿时感到香港发展很快，很有潜力，经济和工业刚刚起飞，同时香港人很勤力。回来后他很高兴，也许善于思考，发现香港许多长处，有留港发展的冲动。

回想刚来香港的头五年，十四岁的孩子，也许太年幼，也许关在寄宿学校时间太长，也许初来乍到便匆匆赴美，像过客一样，也许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实在太不景气，总之香港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七年后回来，已是刮目相看，“学生哥”已成长为美国大公司的工程师。李先生说得很开心：“一回来，怎知就很喜欢香港。美国安培泛达公司几次想调我回去任副总裁，我也没有回去。近三十多年不管发生多少事，我也没有离开，我认为自己最适合留在香港。”

从此，李鹏飞以香港为家，扎根香港，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认为1957年的选择是对的。

为经济入政界

“安培泛达电子有限公司是美国在香港最大的电子公司，人称电子行业‘少林寺’。”此话怎解？看我愕然，他继续介绍：

“就是如少林寺培养弟子后，向外输送人才一般。开始，我担任培训工程师工作，后来成为远东区总裁，全公司四千员工，高峰时连台湾在内达八千人。当年在我手下做事的人，现在已是电子界的表表者，好多已是香港鼎鼎大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哈哈！”我说：“因为你后来从政嘛！”

1977年，港督麦理浩到电子厂参观；1978年便邀请李鹏飞入立法局，帮港府做事。原因有三：一，帮手吸引外商来港；二，发展香港科技（电子业）；三，提出对香港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见解。当然主要原因还是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

“我从来没想过入政界。”他说起从政的偶然性。

他写字楼正中当眼处有一条幅，首句便是“忧乐天下事”。我思忖：李先生“弃商从政”可能纯属偶然，而一旦走上政途后，便把天下事之忧乐放心上，在从政路上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

他说：“开始，我只要求一周帮手做十个小时，做下做下（越往前做下去）变成了全职，现在是日日做十小时，我真是无端端入了政界。哈哈！从政二十年，经历过四届港督、首届行政长官，前三届港督与我讲经济，最后一届彭定康不与我讲经济，而讲政治，因此只有常常吵架。我自己对政治变幻兴趣不大，二十年来最大兴趣仍然是经济，我可以直言，我对经济发展有研究。”

“你对政治这么投入，”我说：“别人不会相信你的讲法，谁会相信你不喜欢政治？”他说：“我不是很投入。”我已笑至哑然：“谁会信？”他连忙辩白：“我只是对经济很有研究。”当真？

力陈经济见地

“我对香港工作最有见地的是同历届港督‘有慄讲’（有话圆怨

讲)，从麦理浩、尤德到卫奕信都‘有慄讲’，他们很注意我经济方面的见解和意见。”李鹏飞讲了几件事实，可清楚表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

一，香港中学开设电脑课程，是我于 1984 年向尤德建议的。于是 1985 年电脑在中学出现，现已普及至小学。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就业，如果不懂电脑好惨，现全世界都会用电脑，就香港不会用怎么行？资讯工业将在香港经济中产生好大影响。

二，1978 年我曾对麦理浩说香港经济最紧要的是多元化。1978 年夏天，刚从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宣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便对麦理浩说：“中国的开放政策将对香港经济造成最大影响，所以你要去中国，一定要向中国领导人了解开放的程度，并与中国充分合作。如果将来中国成为香港的制造基地，香港经济则一定要多元化发展。”

三，将来特区政府最大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因为香港的人口将不断增加，未来十五年会增加一百八十万人，最大的问题是香港如何发展才能令我们解决就业问题。香港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直选与否、不是民主。民主的路一定要走，基本法已规定，不用担心。

这番话至今听来仍颇有新意，是一年半以前听他说的。他当时的表白，今天来看，很有预见性，他对香港经济的分析研究很深很透，常有超前的认识。

“香港没有天然资源，如果香港经济得不到完善发展就‘大镗’（问题很大）。”他对香港经济有近忧，也有远虑：“对首任行政长官，我期望他是搞经济的能手，并对香港及香港长远有远见。对香港，首先要搞好经济才有别的可言，这是香港未来十几、二十年最大的挑战。你说李鹏飞是政治人物，我说自己是对经济有认识、有研究。”

大家看问题角度不同，他对自己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是否说政治人物在政界从事、处理经济问题更确切些呢？

自己是中国人

中英开始谈判时在 1984 年至 1985 年度，他说：“此时在港府的四十多位立法局议员中，我是惟一曾在中国生活过、惟一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过的人。我是资历浅、很低级的议员，但我对中国的研究很有兴趣，永远像个研究生。”

“我一向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如许多港人一样，尤其是许多土生土长的港人，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本身是中国人的情意结始终系得很牢，何况李先生在内地生活了十四年。不管生活在哪里的中国人，要忘记祖国、祖宗，很难！

“到目前为止，我是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都做过。”为做中国人他放弃很多，也足以自豪：“英国佬送过两次本土护照给我，我不要；在美国读书时，尤其是 1972 年至 1975 年，这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成为美国公民，我不肯。我觉得自己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我有好大影响。”

“我是山东人。”他说：“我对孔夫子的儒家思想有很深印象，也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没入任何外国籍；山东人性格出了名的率直，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最欣赏孔夫子的尊师重道。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态是：若中国做了错事我好伤心，我会强烈批评，因为我对中国有很好的期望。我去过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我在外国读书时、在外国做生意中，碰到许多歧视东方人、歧视中国人的场面……”

他没有往下说，但我明白他的感受。许多中国的香港人到了外国都有同样的遭遇，迫使他们去思索。只有祖国的富强才是海外中国人的保障。

政治生涯给他以锻炼，他说起话来很清晰，但滔滔不绝，快得很，此时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插了一句：“刚才你说在国内的生活对你的思考影响不大，但你的讲话其实就是你的思考所致，所谓‘三岁定八十’，其实你的思想早在当少先队员时就受到影响。”

“哈哈！可以这么说。”他并不否认：“对于我来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只有做中国人的心态。从小我们受的教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论现在或将来我都好有信心，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尽管现在穷点，但只要政策对路，将来，二十年后的中国一定是世界经济强国。当时我决定留下来，绝对没有想到中国的开放，以及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香港的发展对我来说出乎意料之外，想不到今天成了金融、航运、旅游、通讯中心。”

他的看法远不于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中国当香港是外人，香港没有今天的发展。香港与中国需要并驾齐驱，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什么问题，香港是最快受影响的。”

香港与祖国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也好！道理千真万确，但要真正理解这点，还有漫长的过程。港人对祖国的认同，程度之深浅也因人而异，珍惜祖国、爱护祖国不是一朝一夕能说得清，做得到的，假以时日，祖国的富强定是香港强有力的后盾，港人会慢慢从实际中体会。

最大兴趣仍是经济

“太太常说，如果我不搞政治，可能今天早已发达了。”像说笑话一样，他很开心：“哈哈，但我没有后悔，觉得一个人做一件什么事不能作比较，也不能‘返转头’（走回头路）。”

“过去港英政府有个鲜为人知的经济委员会。”他说：“大概

六七个人，专对发展香港经济的对策作深入研究。多年来我也是其成员，许多有关香港经济的发展策略我都有份参与制订，一直做到1985年我没当首席议员为止。这也说明我对经济的兴趣。”

除了力陈自己的经济见地外，他时时、事事不忘表白自己热爱经济，是经济人物。我说：“但全港的人都视你为政治人物呵！”他笑了：“哈哈，他们不知我是一个经济人物，我专门搞经济，就算我是政治人物，也属在政治层面搞经济，即参政人士中的经济人物。哈哈！对吗？”

从政二十年后，今时今日对经济还是那么执著，那么有兴趣？他答：“是呀！一样！我有自己的见解，没有经济的好表现根本不能解决人口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也是搞经济，目前中国经济的大方向、大路线已经正确，但有许多小问题有待解决。”

“政治人物如何做经济工作，互相间有矛盾吗？”他的回答：“要向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政府中真正懂经济的人不多（他多指港英时期），政府中人多是为官者，所以最重要是‘讲掂’（说服）港督。可惜彭定康只讲政治不讲经济。香港有港美、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为什么与我们有最大经济关系的中国没有？因为他（彭定康）没兴趣。”

“经济分两个层次，以外对内。现在香港经济已多元化，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这才是我最大的兴趣。我政治生涯中最有兴趣、投入最大部分精力的仍是经济！”访问行将结束，政坛人物强调的仍是经济。但身为政党主席，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更多会从民生考虑，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味道，忧乐事在他心中的分量可否会厚此薄彼？

1985年的首届立法会选举，李鹏飞参加了地方直选。我常想，参选前的那场病，去到外国施行手术，对他肯定有影响，虽然选前撑着病体回港，但结果让他离开了服务近二十年的香港立

法机构，我觉得是个损失。

然他依旧活跃在香港政坛，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位置上，在政党活动的事宜上。他秘书告诉我：“他做了二十年议员，已是全职议员，生意上的事已很少打理，现在许多时间放在政党工作。”我问：“他的情绪好吗？”她说：“与以前一样。”

1995年 12月 14日于香港

董建华：

香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是一个东方社会，同时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知道，香港人以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并能透过在本港的表现，去理解中国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是含蓄的民族，中国人的内在优点包括谦虚、忍耐、坚持不懈及努力工作。我们大家都希望强调社会的责任多于个人的自由；协商解决问题好过公开对抗。

行政长官董建华

董建华小传

董建华 缘月 圆日生于上海。祖籍在浙江省定海（今舟山市）。

董建华随家人来港定居，在香港完成小学、中学学业。

其后留学英国，缘年于利物浦大学毕业，获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

以后有近十年时间在美国居住，先后于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本身的家族公司任职。

缘年回港，协助父亲管理家族生意。

董氏家族集团是当时全球经营货柜轮、干货轮及油轮业务规划最庞大的航运机构之一。

八十年代，航运业一度陷入全球性低潮，董氏集团在此时致力革新，推行财政重整，从而令业务重现生机，奠定了日后在航运界的重要地位。

董建华为航运商人董浩云与顾丽真女士之长子，有

一弟三妹。

1985年与夫人董赵洪娉女士结婚，育有三名子女及五名孙儿、女，其中最小的三名孙子为三胞胎，曾于回归后一时传为佳话。目前儿孙辈都在香港居住。

1995年12月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竞选，于同年12月11日在四百名首届特区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中，以三百二十票当选；遂于同年12月12日，被中国政府正式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历任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际策略中心驻外干事。并曾兼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星岛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曾是世界顶尖保险业集团美国国际集团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咨询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筹委会副主任。

曾为香港行政局议员，香港公益金副赞助人、香港救助儿童会香港区赞助人、香港船东协会主席和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摩纳哥驻港名誉领事等。

现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他是我采访的人物专访中，最特别的一位名人，原因有二：其一，迄今为止，我采访的香港、内地名人达一百多人，就他一人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其二，本人已采写一百多人，就他一人以书面的文字方式答本记者问。

过往采写的名人，全是面对面的独家专访，最少都倾谈两小时，多者两个下午七八个小时。在感谢他于百忙中，抽空以整整六页的文字作答之余，也有少许遗憾。

记忆所及，我所采写的人物中，从未试过采用此种手法写人物专访，皆因我极重视捕捉人物的现场神韵，以至力求传神、真实。

在此不得不交代，其提供的文字资料，除履历外，通篇都是英文。我也不明白为何为纯中文文章作者提供英文资料，为力求准确，我特意请了两位英文水平极高的朋友，为我一字不漏地翻译全文，再由我加上自己的认识、感受，润色成文。

自然，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全部由行政长官办公室提供，应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符合我“百分之百，真实的故事”宗旨，也算对读者有个交代。

大喜日子

采写人物，对我来说已有近二十年时间；然在香港，是从1997年7月开始。

所谓每位作者各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我的文章，谈不上什么风格，最大特点是写实，正是被访者说什么，我写什么，写好后还会请被访者过目、核实，这就是我写的真实故事。

然本文极有可能与我采写的其他人物风格有很大不同，有可能我会在文章中堆砌以往很少采用的、或能避则避的颂扬、喜庆词语。原因同样有二：其一，1997年7月1日是中国、香港的大喜日子；其二，董建华在当天正式宣誓就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全国乃至全世界炎黄子孙吐气扬眉、欢欣鼓舞；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英殖民统治从此在中国结束的具历史意义的日子；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上任，是一百五十五年以来，首位香港的中国人担任香港的最高级首长。

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是雪耻的日子，是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一天，从香港来看，是第一位中国人开始管治香港新纪元的开始。

因此，我有一千条理由在这篇文章说尽颂扬、赞美的话语。因为我有份见证这段历史，并跟随筹建香港特区的人士作深入、详尽的报道。

那段难忘的日子，不敢说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但所有的喜怒哀乐、欢欣鼓舞都亲身感受，投入的程度，所耗之精力，是我三十年记者生涯之最。

记得1995年12月15日董建华正式宣布参选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后，12月16日，在报道他以二百零六票当选为候选人时，我曾写道：“今天是香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由四百名委员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正式成立。三百九十九名推委会委员出席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的重头戏是今天下午四时零五分开的一个多小时唱票全过程，出席会议的三百九十九名委员与三百多名中外记者，均密切注视着唱票的每一刻。”

我当时分析：“董建华的二百零六张票应属‘铁票’，但并不意味着12月16日的正式选举中，他一定会以大比数当选。只能说‘如无意外’，即在未来的二十多天里，董建华仍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而应发扬自己稳重的优点，多认识基层，更谦厚地与香港各界接触，届时产生一位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也是极有可能的。而杨铁荻、吴光正以比董建华低的票数成为候选人，也不说明他们就没有机会胜出，因为现在三人的票源也可能在未来二十多天中出现重新组合的局面。这就要看三人的具体表现、各出奇谋、争取选票了。当然，亦不排除四百名推委委员中，大局已定、大势所趋的心态。”

摘录过去的文章，只想与大家共同重温那段历史，虽同是我

写的文章，但离开了当时的现场气氛，恐怕也难有其时的激情，难以写出那天的感受。

一句话，为了真实！我愿意把那段历史记录下的文字重现。

1997年 7月 1日中午十二时十三分，董建华以三百二十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胜出，以得票率 68% 当选。当董建华于十一时五十六分获悉，已获超半数的二百零一票是首位能胜出的候选人时，即与太太步出他位于东方海外集团的办公室门口，让守候多时的记者拍照，对众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家辛苦嘅（大家辛苦了）！”

并在获选后的记者会上，先向另两位候选人杨铁菱、吴光正致敬，同时向四百名香港特区推选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筹委会秘书处及积极参与后过渡期各项工作的香港市民致谢。

对董建华的当选，我亦与全港大多数市民一样曾衷心祝贺。

1997年产生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他是极佳人选，简直不作他人想。私底下我与几位老友曾多次说及董建华的当选是香港人的福气。当然，那时的心情是极希望我们的预言能够实现。

董建华为人谦厚，能团结各方人士；具高学历，有领导才能；交游广阔，可更好推介香港……

时至今天，过去一年多，我仍认为董建华是一位极佳的香港行政长官。他以自己的诚恳、厚道、辛勤治港；他的商业头脑也处处显示。我不认同本港一些人对董建华的说三道四，姑且勿论他作为香港历史上的首位华人最高首长，正在实施前无古人、毫无借鉴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

单说自去年 7月 1日以来的金融风暴，先是东南亚、亚洲及至俄罗斯、欧洲，目前似有括吹全球之势。香港与亚洲或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股市暴跌、房价沉底、经济低迷、百业萧条、失业率高企等等困境，目前仍在苦苦挣扎。

这一切，能一古脑地指责董建华吗？多少外国元首，包括著名的叶利钦等不都也策手无策吗？

反观董建华，带领港府一班人，救事、解困，力求做到最好。

时至今日，我仍坚持他是行政长官最佳人选，我就不信自他上任至今，换了其他人会干得比他更好。在台下指手划脚容易，说完就算，又不用负责任，可上得台来，就不是下巴轻轻说说就算那回事了。

当然对他与港府出现的失误我也从不一味唱赞歌，但对待新生事物，且是一非实现不可的新政府，还是多些宽容、多些谅解、多些扶持才能达致更好发展。

我持此态度。

中国道德观

中学毕业后，董建华即赴英国深造，毕业后在美国生活近十年，十几年在外国，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过的是西式生活，加上其家族背景，我寻思他是很西化的人。

然自他当选后，始发现他很讲求中国儒家思想，似乎想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治港。他坦言：“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究竟希望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里，香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是一个东方社会，同时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知道，香港人以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并能透过在本港的表现去理解中国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是含蓄的民族，中国人的内在优点包括谦虚、忍耐、坚持不懈及努力工作。我们大家都希望强调社会的责任多于个人的自由；协商解决问题好过公开对抗。”

董建华的谦厚、仁慈在说话中表露无遗，而在实践中又付诸行动。

“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保留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德，另一方面同时要吸收西方有利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对中国道德观，他还有演绎：“香港在丰富中西方文化及商业社会的表现方面，为国际社会作出极大贡献。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其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港人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我们容纳不同意见，并无意改变现状。因为，集中西方文化的优点，可令我们的社会更加强大。”

我在寻思，受西化教育的董建华，何以有儒家思想，看重中国传统文化传统？

舟山寻根

浙江省舟山市（过去叫定海），是我国新兴的海岛港口、旅游城市，位于我国海岸线的中部，是长江、钱塘江、甬江之出海口，也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所在地。

这里就是董氏祖籍。据一位在定海为董氏看管“祖居”的古稀孙家老太太徐丽香称，她十五岁起在董家做佣人。据其回忆，董建华的祖父董瑞昌及其兄弟董瑞霖，早年就到上海求发展，祖父在上海开了一间门面不算大的印刷店，董瑞霖则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

董瑞昌育有三子二女，董浩云排行第三。

据《定海县志》人物、列传中记载，董父浩云（~~1856~~1856年至~~1904~~1904年），名兆荣，字以行，城关西门将军桥人。青年时代喜爱学习，强于记忆，民国十七年（~~1928~~1928年）考入金城银行集团，曾任职天津航业公司。~~1932~~193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航行于沿海城市及远东口岸。

九十年代初，董建华曾两度回舟山。~~1992~~1992年 7月董建华兄弟随舅父往宁波，受一水之隔的舟山市政府热情相邀，董建华欣然

前往，虽只逗留了一个白天，但有了第一次拜祖寻根之行。

1995年源月猿日，董建华特意带上刚从大学毕业的次子立新第二次返乡寻根祭祖，住了一个晚上。为了表达对家乡的关心，他决定捐资兴办了舟山市航海学校。

董氏在原籍现在已没有任何亲属，董建华虽然不是生于家乡，却未忘自己的根之所在。

情归何处

幼承庭训、薪火相传。在商场上历尽风霜、见尽人情冷暖的董建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表现在对国家、乡土、香港、家庭均情深谊长。

他说：“我父亲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份强烈的感情。从小他就教导我们，应以身为中国人为荣。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将继续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对回归后的新身份及中国根源感到自豪。我们大多数是中国人，并以香港为家。当中很多人曾留学西方，也有很多人曾移民外地，但我们始终是中国人，我认为我们应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此乃中国情！

他说：“我为什么参选行政长官？我的使命感令我在这历史时刻能为香港服务。香港的成就值得骄傲，香港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我希望香港能更加成功，我在香港长大，现在一家三代都在香港。我对香港有归属感，希望香港将来更好，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我希望有机会参与和掌握香港过渡期的事务，接受这方面的工作和挑战。”

“我们身为香港人，当然以香港的成就为荣，但同时应更了解其成功之道。我深信未来的香港市民将更富足，更知书识礼。”

此乃香港情！

浩瀚的汪洋，造就了一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创就了东方海外的基业。

子承父业的思想从小便灌输在董建华脑海里。

然正因为传统的教育、父亲的基业为董建华带来一次又一次近乎无法承受之创痛。

1985年，当父亲创办的“海上学府”付诸一炬时，他控制不了自己，伏案痛哭。那可是父亲的理想，也是父子俩共同的心血啊！而创痛并没随巨轮的沉没而完结，无奈中，父亲创建的基业在十年后再一次令他掉泪。

1986年，董浩云撒手尘寰，董建华接手家族生意。有谓祸不单行，他在丧父之痛尚未平复之际，家族生意再次受到挫折，乃至几乎无法挽回的困境。

当时世界航运业持续不景气，东方海外也因早期的快速发展而欠下大笔外债，庞大的利息支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拖着东方海外一步步走向破产边缘。

他左支右撑，四出筹集资金，一向与父亲关系良好的台湾、一直与董家合作密切的日本财团，原以为可以帮一把，但多次往返均遭拒绝，几乎令他走投无路。后来采取各项改善措施，也丝毫不见起色。董建华不得不在1988年怨月，对外宣布东方海外在交易所停牌。他也不得不再次洒下男儿泪。

还是那句：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当时的汇丰银行主席沈弼建议为他提供一亿美元的备用贷款；其后中国银行、招商局及霍英东先生等先后向他伸出援手，或注资东方海外、或购买其名下资产。

一连串的好消息，无疑使董建华对父亲的承诺有了信心，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尽力把公司这块招牌保下来”！所有一切，他一概接受，因为他很清楚，最重要的是重振家族事业的昔日雄

风。

当董建华宣布参选行政长官、辞去东方海外主席职务时，他真诚地说了一句话：“我真的很舍不得。”

那里除了他的心血外，还有与他共患难的员工。

此乃家族情！

他说：“当我们勇往直前时，我深信有必要重新确立和认同一些世代相传的中国人价值观，这些传统观念已流传数千年，我认为它们对今日社会依然行之有效。”

“简言之就是孝顺父母，重视家庭，仁爱为怀，诚信为本，谦逊刻苦，自强不息。中国传统观念都会教导我们克尽义务，少计权利。”

此乃传统情。

妹妹董建平说：“我的眼中，哥哥是一个稳重而具有领导才华的人。”

董建华为家中长子，自父亲去世后，他便兄兼父职，肩负起一家之主重担。当东方海外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之际，母亲又患上重病，在双重打击下，他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在忙于力挽江山的同时，每天必定抽出时间探访母亲。

此乃亲情。

特首夫人赵洪娉是董建华的第一位女朋友，也是惟一的女朋友。

两人在香港读书时由同学介绍认识。后来董建华赴英留学，两人尚未萌发爱情，眼看将被重洋隔断。却原来姻缘早由天定，不久，赵洪娉也出国留学，“巧合地”目的地也是英国。在伦敦碰见后，便开始拍拖。

董建华出身名门望族，有很多机会结交异性朋友，但他从不多心，始终钟情于赵洪娉一人。从1985年结婚至今，三十七年过去了，他始终如一，从没传过任何绯闻。

董建华不仅自重，还不时提醒身边的人，要以家庭为重。
此仍爱情！

董建华情归何处？不是已有很好的答案了吗？

为香港自豪

董建华回顾：“自从当选为行政长官后，我会晤过来自不同阶层、团体的众多人士，包括工人、教师、学者、街头露宿者、商人及政治家等，虽然我们未必对每件事都有相同的见解，但我听到的意见实在令我感到惊喜。”

身为港人，他对香港有一份执著的感情：“我为香港而自豪，值得鼓舞的是香港经过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统治之后，终于回归祖国。作为中国人，我们看到在自然和谐之下结束香港与中国间不正常的分离；身为香港人，我们终于有机会当家做主。我相信香港人都有共识，希望显示给全世界知道，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将比在殖民统治时更加成功。”

“当我在 1995年 6月当选时，曾受到广泛讨论，其中有不同意见，也有些引起世界感兴趣的政治数据。”他说：“不过，我有信心，过渡期之后，我们将为继续建设香港而骄傲。我常为香港奇迹般的成功而惊讶，常有人问我：你对 1997年后的香港有信心吗？虽然现在碰上困难，但我的回答是：我不仅对香港的 1997年有信心，对 1998年 1999年及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也有信心，其实香港许多居民对香港的将来也有信心。今时今日有更多早期的移民回流香港，他们看到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对作为中国人感到骄傲，也希望成为我们的一分子。”

董建华说：“香港面对过不少逆境而取得今天的成就，香港的成功是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香港所有的市民都享有自由及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论香港前景

行政长官上任一年多，他一直对香港前景持乐观态度，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然九七前后发生太多事，九七前后的香港与目前的香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董建华对香港前景的看法如何呢？

本稿写于此时，刚好董特首于今天（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份施政报告，我们正好可以作个对比。

一九九七年六月，即回归前夕，他对我问的香港前景问题答复如下：

“首先，最重要的是香港必须保持繁荣稳定。她清晰的长远目标应是一个公正、富于同情心和民主的社会，并立足于平等机会和平等竞争，以及鼓励自力更生、保障老弱病残的福利社会制度。”

“其次，我希望看到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我希望香港成为一个真正的、处于亚太地区优势的国际性城市，而得到如同世界各地的发展机会；我也希望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亦希望六百五十万香港人可以在一个法治的、没有贪污的、没有罪行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基于一九八四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根据香港基本法，本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回归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同时，亦保证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在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政策下，香港特区会保持现有的经济及社会制度至少五十年不变。另外，我也希望国际间，不要把我们的民主进程与急进的民主方式相提并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今天，~~1995~~年 4月 20日，我很留意听了董建华上任以来的第二份施政报告，有关前景的问题，他在题为《群策群力，转危为机》的九八——九九年度施政报告的引言部分指出：“一年过去，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当家做主，根据基本法管理香港事务；中央政府以实际行动实践了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诺；国际社会也普遍同意，‘一国两制’的原则，在香港得到了充分的落实。我们感到更加鼓舞和欣慰的，是国家对于我们开展的事业，给予大力的支持。”

“今天的香港，继续坚持法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市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结社、集会，以及所有基本法所规定的其他自由和权利。今年 3月，香港举行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有超过一半的选民行使了投票权，刷新了香港历来的选举纪录。”

董建华以《怀抱希望，举目向前》作结语，他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是在香港处于逆境时发表的。我时刻记挂着各行各业以及普通市民的焦虑，也清楚知道大家对政府的期望。我有信心金融管理局最近的措施对于利率稳定产生良好作用；我也相信施政报告中表明的房屋政策方向，以及一年来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稳定楼价的帮助。”

“无可否认，香港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但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失去自信。事实上，香港的确仍然享有不少令人羡慕的优势。我们的社会自由、廉洁、安定、坚守法治；我们的货币经过进一步巩固后，会变得更坚稳；我们没有外债，储备充裕，银行体系健全；我们的通讯网络便利先进，服务效率快捷可靠，使香港成为各国工商界在亚洲投资和设立总部的首选；我们享有和内地省市合作的地利、人脉，以及任何地区都及不上的丰富经验。而且国家的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董建华仍然一如既往，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为香港自豪！

对港人之承诺

董建华上任时，在答本记者问时曾说：“我对香港人承诺，在我的任期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令香港的将来更加美好。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开始，经过去十三年的努力，将令‘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实施，确保平稳过渡。在我们继续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香港人将一起面对最大的挑战，成功管理我们自己。”

今天回顾他上任前后对港人的承诺，能看到所有的承诺都在逐步进行，如当时他说：“我们必须共同解决香港今日面对的主要问题：教育制度的需求、可提供房屋的短缺以及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一年多来，上述三点是董建华致力去付诸实施的。

他也承认施政报告制订的措施虽不能在短期内刺激本港经济，长远来讲却有助经济的复苏。

对一年多来风风雨雨中，外界质疑他的领导才能时，他坦诚地说：“自当选行政长官后，我一直以‘无私、无怨、无愧’为做事原则。”

在给本记者的书面答复中，他曾说：“我们成功地作为航空、航运中心、信息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面对邻近地区、竞争者的威胁，加上香港工商成本上涨，我们需要保持及建立国际商界对香港的信心，因此我们需要改善香港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香港的将来与中国紧密相连。”董建华还说：“事实上，香港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利益及互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还是那句：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有利于香港的发展。在我们即将迈进二十一世纪之际，香港能够实行高度自治和继续保持我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尽管

如此，我们仍然必须牢记：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所以，无论我们在香港做什么，都应当考虑以中国为主体，为中国创造财富以及在国际上建立领先地位。”

在新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仍切记，他说：“在我制定施政报告的整段期间，内地同胞在今年夏天奋勇抗洪的场面，始终在脑海挥之不去。面对洪水肆虐，内地同胞没有丝毫畏惧退缩，没有怨天尤人。他们上下一心，团结起来，强大的凝聚力迸发出无比的力量，使他们克服一场天灾浩劫。中华民族这种勇敢刚毅的精神，使我感到振奋和自豪，相信不少市民会有同感。我深信香港市民必能本着坚毅、勇气、团结和互助扶持的精神，克服今天的逆境，迎接风雨后更光明的未来。”

在答复本记者提问的结束语中，董建华认为：“为了巩固我们原有的基础，我建议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迎接和战胜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香港的回归广受世界注目，仍有人对香港存有疑问，我认为他们应来或多来香港了解情况，不仅是现在，未来的香港也会继续成功！”

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仍然是很客观地总结过去的一年及未来：“过去一年，对于香港来说也是备受挑战和考验的一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区域，香港的经济因而出现逆转。医疗事故，以及新机场启用后出现的问题，都打击了市民的信心，影响了香港的声誉。特区政府将更加提高警觉，不断改进，确保能够领导香港应付未来的挑战！”

一九九七年 七月 一日，香港回归祖国；

一九九七年 七月 一日，董建华正式上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在这一天和以后正式实施和受到检验；香港特别行政区从诞生起即受到世人注目。

香港人已在香港的中国人董建华带领下，去实践前无古人的

伟大创举。

我们已感受到前路之崎岖，但仍期待着香港一天更比一天好！

一九九七年元月底初稿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稿

后 记

过去，我在广州写凡人；现在，我在香港写名人。

对两者，我都很投入。因为不管凡人、名人，他们都有让我着迷的地方。我常说：“我写了这么多人（目前已超过一百几十人），而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其闪光点，我只要学每个人的一点点，就不得了啦！”

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期我写人物开始，我重病缠身、弱不禁风的病体；我坎坎坷坷、历尽苦难的人生。在每个被采访者的“一点点”中积累了十几年，今天的我似早已脱胎换骨：健康状况，透过科学数据及实际表现，是近二十多年最好的；事业人生，似不断有新表现、新追求；待人处事，越发的豁达、开朗，懂得平衡自己。

我非常感谢我面对面采访的每一位被访者，他们都向我敞开心扉，回答我所问的每一个问题，使今天能通过珠海出版社，让我们的读者感受到每位名人或凡人的内心世界。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呵！滴水成河、集腋成裘就是这个道理。

我盼望着我的读者也从这许许多多“一点点”中，找到自己的启迪，化为自身的动力，将来也就不得了啦！

祝您成功！我静候佳音。

吴祥珉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面采访 真实的故事

陈月 苑原 远 国 前 景 缘 物 原 远 国 恩

I 摄...

II 撰...

III 纪实 原新闻 原中国

IV 摄影

面对面采访 真实的故事

©吴祥珉

封面题字 金 庸

责任编辑 潘自强 晓 宁

封面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猿 猿 园 猿 猿 邮政编码 缘 猿 园 缘

照 排 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猿 猿 园 伊 猿 猿 猿 毫 米 猿 猿 毫 米

印 张 猿 远 字数 猿 园 园 千字

版 次 猿 猿 猿 年 猿 月 第 猿 版

猿 猿 猿 年 猿 月 第 猿 次 印刷

印 数 猿 猿 猿 册

陈月 苑原 远 国 前 景 缘 物 原 远 国 恩

定 价 港币 猿 猿 元 (全二册 本册 猿 猿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